

“欧洲共产主义”资料选
辑



6060139



编者的话

七十年代，在西方报刊上出现了一个新词：“欧洲共产主义”（EUROCOMMUNISM）。主张“欧洲共产主义”的西欧几个大党的一些领导人，认为这个词汇，“它已经有了一种含义，并且一般说来，成了目前各种共产主义倾向之一。”到目前为止，接受和支持“欧洲共产主义”的共产党已有十多个。

他们在发表党的政策声明，阐述理论主张时，一再强调的是“民主”和“自主”。认为“没有比民主道路更好更短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主张实现具有“民族色彩”的、“多元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先后从党的纲领和章程中取消了无产阶级专政和列宁主义的提法等。在党的关系上，主张“严格尊重每个党的独立和自主”，“排除对各党内部事务的任何形式的干涉”。反对把各党对苏共的态度作为“国际主义的试金石”。在国际关系方面，则主张“国际合作”、“缓和”，要求“建立一个独立于苏联和美国的”“联合起来的欧洲”。

“欧洲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在国际共运中引起了各种不同的反响，也为世界上各种政治力量所关注。为了便于使有关方面了解和研究“欧洲共产主义”，我们编译了这本选辑，今后还将陆续选译。

本书全系译文，有所删节。限于水平和时间，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欢迎同志们批评指正。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西欧政治研究室

上海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国际政治研究室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

目 录

(一)

欧洲共产主义的七项原则 (N·拉尔桑)	1
欧洲共产主义的三种可能性 (阿尼埃·克里热尔)	10
论欧洲共产主义 (雅克·德尼)	13
欧洲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过渡的长期性 (埃里克·霍布斯鲍)	35
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人的欧洲政策 (R·E·M 欧文)	45
欧洲共产主义与东欧国家 (T·S·)	65
莫斯科和“欧洲共产党” (理查德·洛温撒尔)	74
策略还是战略 (汉茨·廷姆曼)	86

(二)

欧洲共产主义：讨论卡里略的《“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 (萨姆·阿罗诺维奇)	99
是使马克思主义“现代化”？——评圣地亚哥·卡里略 《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欧文·西尔柏)	112
西班牙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简介 (塞瓦斯蒂安·萨皮拉因)	123
意大利共产党的“历史性妥协”：取得政权的新途径？ (埃里克·肖)	132

七十年代的意大利共产主义 (卡尔·博格斯)	146
法国共产党: 介于斯大林主义和欧洲共产主义之间 (维克托·莱达克)	160
法国共产党与其它西欧党的关系 (米歇尔·拉布罗、雅克·鲁尔)	171

(三)

西共、法共、意共三党联合声明 (1977年3月3日)	178
英国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联合公报 (1976年5月19日)	181
意大利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共同声明 (1975年11月15日)	184

欧洲共产主义的七项原则

N·拉尔桑

欧洲共产主义，是当前争论的一个重大问题，这场争论主要涉及欧洲共产主义是否确实存在。因为，怀疑欧洲共产主义是否存在的并不是伊贝·诺尔恩德一人。如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葡萄牙共产党的头面人物阿尔瓦罗·居纳尔就是一例。他曾经说过：“不存在欧洲共产主义，更不存在什么地中海的共产主义。”在西方报刊中，西德报纸《世界报》写道：“欧洲共产主义是虚构的政治范围内最为成功的一个创造，然而，它并没有什么现实的内容。”

还应当加上这一点，即如果说人们认为欧洲共产主义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确实存在的话，那么人们对其内容也是有争论的。保加利亚共产党书记托多尔·日夫科夫说：“欧洲共产主义是反苏主义的一种新形式”，“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与之相反，匈牙利共产党书记雅诺·卡达尔却说：“欧洲共产主义是能在西欧实现社会主义的一条道路。”

下述文件可以说明在国际上争论不休的这场辩论的内容，目的在于勾划出欧洲共产主义这个观念包括些什么，不

原注：本文作者是丹麦人民社会党党员，欧洲议会共产党党团的秘书处成员。文章发表在1977年8月24日哥本哈根《新报》上。

包括些什么。

我们所用的材料全部引自有关党公布的文件。

第一个论点：“欧洲共产主义是存在的”。法共的雅克·德尼在稍早于7月1日的时候的一次回答苏联《新时代》杂志（这家杂志曾经指责过西共领导圣·卡里略和他的《“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一书）时说：“欧洲共产主义既是一个客观事实也是一种新现象。”

第二个论点，也是主要的论点：给欧洲共产主义的概念确切地下一个定义并加以描绘是可能的。为此需要用三个不同的步骤，因为只有用三种不同的方法才能得到我们所进行研究的東西详细、确切的形象。

第一个步骤，为我们提供了欧洲共产主义概念和普遍的形象。意共总书记恩里科·贝林格说：“欧洲共产主义是一系列的立场，我们各党在这一系列立场上是完全一致的”，

“它是一项研究我们各党——法共、意共和西欧其它各国的共产党——我们对此进行研究，目的在于寻找一条适应欧洲这一部份特定的条件、历史和传统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1976年6月3日巴黎会谈）

法共总书记乔治·马歇去年三月在马德里与恩里科·贝林格和圣·卡里略举行的三方会谈时也说过：

“欧洲共产主义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尽管我们各国存在着差别，但也有某些共同之处，对这些共同之处我们的回答是一致的。”

这种见解是可以进一步研究的，贝林格所讲的这条通向社会主义的“特殊”道路和马歇所谈的“一致的回答”究竟是什么呢？实际上，它是一种对“民主与社会主义关系问题”（贝林格）的新评价。“我们国家中的社会主义民主与现在

已经进入到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民主将是不同的”（马歇）。

我们可以把欧洲共产主义概括为这样一个普遍定义：

“一些共产党对民主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上的某些共同的态度”。

第二个步骤就是要把这个抽象的定义具体化。某些西方共产党探索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则基础和态度究竟是什么呢？

没有一个党能够为这种社会主义提出一个系统的、完整的形象，也没有那一个有关的党能把这种新社会主义内容展示出来。不过有些党还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材料可供观察家作为研究的基础。对这些资料的研究提出了七项基本原则。

这些材料共分三类。第一类，是各党的声明，包括政治纲领，党的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决议或者在兄弟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等等。

第二类，包括双边的共同声明。双边的联合声明是产生欧洲共产主义的基础。因为，从1975年6月意共和西共第一次提出了他们的共同信条以来，这种双边声明把五个党互相联结在一起了。这种联合声明共有八个，其中最重要的是1975年11月意大利——法国的联合声明。

第三类，是多边联合声明。最重要的有1974年2月西欧共产党在布鲁塞尔发表的著名声明及去年柏林会议所通过的最后公告。此外还有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共产党今年3月在三党“最高级会议”之后于马德里签订的三边声明。

这些不同的材料很好地说明了这些党为澄清这个新概念加强它的可靠性所作的共同努力。我认为可以从这些材料中得出下列七个基本思想（附有引文）即：

和平民主通向社会主义的出路

进行通向社会主义的改革只有在大多数人民群众经过自由讨论作出决定时才是可行的。

这条道路的特点是，人民群众在选举和斗争方面都作出努力，政治社会和经济生活方面的持续的民主化。

（1977年1月日本——意大利共产党声明 强调指出：

“……民主走向社会主义必须在人民的支持下以及维护和扩大自由的基础上，采取对社会进行彻底的民主改革方法加以实现。”

社会主义就是全面的自由和民主

因此，社会主义阶段就要求保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本世纪内人民斗争所取得的全部自由。大多数政党将坚持民主轮换制。

此外，民主将体现在各个领域内，特别是在企业内部和地方政府部门中。

（1977年3月马德里最高级会谈）指出：“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三国共产党准备和各种政治和社会力量一起，尊重、保证和发展集体和个人的各种自由：思想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游行示威自由，公民在国内外的出入自由，工会自由，工会的独立和罢工权利，私生活的不可侵

犯，尊重普选制和多数派的民主轮换执政，宗教信仰自由，教育自由，各种哲学思潮和见解的自由，文学艺术自由，为建立一个新的社会而努力。”

广泛的联盟

在受到垄断统治威胁的各阶级和各种社会力量之间进行最广泛的合作以求走上引起深刻改革道路。工人阶级必须在这种联盟中加强自己，以确保在联盟中发挥主导作用。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种广泛的联盟同样也是必要的。

（1976年6月，马歇与贝林格会谈时说：“我们主张法兰西人民各组成部分之间在为实现民主改革和建立一个带有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的行动中团结一致”。）

各党的全面自主

各党都应完全自主地制订各自的策略，无需承认任何一种外国的模式。应该在平等地位之上按照互不干涉的原则上建立各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各党既互相尊重又应互相团结，这种团结除了共产党之间的团结外，还应包括和所有的社会主义力量团结一致。

（1976年6月的柏林会议最后公告中指出：“各党本着这种精神，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伟大思想基础上，严格保证各党的平等和主权独立，不干涉内政，尊重各党为实现社会进步和改革，实现社会主义自由选择不同的道路，发展它们之间国际主义的、兄弟般的和自愿的合作和团结。”）

相互批评的责任

我们上面谈到的这种互不干涉的原则，在一个党的态度有影响其他党的政策时就会失去效用。因此，各党之间团结一致的关系还应能使各党互相承担责任，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和义务。

（1976年6月，贝林格在柏林会议上讲话时说：“我们认为尊重互不干涉的原则并不排除自由评论其他党的理论和政治观点以及影响国际生活中工人运动的某些事件。”）

西欧的联合

西欧的区域性合作是获得通向社会主义任何进步的必要条件。对经济一体化以及对现有的国际合作形式的民主化作出一致的回答是尤其必要的。

西欧的这种前景同样还应该反映在外交政策上。欧洲不应该参加集团，也就是说必须既独立于美国也独立于苏联。

a.（1974年1月布鲁塞尔西欧共产党会议上指出，尽管各国的情况不同，但是，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重申对垄断经济一体化的政策作出共同的回答是可能的和必要的。”）

b.（1977年3月马德里会谈声明指出：“三党就是这样设想一个和平、民主和独立、没有军事基地，也没有军备竞赛的欧洲的前景的”。）

资本主义国家的危机是全面深刻的、其结果是深远的

在经济上，资本主义制度正经受着一场深刻的结构危机。这场危机是一场全面的危机，它危及到社会、政治、文化、道德各个领域，它不仅涉及工人阶级，而且也涉及到其它各阶层人民（政府工作人员、手工业者、农民、中小企业主）。

此外，这场危机的后果，在今天已危及好不容易取得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权利，并将最终危及保持民主。

（1976年4月，英国——意大利声明说：“这场危机使意大利和英国面临着对两国的未来产生影响的根本问题。它对工人运动和各政治和社会组织，以及各种民主组织提出了新的责任”。）

这就是欧洲共产主义的七项原则。也就是上述欧洲共产主义观念在政治现实中的实际解释，一个称得上“欧洲共产主义”的党应该遵循这七条准则。

使得我们应用我们认为对于共产主义新实质进行分析所不可缺少的第三个步骤也源于这一点。因为，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个总的定义是与某些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和民主的共同态度有关的。

赞成这七项原则的有那些党？

上述分析肯定是很粗略的，对此似乎有所保留，但可以

说九个党是与此有关的，其核心是参加马德里会谈的意大利、法国、西班牙三国共产党。近两年来，日本共产党和英国共产党也参加了双边接触并发表了联合声明，也应算作欧洲共产主义政党。这么一来“货真价实”的就有五个党了。此外，瑞士、芬兰、比利时，澳大利亚等四个较小的政党也应算在这个狭小的圈子里。

因此，概括起来讲，我们认为我们的论点有两个：欧洲共产主义是存在的；欧洲共产主义是社会现实。我们只需提出两个必要的意见就可为之作一结论。

首先，不管人们到处怎么说，我们已经知道：

欧洲共产主义不是一种意识形态，不是一股严密的政治思潮。

欧洲共产主义不是一种明确的战略，也不是为了在有关国家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制订的战斗部署。

欧洲共产主义不是一个集团，不是一个区域性的联盟。也不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新的，“有组织的中心。”

总之，欧洲共产主义不是一个反苏派别，也不是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新阵线。

最后，我们业已看到，日本共产党也属于这个运动，因而对“欧洲”这个前缀就有说明一下的必要，确切地说，“西方”或者“民主”这两个前缀似乎更为恰当。但是，欧洲共产主义本身的思想看来还是不变。所以我们不想与顺乎潮流的欧洲共产主义论争。

此外，常常还可以看到一种产生于狭窄的范围里的现象超越这个概念，并且有着一种更为普遍的意义，如在好些国家里出现一种典型的荷兰复兴时期的建筑艺术！

因此，欧洲共产主义是适用于任何发达的民主社会的一种中性的和普遍的政治概念。

日本和丹麦同样也不例外。

〔本文译自法国《国际研究》第 88—89 期。〕

庄建明译，葛智强校

欧洲共产主义的三种可能性

阿尼埃·克里热尔答

《巴黎竞赛》周刊记者问

问：欧洲共产主义这个词是谁发明的？

答：欧洲共产主义这个词可能是《新闻报》主编阿里戈·莱维在为美国《新闻周刊》写的一篇文章中第一次使用了这个词。自75年秋季以来，这个新词就在西欧报刊上被使用了。苏联和苏联范围的国家都拒不承认这个词和它的涵义，并认为这是帝国主义的一种创造。

贝林格和卡里略，他们两人毫不犹豫地采用了这个词。马歇先是不满，接着在四、五个月以前才声明说：“欧洲共产主义并不是我们发明的，但是我们采用了这个词。”

问：那么欧洲共产主义意味着什么呢？

答：对此，人们可能认为有三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这可能是继苏维埃主义、毛主义、铁托主义、卡斯特罗主义等等之后，共产主义家庭里另一个新的品种。第二种解

译者注：阿尼埃·克里热尔是法国共产党前中央委员会委员，1956年脱离共产党，现在巴黎当教师，是研究法共党史的专家。本文是她就关于欧洲共产主义问题对《巴黎竞赛》周刊记者所作的一次谈话。

释是，欧洲共产主义可能是西欧三个最大共产党解决通过议会民主的道路取得政权问题而采取的一项共同策略。第三种解释是欧洲共产主义可能是一种对苏联保持距离，与苏联的共产主义搞离心的愿望，因而是一种否定的方法。欧洲共产主义是继在不发达国家中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之后，为寻求一种能有着一个社会学上称之为工人阶级的先进工业国家中进行列宁主义式的革命的道路而作的一次尝试。

这三种解释都有部分道理。西方国家的共产党意识到他们必须把共产主义与自由协调起来，保证在西方任何人都不愿丧失的自由。至于法国共产党，尽管它所表示的支持自由的愿望是否只适用于左派联合政府，对在今后一个阶段可能建立的清一色的社会党政府是否还作坚持，这一点，目前还不清楚。实际上，共产党想建立一种国有化部门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秩序。在这种秩序下，自由市场将不断缩小，伴之而来的是政治自由也将减少。

问：意大利、西班牙、法国三国共产党各自的情况如何？

答：在意大利，欧洲共产主义是一个标志，一种崭新的战略。这种“历史性妥协”的新战略是根据社会党力量弱小，共产党在数量上代表了整个左派，这样一个事实而确定的。意大利共产党所寻求的战略是和对立派建立联盟。因为，共产党的合作者是一些资产阶级政党。

在西班牙，由于共产党在那里没有能够建立联盟。所以欧洲共产主义所采取的战略是不同的。西班牙共产党面对着一个根基扎实的政权，处境十分孤立，不得不考虑这种形势，并对苏联保持距离。因为苏联对西共的

照顾不如对法共和意共这两个人数众多的党那么多。

在七年中，卡里略只去过一次莫斯科。最后，欧洲共产主义在法国标志着一种完全不同的战略。即：传统的人民阵线战略，也就是说，为了建立一个共产党加上社会党的左翼政府，而不是为一个共产党的政府而建立联盟。

问：你是否认为由于出现了欧洲共产主义会出现一种可能导致欧洲共产主义的党与莫斯科之间的分裂？

答：我完全不这样认为。出现分裂和回复到以前那种对莫斯科唯命是从的局面都是难以想象的。

最有可能的解决方法就是妥协。此外，不要以为欧洲共产主义会使苏联陷入忧虑的痛楚之中的。这种想法是幼稚的，因为，“欧洲共产主义的模式”需要经过许多时间才能与苏联制度竞争。莫斯科准备对那种可能西欧偏离它的社会主义计划制订前进行严厉批评。但是不能把这种事先的批评和在欧洲共产主义实施后出现了一些本来可以纠正的缺点（如允诺过多的自由）后所作的批评混为一谈。

问：俄国对法国的欧洲共产主义和对将要到来的法国左派政权持什么态度？

答：决定苏联态度的并不是理论上的原因，而是纯粹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对于苏联来说，重要的是希望看到法国外交政策中保留对它有利的某些因素。总之，莫斯科对法国共产党说：“你们要斗争就斗争吧！但是我们不希望在国际问题上出现危及戴高乐将军政策的根本变化。”

〔本文刊登在法国《巴黎竞赛》周刊1977年7月22日，第1469期。庄建明译，葛智强校〕

论欧洲共产主义

雅克·德尼

问：欧洲共产主义一词即使不是共产党人创造的，但此后是被共产党人所采用的。你能否说明一下你们党是如何理解欧洲共产主义的？你党是如何给欧洲共产主义下定义的？

雅克·德尼：欧洲共产主义这词无疑反映了客观事实和新的情况，创造这个词的人显然并非出自无私。而如果他们认为这会给我们制造困难，那他们就错了。

就我们来说，我们不是教条主义者，也不是咬文嚼字的人。我们抓住了本质的东西。关键不在于这个词的确当不确当（提出的问题不涉及到所有欧洲共产党，也不仅仅涉及到欧洲各共产党）。关键是它形象地突出了一种政治活动中的吻合一致。

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内在联系

一些党之间，如我们党和意大利、西班牙、日本、英国党之间的会谈后发表的许多文件，对我们来说特别是一九七

注：本文是对法共中委雅克·德尼的一篇采访记，收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美因河畔法兰克福《Fischer Verlag》袖珍丛书最近出版的《欧洲共产主义之实情、分析和采访》里。

五年十一月马歇—贝林格声明所反映的就是这个问题。

总之，对新的问题，要有新的回答，这种问题和答案都是很多的，因为这是涉及到一些特定的党，特定的人民和特定的国家。他们首先要遇到的问题是共同的，即全面深刻、持久的危机，我重复说一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它影响到国家生活中经济的、货币的、社会的、文化的、道德的和政治的各个方面。因此这种危机危及了目前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本身。在目前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与垄断资本融合在一个共同的统治机构里，对广大人民实行使人透不过气来的压迫。受到冲击的是这个制度，提出的就是改变社会的问题。

在保护大资本受害者的切身利益的日常行动中，在旨在实现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前所未有的民主化而进行的改革机构的斗争中，在制订本质上是民主和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的过程中，在我党期望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具有真正民主和民族特点的）斗争中，人们发现了这种共同一致的回答。

在这方面不应该掩盖考虑欧洲共产主义一词的原因之一，这就是鉴于现有的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在过去的实践中犯了严重的错误，以及它们中某些国家里长期缺少自由。

总之，我们行动的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与民主之间有内在联系。法国的劳动者正在从事改造社会的伟大斗争——因为这种斗争比以往任何时期更是社会进步的条件——他们就是这样来理解什么是欧洲共产主义的，他们认为欧洲共产主义是与我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自由、民主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一致的。

所以我们认为不要就这个词进行争论，这个词目前似乎

正使那些为了损害共产党人而创造这个词的人感到为难。对我们来说，正好相反，这个词使我们能深入研究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在和将来有益的丰富的思想。

问：欧洲共产主义口号要求各共产党采取统一的战略战术，你们拒绝这样一种解释，你们强调各党的特点，我同意你们的看法，那你能否举些具体的例子来说明各党之间的不同点吗？

雅克·德尼：不可能设想各个不同的共产党之间采取统一的战略战术，我刚才谈到，在许多共产党中存在着许多一致的东西，人们对此只能感到高兴，各国共产党作为集中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小分队的阶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种看法也就是这些共同点中的一个。

对我们来说，我们党就是紧密地联系了国家现状，大胆而创造性地制定适合客观现实的政策，才确保了为民族和工人阶级的利益服务，争取社会主义的胜利。和社会民主党，基督教民主党所存在的那种重在组织上夺取集中的领导权不同，长期来没有共产国际的组织了。

我们党和西欧各共产党以致世界上其他共产党的关系，是建立在国际主义团结和互相尊重各自的主权的基础上的。他们中的某些党不承认欧洲共产主义这个概念。对这些我们看不出有任何影响我们良好关系的迹象。对我们来说，不存在把欧洲共产主义作为我党和其他党的关系准则的问题。

各党间的一致与分歧

我们不是为了进入另一种国际（即使是地区性的国际！）

而走出一种国际的，我们各党努力于交换情报和意见，进行双边有时多边的会谈，在各党希望并有可能采取共同行动时就采取共同的行动。一九七四年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布鲁塞尔大会就是一例。为了保卫世界这个地区各国工人阶级和人民的利益，这次会议作出许多创举，反对危机，以及反对应当对危机负责的大资本。

你要我给你举出我们各党之间不同点的具体例子，不同点是确实存在的，而且十分自然。我们斗争所处的情况不同，因此各党所作的回答必然是不同的。联盟政策就是一例，我们各党都十分重视团结和联合所有人民力量，重视国内各民主党派之间建立持久的，真诚的，坚强的合作，重视领导国家事务，具体地说，各党对其进行活动所处的社会情况作出自主的分析，不同的政治斗争条件导致在某些重要方面采取极其不同的政策。

另一个例子——这里我们甚至可以把它称之为分歧——关于欧洲一体化方面。今年三月马德里会晤时，我们曾经提起过。和西班牙同志不同，我党反对西班牙在目前情况下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此外同样反对希腊和葡萄牙加入）。当我们一旦考虑到了处于危机中的法国农业和其他经济部门的切身利益时（他们将成为这种扩大的首批牺牲者），怎么可能作其它考虑呢？

同时，这种分歧证明了我们各党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的。

问：在我看来，你们党同意的政治民主——包括资产阶级根本的自由和权力——是欧洲共产主义改变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新的理论，是什么经验促使你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因

为从前共产党人把政治民主仅仅当作一种“形式”。

雅克·德尼：一九七六年在我党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我们着重说明，我们打算把民主自由作为我们想在法国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标尺，并把它作为改造社会的斗争手段。可以说，这就是我们战略的中心，根本的选择，这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基于长远深刻的考虑。在制订这条路线中，在国际和国内，一九六八年都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一年，这一年五一六月强大的人民运动初次强烈地表达了要求改革的深切愿望，它远远超出工人阶级的范围。之后，尽管政府多次更迭，可是什么问题也没解决，尤其在吉斯卡尔政权成立后，反而更严重了。

危机的根源是：广大法国人民的劳动果实被少数享有特权的人侵吞挥霍，他们秘密决定一切，决定政府委员会，决定内阁，搞国家干涉主义、专制主义、官僚作风，一句话国家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这就是为什么十年来法国的政治辩论围绕着民主问题展开的原因，因为不管人们从那个角度反复考虑。国内的各种问题，总只有这种解决方法。

首先，社会民主，就是说公正对待那些整天操劳，应该象人那样生活的人，在工作、收入、居住、受教育方面享有更大的平等。

其次，经济民主，就是说国家支配的主要财富，劳动者有权决定与自己有关的问题。

最后，政治民主，就是说保护和扩大集体与个人的自由，保护我国人民与之相连的民主生活方式，不断创造更加丰富更加多样的新的方式。

丰富的遗产

自然，我们的努力将写进我国人民为自由而进行的百年来的斗争史中，长期来法国工人阶级在这斗争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工人阶级取得了一些民主权利，他们知道这些权利所付出的代价，因而更关心民主权利。

因为，事实上，我们以前只知道资产阶级的自由，就是剥削劳动者的自由，只要一谈到权利自由，那就是压迫的自由，我们的一切斗争都是为了消灭这种不平等。相反，目前取得的任何一种自由无不都是斗争的结果，我国劳动人民从经验中知道，自由上所取得的每个进展都是社会和政治斗争的一个支持，因而而对经常企图损害这些自由并指责或抽掉民主内容的大资本家，保卫和扩大这种自由就应该是一个经常关心的问题。面对着法西斯主义的威胁，法国共产党在三十年代创造了人民阵线，作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继承了这个民主传统。一九四六年莫里斯·多列士在接见《泰晤士报》记者时说，法国共产党人应该走一条与俄国布尔什维克不同的道路，即民主的道路。

民主的新步骤

然而，近年来我们谈起一种新的步骤，我们对法国社会及我国阶级斗争教训的深刻研究，得出一个结论：民主变革与社会主义本身只能是我国广大人民的事业，新近的国际经

验（包括智利和葡萄牙的经验）表明这是取得成功的决定性条件，因而我们就为团结金融和工业封建主义所有受害者，反对统治国家的狭隘等级制，争取民主变革而斗争，以实现深刻的民主改革给这种狭隘的等级制度以沉重的打击。新的历史资料说明：在法国构成劳动人民的各种社会力量，他们主要利益的一致性，可以为争取大多数人民群众从事改造社会的事业提供史无前例的可能性。

我们的研究也考虑到斯大林主义和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干涉。

所有这一切都更加促使我们发展我党政策的民族特点，确定独特的前景。

一九六八年后，我们的“争取先进的民主，争取社会主义法国”的宣言，一九七一年我们提出的《改变航向》的纲领，（其中的建议在一九七二年被左翼《共同施政纲领》所采纳）一九七三年乔治·马歇写的《民主的挑战》一书。我党公布的（这在法国的政治力量中还是首创）《自由宣言》草案，最后特别是一九七六年把民主作为推动法国前进的动力的我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所有这些都标志着这个进程。

我们为争取法国从危机中摆脱出来，在机构的各方面走上民主改革的道路而斗争。民主的这种不断扩大不断前进将使国家引导到社会主义——一种真正民主的社会主义。我们为之而斗争的社会主义将建立在生产的主要手段属于社会本身所有的基础上，和劳动人民政治权利的基础之上。它将消灭剥削，确保劳动人民自由的基本条件，它将保证劳动人民和公民更广泛地参与对整个社会管理，即自治，这是民主的另一种说法，它将保证并扩大我国人民已取得的各种自由：思想、言论、创作、出版、游行、集会、结社的自由，个人

在国内外往来的自由，信仰宗教的自由，罢工的权利，尊重普选，包括民主更替的可能性，政党存在和进行活动的权利，包括反对党；司法独立；拒绝一切官方哲学，拒绝搞极权制和个人权力。

所有这一切告诉我们，我们为具有“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而奋斗。

问：政治民主的突出标记就是公民有权通过投票罢免政府，你们党在失败后准备转为反对派，许多西方甚至东方的观察家很难相信：这可能意味着由高级社会变成低级社会。

雅克·德尼：我们对轮换执政的理解是与我们对我国多党制的理解是一致的。

是的，我们考虑到组成我国人民的社会阶层，他们所处的地位各不相同，宗教、政治派别、思想倾向也不相同。我们既不希望在民主运动中，也不希望在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实行任何垄断，而与之相反，希望在人类和社会进步中起先锋队作用。因而我党在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指出：在我们想建立的社会中，承认多党制，承认反对党存在和进行活动的权利。

尊重普选

我们也曾说过，在建设新社会的每一个阶段中，赞同普选是继续已经开始的改革的条件，一切党派应该尊重它的裁判，多数派或反对派各政治组织和派别，按比例进行选择（今天的情况还不是这样）将保证各派与其真正影响相称的代表性。确保少数派别权利的实质内容。任何政党不能统治

国家，不能把自己和国家等同起来。我们提出这样的保证是出于我们深信我国的工人阶级，我国人民。我们深信越来越多的法国人会从我们的保证和行动的对照中证明我们的一切政策都是为了使每个劳动者，每个公民成为民主社会和明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的参加者，会在各阶段中，不断加强对我们措施的支持。

因此，我们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尊重普选的结果，不管这种结果对我们有利还是不利。没有广大法国人民支持想在法国从事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完全是不可思议的，有人不顾人民的死活，甚至反对他们，是不能为人民谋求幸福的。

影响更替的原因何在？

应该看到影响民主更替的原因来自它方。来自我们的敌敌，来自那些侈谈自由却污蔑我们的人。不仅不公正的法律，而且还有一种见不得人的选区划分法，他们剥夺了劳动人民的合法代表性，而且吉斯卡尔政权在选举接近结束时不愿作出尊重选民的意志的保证。他使尽一切阴谋活动和讹诈，企图避免所谓民主力量胜利的“危险”。如果这一切还不奏效，那么就用这种或那种方式把现制度粉刷一下，窒息人民的希望，大资本家用各种手段为替自己效劳的政治力量提供各种手段，而且一旦失败还用破坏经济来加以威胁，一旦民主对他们不利，这些人就矢口不谈民主。

如果说法国存在进步的传统，那么它同样也具有《凡尔赛》传统，这种传统曾经借助俾斯麦镇压过巴黎公社。它的继承人企图寻求国外援助，美国的当权者，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当权者（由施密特总理开始）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将军们

毛遂自荐地粗暴干涉纯属法国人民的事务，（他们在意大利和其他国家也是这样做的）。我们断然拒绝这种干涉，我们这么说是因为我们认为这样做是表达了我国千百万同胞深切的感情。这样做也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尊重人民的裁决。

问：欧洲共产党人拒绝接受，说他们党“社会民主化”的评论，然而瑞典社会民主党奥拉弗·巴尔莫在接见意大利共产党《Rinascita》报记者谈话中谈到一些引人注目的事，他指出在发展社会和政治民主后，他的党将在第三阶段努力发展经济民主，没有经济民主，民主将永远是不完全的，没有保证的。巴尔莫谈到他的党将放弃传统的社会民主的模式，同时还将抛弃斯大林的经验，想寻找一条广大群众参加政治和经济决策的道路。关于该党的对外关系，巴尔莫指出在社会民主党领导下的政府和他的党和为争取社会和民族解放而斗争的各国人民加强团结。假如像巴尔莫那样解释民主社会主义，那么他的看法能不能充分反映你党的观点？你看有什么不同之处？

· 雅克·德尼：我们内部存在的深刻和长期的分歧并不妨碍我们抓住每一个对话和谅解的可能性。我们现在和将来的这种愿望要求阐明和尊重不同的观点，要求赤诚相见。你提到那次接见记者的谈话，提到经济民主问题（主要的），并不使我惊奇，一场选举失败结束了他那四十四年权力试验，才能使他知道瑞典式的社会并没有触及资本主义统治基础，政权重新转到右翼手中丝毫没能改变生产关系，垄断资本家的实力甚至比以前更集中，他们在许多国家里的扩张得到了政府的帮助。此外，我们注意到奥拉弗·巴尔莫处在反对党地位时所允诺的改革，不去触动少数财政寡头的实力根基并不是

低估这些改革的意思，在这个意义上说这些改革与我们的《改变航向》宣言以及一九七二年左派共同纲领上所提出的改革相似，这些改革应由任期五年的民主政府一上任，就在法国开始实行。

社会民主党的总结

事实上，由于不想提出新的政治办法，不想依靠人民群众的斗争（这种斗争是任何进步的条件）社会民主党总是走到要末管理大资本家的具体事务，要末导致工人和民主运动的失败。社会民主党绝对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甚至不可能考虑和资本主义决裂，不管它有过多长时期统治地位，或正占统治地位，还是处于绝对多数都是如此。这充分表明一切社会党人是无法解决资本主义制度危机的。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么就在于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甘愿充当拯救资本主义制度的好帮手，自吹不致激起比保守党提出勒紧裤带的计划所能激起的更为激烈的反抗。法国劳动者由此得出的经验无论使大多数人在政治和工会活动方面选择了政治斗争的道路。我们的目标是实现民主社会主义，它必须是社会主义，又是民主的！

社会主义的条件

对我们来说，社会主义表示着改变政权的阶级性的，我们曾经在党的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指出，劳动者和他们的代表参加管理国家事务，参加领导社会是个关键问题。我们所说的生产与交换资料的所有制，意味着发展各种方式的社

会所有制：国有化的、集体的、市省专区的，同时还要尊重小私有制。我们所说的劳动人民的政权，劳动人民指的是工人阶级及其周围所有创造财富的人，即城乡各种从事体力或脑力劳动者。法国共产党人为了使民主社会主义早日胜利竭尽一切努力。为了对民主社会主义作出更大的贡献，他们已经改造自己，为了更好地为工人阶级和法国人民服务，成为优秀的共产主义者，无疑他们还将继续改造自己。法国共产党不可能成为社会民主党，对我国工人阶级来说，我们党内没有巴特·高台斯贝格（注：巴特·高台斯贝格即一九五九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他提出了放弃一切阶级斗争〔NDLR〕）。

问：法国共产党的革命和党的理论有了许多改变，其中包括成为先锋队及政权方面的概念；分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尽可能取得各种社会和政权力量的广泛同情，这种理论成功的可能性在西方，在东方却被认为是很小的，他们或明或暗地表示出这种意见；反对结构改革的社会反抗力量十分强大，如果共产党想要实现他们的理想，最终还得求助于暴力手段，就是说求助于这种或那种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你是怎样看待这个意见的？

雅克·德尼：党的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不适应我党政策的实际情况，大会作了根本选择，我国应该根据民主手段特别是普选的方法，表达出来的绝大部分人民意愿通向社会主义。我们不怕选举时多党制，不怕意识形态的较量，不怕行动上相互竞争，也不怕辩论。我们采取这条路线，是基于对当今实际情况的要求进行

深刻分析，民主与最大程度参与负责是我们时代的强烈的要求。这是经济、社会、人道的需要，我们从今天我国阶级斗争的条件出发，考虑到我国及我们时代的现实，吸取了历史的和其它国家的经验教训。对你的问题的第一个回答是我们不能有两种策略。为了对社会进行深刻的改造，在我国除了我们选择的道路外，没有其它可能道路。

困难的实质

这不意味着我们低估了各种危险，但我们没有在你谈到的所谓“社会抵抗”中发现什么危险，进入新社会使那些受偏见、不信任、谎言的影响而与我们疏远的人得到好处，他们会从中得出结论（对许多生活在我们同志管理的城市里的法国人来说这已是事实）。一旦发生问题，我们有一个办法，就是告诉有关的人，和他们一起，解决问题，这种做法使我们有力量，也是明天我们的力量所在。不，危险可能到来，在谈到政权更迭或法国和国际大资产阶级的态度时，我谈到过这种危险性。在这方面我们决没有任何幻想，大资产阶级不会甘心情愿放弃他们的统治，他们时刻表明，要用一切手段保持或重新取得他们的特权，但是我们不会用少数人的一些活动，或用一些会导致孤立和失败的办法去避免这一危险，相反，我们只能用坚持不懈的斗争，在每个阶段团结广大群众和劳动人民的力量，在各个方面采取广泛的行动来提防这种危险，我们依靠关心民主变革的人（他们是多数），努力团结人民群众——我们把它称之为法国人民的团结，这种团结的轴心是左翼联盟，人民团结得越紧，就越能成为多数，大资本家和为他们服务的反动政治势力越孤立，

他们想求助于非法手段，求助于破坏和暴力的可能性越小。我们没有消极防御的想法，我们相信力量，相信我们理想的吸引力，相信人民运动的强大威力，这个时代不是专制思想支配一切的时代，而是世界变革的时代，是欧洲法西斯制度崩溃的时代，是我们日益向往真正的民主、向往人民力量的联合、向往进步、向往社会主义的时代，这也就是欧洲共产主义。

问：许多西方观察家——其中有些认真对待你党变化的人——看到你们党内政治意愿的形成与社会理论之间存在一个矛盾：一方面你们同意在过渡到社会主义时及社会主义制度下各社会和政治力量的各种活动，另一方面，你们党的民主是受民主集中制制约的，你们党不容许党内有不同集团和派别的活动！这不是矛盾吗？

雅克·德尼：把政党和社会作比较，这就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问题，社会是一个客观的集团，在这个社会里生活不是选择的结果，而党则是一个自愿参加的组织，加入党是由个人决定的。事实上，我们争取建立的社会主义，它考虑到社会成员的各种倾向、信仰、意见。为了实现这个政治计划，法国的工人阶级、体力和脑力劳动者创造了共产党这一工具，共产党有科学理论，有经受得起考验的组织原则，党内民主集中制适用于党内生活。党团结那些自愿加入的男女，他们在党内讨论如何更好地实现他们共同的目标，他们内部的争论不是把寻求分歧作为目标，而是共同探讨采取的尽可能完善的政策，党员通过争论达到一致的信念，在群众中和企业中进行有效活动的条件。

参加和作用

人们发现两方面的活动丰富了我们党内的生活：全体党员经常参加制定政策的活动，其高潮是党的代表大会作出战略决策；同时，讨论结束后，一旦作出决议（少数持有不同观点的人有权保留其看法），全体党员无例外地执行这些决议。民主集中制也就是无记名投票选举领导，共产党人指定那些他们认为最有能力执行已确定的路线的同志担任各级领导，同时期望他们不辜负这种信任，在会议确定的路线范围内进行必要的创造性的活动，因为每届代表大会确定的指导原则都是适用于没有做过的事情。例如在今年五月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举行会议讨论国防与裁军问题，决定维持法国的核武器。相反，正象迪韦尔热教授指出的那样，派别和倾向会削弱每个党员的作用，这是确实的，这最终会导致过道里的结帮，形成旨在篡夺领导权的小集团象资产阶级和改良主义党内的情况那样。而且这样做，还会助长言行不一。一个政党应该给予和可能给予的唯一保证就是它的行动。

归根结蒂，民主集中制是一种保证，它向共产党人保证：民主决定的政策将得到全党的尊重，它向我国人民保证：法国共产党说到那里做到那里。我国工人阶级庆幸有了这样一个政党，决定加强它，共产党的队伍以史无前例的速度扩大着。几年中，它的成员由四十万增加到六十万，企业中的支部由五千个增加到一万个。

问：你们党曾多次批评苏联政府国内政策的某些做法（例不同政见者的问题）和对国际主义的理解及其相应的行动（例干涉捷克斯洛伐克）。你们党是如何对待与苏联共产党的关系的？为什么你们党没有学中国共产党和阿尼巴尔亚共产党的样，象许多西方政治家要求和期望的那样与苏联共产党断绝关系？作为确实彻底民主的象征？

雅克·德尼：我党独立自主地确定它的政策与目标，它从全世界的实际经验中吸取教训，但不把任何一个党作为自己的模特儿。同时法国共产党努力与所有反对帝国主义、为争取独立、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人民和民主力量保持友好兄弟的合作关系。

合作的形成

我们极其关心与全世界各共产党的关系，我们明确地、自由地与它们团结在一起，因为它们是共产党，在国际上是利害一致的。我们愿意在适合目前阶段的新形式下，加强这种合作。当前革命运动日益的多样化，我们没有把这种多样化看作是消极的因素，而是把它看作对革命运动的一种充实。我们认为这种合作的主要原则是：平等、相互尊重、独立、互不干涉。这些原则显然适用于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包括你提到的苏联党）的关系。关于这一点我愿说，我们不能低估这些国家、这些国家的人民以及它们的共产党在近代史上所起的重要作用。从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起到古巴人民越南人民的胜利，他们大大改变了世界的面貌，给帝国主义统治以沉重的打击，为劳动人民斗争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他们在经济与社会方面的成就是无可否认的。

虽然如此，我们仍然保持了我们的独立见解，我们不隐瞒我们的不同点与分歧。对我们来说，我们不能用会否定我们理想的办法去达到我们的理想。而对损害社会主义的做法，我们明确提出批评，这样做确实有点新鲜，然而那也是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的。

至于你提到的所关心的问题，应当承认这一点。法国共产党对参与谴责南斯拉夫一事表示遗憾，他拒绝——不管分歧多么严重——任何集体谴责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它主张和各种意见十分不同的力量合作，法国共产党不是一个主张开除更不主张与之断绝关系的党。

问：在西欧占优势的看法是：苏联依仗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实际上企图使欧洲“芬兰化”，他们长期追求的目标是把西欧置于他的影响之下，有人还说西欧共产党在主要点是支持苏联对西欧的外交政策的，至少在西欧陷入与苏联冲突时他们不会站在西方一边。你的党是如何看待苏联对西欧的作用的？假如，由于苏联的压力东西方发生新的冲突时（例如在关于缔结柏林协议问题上）你们的党可能如何行动？

雅克·德尼：我想在根本上来回答你的问题。我们不同意超级大国应该统治世界和欧洲的说法。对我们来说和平共处决不意味着保持社会和政治现状。在赫尔辛基会议上我们要求全而实施会议决议的各项内容（安全、裁军、合作、人权），我们欢呼承认各国人民，在他们需要时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决定其政治制度的神圣权利。

我们要和平，同时要社会主义。我们希望在军事和政治局势缓和方面有所前进，我可以这样说，我们对此特别感兴趣，

过去的革命都是在战争和武装斗争的条件下进行的，现在我们提出处于世界和平条件下的革命策略。不能认为我们会考虑把改造法国社会的斗争从属于任何外国利益、外交、或“世界均势”。

我们拒绝屈服于集团政治

你知道我们虽然支持法国参加大西洋联盟，但我们仍然反对集团政治，今天这种集团政治是帝国主义进行干涉和施加压力的主要手段之一。我们要求法国致力于越过和同时解散现存的集团，致力于建立一种以集体安全这也是法兰西传统的观念为基础的新关系，同时法国应当向苏联和其它参加华沙条约的国家建议缔结一项互不侵犯，互不使用武力的条约，要知道这方面我国是落后的。

我们的建议是对国家安全高度负责的。面对各种威胁，面对不管什么地方来的侵略，我们不愿看到单方面削弱法国的力量，削弱法国的国防力量。

我们对外政策的中心思想是：民族独立、国家主权、有利于推动裁军、建立没有歧视的最广泛的国际合作的首创精神。

我们希望法国不要跟在某个人后头。我们揭露吉斯卡尔政权，因为他们没有提出任何建立欧洲持久和平的具体建议，我们支持这方面的一切倡议，不管是谁提出来的。至于问到我们对侵略的态度，我对你提出这个问题感到高兴，因为在法国人们避免向我们提出此类问题。

事实上，法国共产党总书记于“左翼最高级会谈”前夕的1977年9月23日在一次与弗朗索瓦·密特朗的电视谈话中已

经对这个问题作了明确的回答：“如果照某些人的荒谬假设，法国将遭到苏联的侵略时，那么我们将站在保卫祖国领土的前列。而你们呢，假如法国遭到美国或德国侵略时你能同样保证站在第一线吗？”社会党总是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法国共产党是唯一对法国人民负责的政党。

问：最近苏联的报刊公开批评欧洲政策的理论，——它被欧洲共产主义一些领导人发展了。面对西欧的一体化你党的立场如何？面对美国和苏联，欧洲共同体应起什么作用？

雅克·德尼：我们主张一千个劳动者的欧洲，一个人民的欧洲。我们不仅不想损害把我国与其它西欧国家联系在一起的经济上的密切关系。——因为自给自足的观念对我们是陌生的。——我们还要给这种合作指明一个符合民族和人民利益的新方向。

在这个问题上，关键也还是民主，欧洲建设目前所缺少的，就是劳动者的发言权。今天没有人会怀疑：欧洲经济共同体廿年来的结果揭穿了经济和谐强长，增加福利，增进人民之间友谊等漂亮的诺言。欧洲经济共同体九国的经济情况是一幅被各种矛盾撕碎了的资本主义图画，在那儿人民群众为危机付出了代价：六百万人失业，普遍的通货膨胀，甚至使共同体肌体内的自由也受到损害。人们普遍认为这个欧洲是一个垄断资本的欧洲，跨国公司的欧洲。这就是具有先见之明的人埋怨人民群众不愿参加的根源。应该改变这种方针。这就意味着每个国家都应谴责经济的封建性，让符合劳动者愿望的政策占压倒优势，同时还意味着要进行一场斗争，民主地改造欧洲经济共同体。

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欧洲？

象其它有关国家的人民一样，我国人民需要的是一个建立在平等、主权、相互尊重选择各自政策的自由——在我们看来这是主要的——的基础上各国联合起来的欧洲，是一个从大资本家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欧洲；是一个民主的欧洲，是一个社会进步的欧洲，这个欧洲应该是一个独立的欧洲，这就要求挫败企图把欧洲变成美国的大西洋帝国附庸的计划，这个欧洲应该是一个能为缓和裁军作出贡献的和平的欧洲，这个欧洲应该是在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上相互合作，同时向全世界开放的欧洲。我们打算和所有赞同这种愿望的人共同努力建立这样一个欧洲。经过这样改造的共同体具有每个成员国的强烈特点，无疑能对某个国家表示出——不是为此建立一个新的集团——自己的独立意志。无疑能在世界事务中成为一个和平和广泛合作的因素。所以我看不出我们和你提到的大国存在对抗关系，而是友好关系。我们设想的这样的欧洲可以摆脱监护，可以和美国苏联以及希望这样做的所有国家建立卓有成效的关系。

问：西欧的保守势力打着“自由或者社会主义”的旗帜准备建立一个联合阵线，参加欧洲的选举。另一方面，欧洲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直到有影响的开明的资产阶级，他们在诸如对政治经济民主的估价上，以及继续执行缓和政策方面有着一些共同点。你们党是如何看待这种

发展的？特别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作用是如何估价的？

雅克·德尼：“自由或者社会主义”的口号是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在一九七六年选举运动中提出来的，这个口号是根据一种排斥异己，仇恨别人，掩饰右翼敌人，禁止共产党活动的政策提出来的，现在又指责社会主义理想本身，这种做法在法国已是传统的习惯了。

欧洲选举

把选举扩大到欧洲，引起了人们的不安，用政治术语来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这股力量，将会越来越显得重要。

然而，欧洲选举（能否如期举行，还不能肯定），并不是为了加强欧洲右翼力量的团结而由社会党筹备的，恰恰相反，是由三个超国家组织的头头分别各自召集基督教民主党人，自由党人，社会民主党人经常在选举的事务和政治准备方面进行磋商，宣布作出了《公平交易》的决定。

欧洲经济共同体社会党联盟主席 W·Drosher 就这样宣称过。他还和威利·勃兰特一起于今年六月提出了由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起草的共同纲领计划。他还准备打击与共产党人联合的“幽灵”，他宣称：“即使进行直接选举，也不能和欧洲共产党人合作。”你提出的问题给了我一个谈谈社会民主党作用的机会，社会民主党对决心推动欧洲社会进步、民主、缓和的各种力量的合作是十分重要的。

带头反对共产主义，给工人的施加压力破坏团结，使大资本家的统治无限存在下去，这不是社会民主党的出路。

我们希望的合作

我们对此感到惋惜，我们经常利用一切机会谈到这一点，我们坚持我们的原则，所以我们是光明正大的人，是善于团结人的人。共产党、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基督教和进步力量没有把他们的力量联合在一起，这是一个缺陷，有待弥补，然而联合的愿望应该是相互的，应该结束那种落在生活后面的态度。我们仍然准备和德国社会民主党联合行动，交换看法，进行接触，就象我们和社会民主党所做的那样，我们共产党人既没有欧洲机构，也没有国际纪律，也没有统治党。共同的理想，使他们在欧洲共同体范围内为自由、为合作和平而行动起来。不管任何情况，法国共产党届时准备参加欧洲选举，今年夏天我们挫败了那抛弃吉斯卡尔政权的计划，把保证我国人民成为自己命运主人的条文写入我国法律，在这方面我们经普选产生的欧洲议会的代表也能表现出我们一贯建设性的精神，证明我们参加议会代表的积极性。

[摘译自法国《共产主义手册》，

1978年4月号。蔡志云译，葛智强校]

欧洲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 过渡的长期性

埃里克·霍布斯鲍答记者问

问：欧洲共产主义是近几年来一桩新生事物，你是怎么看的？照你看来它意味着什么？

答：我感到人们是从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来理解“欧洲共产主义”的。从狭义的理解——表面的理解——是欧洲国家例如欧洲经济共同体各国，遇到了以前所没有遇到过的共同问题。从广义上看，就是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长期分析，这种分析包括专门制定一些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策略。这些国家的特点——文化和法制上的——毫无疑问是有着一种自由民主的传统，但这并不是很普遍的现象，在日本，那里共产党所处的地位和欧洲共产主义相似，但却没有一贯的自由民主文化传统。

不能把欧洲共产主义问题和接受捍卫某种形式的制度混为一谈。这个问题无疑是上述大部分国家的一个中心问题，它是与资产阶级的霸权联系在一起的，广大人民和工人阶级内心赞同并由于合法的原因，接受了资产阶级的体制，因为这不是一个骗局。然而我并不想把对于欧洲共产主义的争论与简单的人权问题讨论相提并论。

问：在意大利，一些与社会党思潮多少有些联系的知识

分子试图作这种类比，他们所持的典型的反驳意见是“欧洲共产主义”是工人运动尤其是共产党达到治理国家的策略，要达到这个目标就需要一种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没有的国家理论，因此这种理论只能在自由民主的传统中找到。

答：这就等于说是把随便什么民主和国家的理论都看成是自由民主的理论了，这在历史上还没有得到过证明。同样，我也不相信人们能够接受社会党人的这种观点，在他们看来，全面的欧洲共产主义势必要求全盘接受自由传统并把马克思主义归并到这种自由传统中去。认为自由民主是任何民主政治的唯一的，不可避免的普遍现象未免太夸张了。毫无疑问我们应该引起对自由民主的重视，首先是因为组织行动和政策交流某种程度的民主是主要的，但决不是说这些行动和交流必须采用历史自由主义的形式。其次，我们接受某种程度的“古典民主”，这是因为，在这个程度上，它对作为群众运动的工人运动来说过去是有用的，现在还继续有用，（我所指的这种程度是在资产阶级行使的霸权范围内）。第三，我们之所以接受这种民主，是因为象在美国、英国尤其是法国这些国家里，民主是作为工人传统的一部分。如在法国，捍卫共和政体是工人运动的历史。激进派，共和派，社会党人等联合起来反对贵族和特权是历史事实，应当把它视为普遍原则，而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却忽视了这一点。

然而是否能把这种形式就看作是唯一的具体的形式甚至是唯一可行的思想意识？我认为不能这样看。为什么要把自由和民主看作是一种自由民主思想呢？“民主”和“自由民主”是两回事，把它们看作是一回事这可能是一种错觉，因此我认为欧洲共产主义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它并不和具体的政治，经济形势比如目前的危机或意大利共产党目前的形势有

关，因为这些只不过是具体的事件。我认为应该有一个更全面的看法，欧洲共产主义理论首先源自承认苏联的革命经验并没有、而且从字义上来理解也不可能传到许多国家尤其是发达的国家，因此有必要重新研究一下具体情况。其次我认为欧洲共产主义源自资本主义的发展，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其它国家里的普及，意大利就是这样，西班牙在很小的程度上也是如此。因此，此后人们称之为欧洲共产主义这个问题的提出并不局限于欧洲，涉及到本大陆上的所有发达国家及其它国家。

问：你这就是说欧洲共产主义是由于“苏联的模式”不适用于发达国家和对东欧革命的成果的抨击而产生的。

答：这一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问题，就我个人来说，我不同意有些人所说的，共产党之所以没有什么作为，是因为跟苏联跟得太紧了的缘故（我们国内就有人这么说）。确实，大部分英国人和其它国家的人民比我们早得多地认清了苏联的消极面目，那么为什么英国共产党还是一个小党呢？在意大利，尽管党外舆论明显地认识到斯大林的罪恶，但意共却是一个大党，问题就是这样复杂。我认为不能从策略上来考虑。正是我们自己看到了在苏联某种形式的发展是消极的，也是我们自己不赞成斯大林主义式的社会主义，面不仅是因为公众舆论的反对。这并不是象人们有时指责我们的那样出于选举的策略，尤其是二十大后，甚至在近二十年里，这种在曾经是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在特定的，极为不利的条件中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就显出了自己的弱点，这就说明了我们为什么要讨论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关系，为什么在欧洲共产主义中也要反映这个问题。如果认为这个问题的出现是因为假如我们是斯大林主义者，社会党人及基督教民主

党人就不投我们的票，那么这是错误的，我们是由于其它更深刻、更重大，关系到通往一个新社会的原因，而不再成为斯大林主义者。

问：然而不妨让我们指出另外两件事：①许多国家出于自身的考虑，程度不同地觉得建设一个新社会可以有不同的形式和途径，对民主和社会主义问题进行过互有争论的研究，1968年以后，这种研究就变成了要在这方面有所作为的政治需要了。②这种互为争议的研究，长期以来（就意大利共产党而言，则是自1945年制宪会议以来才接受政治多元论思想的）一直是以民主和社会主义关系为中心的，意共、法共和西共越来越认为在与自由民主不同方面的政治多元论是过渡社会和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必然枢纽。依你看，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以来的四十年，应该怎么划分时期，这两种事实的历史原因是什么？如果在1956年，和平共处的政策成功地表明苏联的主动能够成为把社会主义派，共产主义派，民主社会主义派的工人运动统一起来，能够团结不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一股力量的话，到了1968年特别是干涉捷克斯洛伐克后，这种主动就不能主要来自苏联了，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事实上存在着很深的矛盾。

答：确实从1960年——1962年开始，早在1968年以前，国际共产主义内部就已经表现出十分尖锐的矛盾，同时和平共处和苏维埃政策的总的倾向使苏联变成了一个在国际上总是采取积极主动，决定别的民族和国家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而进行社会主义斗争的强国了。

我感到十分遗憾的是，各国共产党之间讨论问题的统一国际论坛再也不存在了，因为自从中苏分裂以来这种讨论已经不可能了，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一些地区性组织在一

些共同性问题上彼此谅解，不把自己的问题强加在其它组织头上，也不要以此另立一个新的中心，这样做是完全正常的。对于多元论问题我还没有十分明确的见解，我们清楚地感觉到，社会主义的很大弱点就在于缺乏一个讨论政策和选择政策的机构，我认为将来应该建立这样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机构。

问：这个问题不仅涉及到工人阶级和其它阶级的关系问题，而且也确实是工人阶级内部的一个问题。

答：主要是工人阶级内部的问题，地道的“多元论”，它的前途要求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目标上发生相当深刻、重大的变化，这种多元论涉及工人党、社会党、共产党，也涉及到其它政党，涉及到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党。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逻辑地正视一些历史的低潮以及进步的政府的失败的教训。这样做也许可能找到向社会主义长期过渡理论上的可能性，这种过渡不宜过快，不宜仓促从事，用夺取政权的手段在“一个晚上”……

问：然而我们有过资产阶级的历史经验和别的过渡例子（非机械地过渡），这些经验使我们得出多元论的两个观点。第一点，正象你所说的，资产阶级民主为我们提供了历史上最先进的统治形式，因为它具有多元论的因素。

答：我们完全同意，我个人也一定会尽力指出这一点的。

问：对于工人阶级，对直接生产者和其它社会阶层来说都一样，多元论政治可以十分明显地确定在以全而领导权问题为中心的冲突中各阶层的地位。

答：是的，但主要的问题在于，一般说来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多元论倒还是转折时期的产物，在资产阶级和贵族的长

期斗争中，中欧、美国在十八、十九世纪大概有过一些向资产阶级政权过渡的先例，但在这成为可能以前，就发生了十七世纪的反专制主义革命。

问：是克伦威尔领导的革命。

答：是他领导的，在十七世纪，资产阶级虽然未取胜，但这场革命已经运用了多元论。

问：对多元论的第二个观点是，即使无产阶级没有十七世纪革命的经验，然而却有着十月革命，苏维埃国家和中国革命的经验，通过这些经验，人们能够构划出一些确切的东西，可以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不要忘记随着这些革命（中国革命大概不在此例）的发生，它们的过渡时期已缩得极短，同时也破坏了政治多元制。

答：另外我感到葛兰西提出的霸权倒是一个问题，在革命的形势下，在工人阶级和它的政党或运动占主要地位的形势下，人们可以设想会有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的高潮和低潮的漫长阶段，主要的问题是要了解在这些运动以前，是否能取得领导地位。在目前危机的形势下，谁行使领导权！工人阶级能否行使这种职责，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能否在历史上独树一帜？这是主要的问题。

另外，形式主义的观点认为必须打碎国家机器，我感到这种观点是极其肤浅的，对于能否在历史上起到独树一帜的作用，这样一个重要得多的问题来说，这个问题终究是次要的，这种政策从长期来说将对谁有利？

问：但是在这个方面，你是怎么看待欧洲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共产党之间新关系的这个问题的？你十分强调的危机并不只是一种经济结构的危机，而且还是一种政治危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社会民主党以多数统治着国家，在瑞典，社会

民主党在执政了半个世纪以后失去了多数的地位，在英国，社会民主党的地位则说不上稳定。因此在工人运动内部（并不只是内部）是不是不存在新型关系的可能性？

答：这完全和各国的形势有关，在南欧的一些国家里，社会民主党十分弱小，而共产党却是大党，相反在北欧情况则完全不一样，共产党即使在工会活动的某些部门中（瑞典共产党还在政治活动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但除个别情况外，它们都不是举足轻重的。所以毫无疑问，主要的问题是要改造这些群众性的社会民主党，因为工人阶级要想实现从社会民主派到更为革命的政党的巨大过渡是不现实的。由于共产党的理论和传统与社会民主党的传统和分析毫无共同之处，所以历史的差别是很大的，各国共产主义者深感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至少希望这样做。相反，社会民主党有着许多不可忽视的优点，如象瑞典的社会民主党的第二第三代人以来，他们一直希望不直接依靠建设一个社会主义而使他们的地位有所改变。

问：但是今天这种政策处于危机之中。

答：当然，这些政策是处于危机之中，但必须分析这个危机的特征，这里有两种现象，①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它开始于七十年代初，但从1968年起人们就已看到了这种危机的征兆。五十一—六十年代的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已经开始衰败，现在我们处于危机之中，它虽不同于三十年代的那场灾难性的危机，但却与十九世纪末的“严重的不景气”相似，那时上升阶段过后，出现了二十五年的萧条，生产虽然持续增长着，但积累机构却不能象以前那样运转自如了。同样，目前的危机并非是一个短暂的周期，而是不影响生产增长的萧条的开始。②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过

渡的内部矛盾，这种矛盾是三十年代危机的结果，过后的复苏，是以很高的代价换来的，尤其是在结构上，使得社会生活官僚化引起的绝望和思想危机，激起了1968年青年运动甚至工人运动的情绪，使得人们认识到这个经济发达的新资本主义制度有些方面已经不行了，它迫使人们处于寄生地位，这种现象不是那么容易扭转的。

问：你认为这是一种长期不景气的灾难性恶果。

答：是的，尤其是对于意大利，英国这类最虚弱的国家来讲是一种灾难，今天的危机说明它们的“最高阶段”时期已过，在15—20年前“黄金时代”已开始衰弱了。

问：从三十年代初开始，资本主义长期的改组和治理方法获得了一些发展，资本主义的这种发展是否是不可扭转的局势？

答：我认为它包含着某些社会化的因素，包含着全体公民对社会共同直接负责如计划化，管理权，建立整个社会保险机构，但是没有任何社会主义因素，这只不过是一场消极革命，从长远来看，这是主要矛盾所在，这种消极革命的一个结果是最终使人们得不到满足，至于今后工人运动和生产力的发展，这种情况将更复杂。

问：你是否认为人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危机”指的是马克思不适应道德——政治在消极的革命中的巨大的发展和传播（消极革命源于组织群众是受上面控制的），但是即使在欧洲，群众也并不是消极的，而是用自己的运动，或是明确表示或暗示提出某种新内容的方法作出反应的。

答：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说群众是消极的，有时他们以粗野的非政治的方法作出反应，他们是出于做人的需要，反对国家机器这种人类的机器，我们不应忘记，前面提

到过的严重不景气的时代，正是欧洲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飞速发展的时代，因此我认为只是在目前才有这种危险。当然，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反映了某种形势及分析上的缺陷，长期以来，我们都是事后才进行分析的，常常是事情过了才说我们错了。战后我们长期期待的“最后崩溃”并没有发生，我们很晚才懂得这个“最高阶段”的基本因素是什么。但是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危机”是假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症候，对于客观世界的完美分析，应该得出正确的预见，而我们就缺少这种预见，我们所看到的东西并不能使我们有多大的高兴，而按照葛兰西的“悲观的理解”的原则，我们应当学会承认世界上还有使我们不愉快的东西。

问：那么你对此得出什么结论呢？是得出否定“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它解释或预见世界的能力的结论呢？还是肯定它还要从另外方面发展的结论？因为事实上在这方面是有争论的，人们可以从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方面进行讨论。

答：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已从内部和外部的正统思想中解放了出来，在目前它更具有分析现实的能力；在目前危机的形势下，出现了一种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愿望，我认为，近几年里最大的障碍是使马克思主义成为抽象教条的偏向。

问：你指的是阿尔蒂塞尔？

答：不，我不光是指阿尔蒂塞尔。人们忘记了马克思认为对于社会内部的分析就是作政治经济的分析，然而人们却常常把它作为一种认识论，这种哲学和认识论的政治作用是撇开物质基础来证明战略和策略。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应该从经济的具体现实和社会的趋势出发，不能只限于数量方面的分析，而应该从今天已有很大不同的资本主义发展大的趋势出发。

问：不久前你介绍过葛兰西的著作，把它称为是理论研究的巨大创举，这本书研究了已经发展到全国规模、但是还没有掌握新的领导机器的工人运动，它总结了政治组织和工会组织方面的丰富经验，今天你是否认为同样存在这些问题吗？

答：如果说我们真是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那么无疑应该在理论上作出巨大的努力，“欧洲共产主义”也不应当被当作一种地区性的“意识形态”提出来。例如，最近，在发达与不发达国家的关系中，出现了一种应该采用一种结构上和策略上分析的新的倾向和一种新的可能性，现在有一种忽视全面情况，重视发达国家因而成了具有世界意义的“消极革命”的俘虏。瞧，这样想多么轻巧：“总之这些印度人一直处于饥饿之中，这不是什么新问题，”怎么不是呢？他们的影响在当今的国际上确实已与过去大不一样了，资本主义企图向这些挨饿的人们提供价格不太昂贵的产品，而这对我们来说就有直接的影响，这就可能更具体地提出了国际主义问题，它不仅是道德和政治问题，而且是全球性问题。

〔本谈话发表于1977年3月25日《再生》

周刊，戴德嫻译，葛智强校〕

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人 的欧洲政策

R·E·M· 欧 文

由于意大利共产党人部分地掌了权——朱利奥·安德雷奥蒂的天主教民主党政府正是依靠了他们善意的中立——以及如果法国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左翼联盟赢得预定于1978年3月举行的大选，法共准备参加人民阵线政府，因此，比较和对照欧洲共同体内这两个主要的共产党的欧洲政策是适当的。他们对待一体化的确切的态度是什么？他们将把一体化置于什么样优先地位？人们应当怎样认真地对待意共明显的“欧洲主义”热和法共明显地热衷于“戴高乐主义”的民族主义呢？当欧洲议会于1978年直接选出之时（或者也许应该说假如选出的话），我们也许将会看到一个强有力的“欧洲共产党人”集团出现在欧洲议会么？如果这样一个集团将出现，它特别对于欧洲共同体，以及一般对于国际关系将意味着什么呢？一个“欧洲共产党人”集团，甚至只是一个松散的联盟，将多半是共同体稳定、加强民主和社会改革方面的一个因素吗？还是一种不稳定的要素：一方面在东欧激起了象杜布切克那样的自由化要求以推翻苏联，与此同时，鼓励了曼斯菲尔德式的要求、缩减美国对北约组织承担的义务从而削弱了西方的联盟？晶球算命不是本文的目的。但是，对于意大

利和法国共产党的性质连同它们过去关于欧洲一体化声明的考察，能够提供某些关于它们在该地区对外政策方面未来的、很可能的政治倾向性的线索。

首先叙述有关意共和法共的性质及其最近的演变是重要的，因为它们的欧洲政策只有在意大利与法国政治发展的特殊的来龙去脉和国际体系变化的总的来龙去脉中才能被理解。两个因素似乎具有特殊的重要性。第一个是意大利和法国共产党人现在都宣称具有“组织政府的使命”：他们从代表斯大林冷战时期的消极反对中走出，向前迈出了一大步；他们现在表明他们的目标是与志趣相投的党在一起，用议会手段去改造社会，无论在他们掌权之前，更加重要的是在掌权之后，都要尊重他们的全体选民的决定。为了追求通向政权的议会道路，两个党都不得不面对它们自己国家和整个西欧的政治形势的现实，和放弃在它们政治上被隔离时期那种纯粹是阻挠议案通过的策略。

第二个重要的因素是在超级大国之间缓和的时代，在多中心（或者至少在共产主义世界的多中心）时代，意共和法共就有了可能在不否认它们生来就有的权利，例如它们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所承担的广泛的义务的同时，发展它们自己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同时脚踏两只船的这种企图，确实引起了矛盾的对外政策声明，也周期地收紧了克里姆林宫和意大利以及法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本文所关心的重要问题是：法共和意共这两个红衣主教准备在发展其民族教派中走多远。值得重视的迹象是，尽管意共总书记恩里科·贝林格和法共总书记乔治·马歇都没有任何指望充当路德的愿望，但是两者——特别是贝林格——下决心使他们党的政策适应当代西欧的政治形势，他们认清

了他们据以活动的社会与政治气候大大不同于1917年的俄国和1945——1948年的东欧。

“意大利的社会主义道路”

意共是非共产主义世界最大和最强的共产党，它有180万党员，在1976年大选中获得1,260万张选票，战后，在每一次大选中增加了得票的百分比（它最大增加的一次是从1972年的27.2%加到1976年的34.4%）。但是关于这个党的最重要的东西也许是：它是非常意大利化的。意共的精神之父可能是马克思，但是它的母体却是意大利政治的和社会的文明，这种文明的本质是进化论，一个新的评论家在论及意大利政治时把进化论定义为“根本不同的甚至对立的见解的互相渗透，……（进化论）模糊了政治家们及其观点之间的不同之处，……取消冲突的爆炸性，使得抛弃狂热，把争端置于人情的水平上，防止夸张以及使妥协成为可能”。换言之，纯粹的、黑白分明的政治解决方法是与意大利政治文明不相容的。或者从另一方面来说，作为工具用以分析意大利党派体系的左派和右派的传统的政治概念只具有有限的价值。毫无疑问，就部分地说，这个独特的体系是一个历史和宗教的遗产：多少世纪来意大利人遭到多次入侵，他们已经学会了为了生存的缘故而妥协，同时，罗马天主教教会使它的追随者对人间的生活充满了“悲观主义”的观点，在这个世界上，从“生下来就有罪”的人类中是不可能指望得到完美的解决办法的。妥协和联合、文化和传统的啮合、以及混淆政治权术与政治道德的界线的总的趋势，都是意大利政治体系的特性。

意大利政治和社会文明的这些方面，被意共从一开始就吸收了，现在有清楚的迹象显示它们正在反过来影响意共的性质。该党的第一个领导人和最大的理论家安东尼奥·葛兰西认识到——至少在短期内——如果共产党人要掌权的话，不得不与天主教作出某种妥协。他的接班人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同意了已经写进1948年共和国宪法的拉特兰条约（它给予天主教教会在意大利以特权地位，特别是在教育方面）。自1973年10月以来，意共正式的目标已是“历史性的妥协”，该党现任总书记把它定义为“为了给予这个国家的政府克服危机和使意大利取得进步所必需的广泛一致的基础和力量，在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天主教民主党人以及具有天主教渊源和世俗的民主传统的其他反法西斯的人民力量之间的一种理解，一种政治联盟”。换句话说，存在于意共思想中心的是实用主义，不是意识形态的纯洁性，而且在其绝大部分历史中是这样做了。这种实用主义已经成为该党内外政策的特性，对于它的欧洲政策具有特别的关联；的确，意共在1948——1958年的十年间，对于大西洋联盟和欧洲一体化的彻底的反对，现在从它的以一种本质是实用主义的方法来观察几乎一切问题的总的趋势看来，倒是反常了。

意共另一个对于其对外政策关系重大的特性是：它信奉多中心主义。该党的评论家真的已经正确地注意到党内有了一点民主，但是该党（作为一个共产党）乐意比较公开地争论问题，要追溯到葛兰西和“新任教会执事”，这曾经受到陶里亚蒂——特别在他的晚年——的鼓励，今天在党的理论刊物《再生》周刊上以及较小的程度上在它的日报《团结报》上持续着。党的最后两任总书记的两条语录将足够说明这一点。1969年，被许多人视为执行相当强硬路线的传统主义者

路易吉·隆哥对意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说，意大利共产党的目标是“一个基于人民赞同基础之上的多中心社会；……一个分散的、没有官僚政治的社会，在那儿将有宗教、文化、科学和艺术的自由，表达和报道的自由，以及思想的自由传播。这些将是意大利社会主义的特点，它在众多的政党和社会组织中兴盛起来，它非常不同于发展至今的那种社会主义。意大利社会主义将符合我们人民的传统和意志”。所有这些是与以苏联和东欧为代表的那种中央集权制的、官僚主义的国家的社会主义大不相同的东西。当然，这样一种立场态度是否可靠还值得怀疑。

可是，意共信奉多中心主义有一段相当长的历史，它暗示该党已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其中包括这样的概念，即党的领导总是最好）。该党信奉多中心主义也暗示它相信社会主义的——最终是共产主义的——社会能够达到，与其依靠暴力革命或者干脆认为共产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发展，不如依靠在思想市场上赢得它的战役。当然，这种信奉使得意共看起来更象北欧社会民主党，但是贝林格最近已经否认了这一点。他认为该党是共产主义的党，因为它超出了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范围，“我们的任务是逐步地在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方面进行真正的改革，直到我们从根本上改革了统治阶级[重点是我加上的]……这个改革必须充分自由、完全民主地进行，必须在共和国宪法的原则和准则的范围内进行，必须尊重和强调自治和多中心主义，必须坚持人民的参加。”

对于意共的这些评论，难免是等于对这个党的性质的速写分析，但在研讨意共对外政策的来龙去脉中，重要的是强调我们所论述的是这样一个党，它有着信奉多中心主义和走

意大利特殊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相当长久而始终如一的记录，它经常强调使自己适应意大利和整个西欧文化和宗教传统的需要。因此，贝林格建议与意大利天主教徒实现“历史性的妥协”，以及建议逐步达到民主的、社会主义的、一体化的欧洲国家共同体，他的建议不应看作是突然的转变，而应看作是意大利共产主义长期发展的合乎逻辑的结果。

“法国色彩的共产主义”

另一方面，法国共产党是欧洲共产主义新近的皈依者，从它最近——不去提它过去的——许多变节言论来看，比起意共，我们更有理由要持怀疑态度来判断它的内外政策，至少要更加小心谨慎。无论如何，不应怀疑法共近年来已经大大地改变了它的政策。1974年总统选举的后果，法国共产党人度过了与弗朗索瓦·密特朗的社会党关系极为紧张的时期，但法共看来终究下决心继续推行他们的人民阵线战略，其结果是他们不得不对社会党人作出了一些让步。例如在多中心主义和人权问题上，法共从它原先谴责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立场倒退之后，最近对苏联和东欧的实践表示了比意共更为严厉的谴责。然而，毫无疑问，比起意共来，法国甚至组织得更僵硬和更不民主，结果，法共领导可以突然通知剧烈地改变它的政策。可以肯定，根据以往的证据，它的对外政策的改变比意共更为突然。

法国共产党是组织得很好的，四十万党员组织在以17人政治局和5人书记处为首的、使自己始终在台上的中央官僚控制下的严谨、垂直的组织之中，而乔治·马歇则在这个金字塔的顶端。它在选举上也是重要的，“在战后历次大选中

获得了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选票。但是从1947年到1965年”，它仍然处于政治上隔离之中，当时“由于冷战形成，共产党人被赶出了政府。在1956年的总统选举中，他们联合社会党人投票支持密特朗。在1967年和1973年的大选中，联盟取得了成功”（前一次有一个竞选契约，后一次有一个竞选契约和共同纲领）。“1974年，人民阵线各党差一点把密特朗而不是吉斯卡·德斯坦选进了爱丽舍宫”。左翼许多非共产党人投票者还是不信任法共，认为难以相信：这个曾经最受克里姆林宫束缚的共产党，真正能够改变它的外表而适合于法国。如同意共之于意大利，可是1977年3月，在地方选举中，社会党人几乎以同样的纪律在第二轮投票中投共产党人的票，正如共产党人已经整整十年投了社会党人的票。显然，法共已经最终的走出了冷战的年代，如果在下一次大选中，全体法国选民将以一种类似的方式投票，那末，共产党人将会发现他们从1947年来第一次进入了政府，当然是同更强大的社会党人联合进入政府。因此，要问法共真正发生了多大变化是适当的，如果有的话，这种变化多半会以什么方式来影响它的对外政策。

首先，法共现在看来坚定地要与社会党人结盟以组织政府，这意味着它几乎肯定将准备修改它的对外政策，使之更与社会党的对外政策相一致。可是，关于这个联盟应该提出一个防止误解的说明。近在1974年5月，即总统选举中的左翼联盟几乎要成功之后不久，法共突然发动了一场组织“全国阵线”的运动，运动的目标是使戴高乐主义者和“其他爱国者”在反大西洋主义（即反美的）宣言问题上与左翼联盟结盟。社会党人生怕这样一种“集中”将溃散左翼联盟，戴高乐主义者对此建议毫无兴趣，俄国人也不喜

欢它，觉得反美的沙文主义在法国的复活将打乱“缓和”。此外，从共产党候选人在1974年9月重要的补缺选举中把地盘丢给社会党人来看，选民似乎拒绝了这个建议。1974年10月，法共取消了组织“全国阵线”的建议，就象它提出时一样突然，而代之以开始对社会党的六个月的谩骂。对于这两场运动唯一合理的解释，似乎是认识到正在把地盘丢给社会党人的共产党人，决心要末在庞大的、不明确的“全国阵线”组织内部再次宣称他们在左翼方面的优势，要末攻击社会党人以强调其不同于社会党人来达到上述同一目的。到头来这两种策略都失败了，法共认识到通向政权的唯一道路是与非共产党左派进行合作，尽管他们不时愠怒于色，还是求助于社会党人合作。值得注意的重要之点是，法共领导还可能不必明显地搅乱党的下层就出乎意料地改变政策。以前发生过的事，毫无疑问还可能发生，因为虽然法共在1976年2月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马克思的党的领导的专政的委婉语），毫无疑问，马歇和他亲手挑选出的“党的机器人”保持了对该党及其政策的牢牢控制。这使人想起尽管法共的欧洲（或任何别的）政策易于有些反复无常，但是至少还有相当大范围的灵活性，例如，现在看起来法共肯定会听从社会党人对欧洲议会进行直接选举。

近年来，法共已经作出了有意义的、明显的、带有决定性改变的领域是人权领域，这个改变是重要的，因为它标志着导向欧洲共产主义的一个鲜明的转变，即是法共显示了它愿意采取一种“独立的”共产主义路线，即使惹怒克里姆林宫也在所不惜。在十年前这是不可想象的，甚至到了1975年，法共是否为了自己竞选的利益而真正准备与克里姆林宫保持一定的距离，也是有疑问的。法共批判斯大林主义肯定比意

大利人慢得多，六十年代中苏争端完全公开化，法共对于共产主义世界日益严重的分化举棋不定。法国共产党人太忠诚于难忘的斯大林了，以致不刊登1956年赫鲁晓夫列举斯大林独裁罪行的秘密报告，一旦涉及此报告，总是作为业已结束的一章这一角度来讲，认为这是苏维埃历史中一种奇怪的、脱出常轨的东西，现在看来只限于过去才有。

1968年，法共首次与自己忠实于莫斯科的传统作了重大决裂，它谴责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但不象意共那样，它拒绝谴责发生在“正常化”后的镇压。1974年，法国共产党公开谴责流放索尔仁尼琴，但拒绝参加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发起的西欧共产党人对苏联总的对知识分子政策的共同批判。可是到1976年，法共看来已经与斯大林主义的过去最后决裂。它公开批评苏联在1975年末和1976年初在若干场合下滥用权力，特别是把俄国数学家普里奥契拘留在精神病院中。1975年11月，马歇与贝林格发表一项共同声明，保证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尊重“思想和表达的自由，出版的自由，集会和结社的自由，示威的权利，在国内外的自由迁徙，私人生活不受侵犯和宗教自由，以及各种思潮和每一种哲学、文化与艺术见解表达的全部自由”。声明最后说：“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人赞成多党制，赞同反对党的存在和陈述自己立场的权利，赞同自由组成多数派与少数派及其有可能民主地轮换，赞同国家的凡俗性质及其民主运行，以及司法独立。”

其后，在1976年2月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法国共产党人从他们的党章中删除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用语。这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因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是马克思讲到的，一旦共产党掌握政权，它将不会自动放弃的说法，或

者至少在建成完全的共产主义社会之前不会放弃它，到了那个时刻，列宁宣称国家机器将“消亡”，在无冲突的社会里变得过时了。在此，马歇又向意大利和西班牙共产党的欧洲共产主义思想采取了重要的一步。马歇说“在每一阶段，政治上的多数必须与算术上的多数相一致”，他以此来详细阐明对于多党制的赞同。这个声明是在关于葡萄牙革命的讨论中申述的，它等于是对阿尔瓦罗·库尼亚尔的“斯大林主义的”葡萄牙共产党的谴责。在1975年4月的葡萄牙选举中，库尼亚尔的葡共只赢得了12.5%的选票，在这个微弱的基础上，葡共宣称它有权“领导革命”。葡萄牙总理瓦斯科·贡萨尔维斯准将以同情共产党的观点著称。共产党的少数派设法占据了政府、宣传机构和大学里的重要职位。这种试图对于政府关键职位进行列宁主义式的渗透在十月里失败了。至于法共的态度，只能说整个1975年它采取了骑墙的态度。与此同时，意大利和西班牙共产党人象整个西欧的社会党人一样，谴责葡萄牙共产党人企图从少数派地位出发夺权和“领导革命”。当然，库尼亚尔得到了莫斯科的支持，因此马歇在1976年2月宣布放弃原来的主张，转而谴责葡萄牙共产党人，实际上是在批评苏联领导。此外，在这同一个月，共产党的日报《人道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批评苏联不顾1975年8月的赫尔辛基协议拒绝尊重基本人权。接着，在1976年6月，马歇在东柏林举行的欧洲共产党人会议上，宣称他信奉“意义深远的民主社会主义”，它包括意见与表述的自由，创作和出版的自由，集会和结社的自由，以及罢工的权利。把罢工的权利包括进去是有意义的，因为在法共1975年5月的“自由宣言”中没有提到它。

看来很清楚，法共已经——至少暂时——采取了一种意

大利式的针对苏联的“独立”姿态，假如这种情况继续如此，该党可能完全追随意大利共产党人，在欧洲共同体的发展问题上采取更加灵活、更加实用主义的态度。

意共和法共的欧洲政策

意大利和法国共产党人起初象他们的苏联同志们那样，统统反对建立欧洲共同体，他们从根本上把它视为西方联盟的“经济基础”。如果欧洲经济共同体是成功的，他们争论说，这只会加强资本主义和北约，因而加剧东、西方的紧张局势，使欧洲划分为集团的状况永久存在下去。但是在1957年罗马条约签署后的五年之内，意共开始改变对于欧洲共同体的态度，它争辩说：西欧经济一体化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发展，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控制这种发展，保证其演变为强大而民主的社会主义组织。在七十年代，意大利共产党人日益争辩说，在国际上经济一体化（或者至少互相依赖）的时代，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国内建设，而必须跨国界地建立，首先通过诸如欧洲共同体这样的组织在地区一级的水平上建立起来。换言之，意共争辩说：“意大利社会主义道路”——该党多次引用的口号——只有在“欧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点上来说才有意义。对比之下，法国共产党人对共同体采取一种更加民族主义的、更带有批判性的态度；例如与意大利人不同的是，他们反对英国进入欧洲共同体，直到最近他们还是坚定地反对欧洲议会的直接选举。可是，实际上法共已经开始修改它对于共同体的强硬路线立场。

至于意共，它对于欧洲共同体的态度的转折点出现于1962年，这是由于非常实际的原因：在1957至1962年间，意

大利的“经济奇迹”达到了顶峰，共产党人不可能否定向意大利的冰箱、洗衣机和汽车开放的这个新市场与该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有点关系。

乔治·阿门多拉，该党关于欧洲事务的主要发言人之一、现任该党在欧洲议会的党团主席，在1962年3月一次关于意大利资本主义的会议上说：“我们对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批判态度，虽然是一种负有政治责任的态度，但它伴随着对于共同体规章的运用将会带来的经济困难的过高估计，以及对由于欧洲市场初步形成而引起的意大利经济发展的新的可能性估计过低。事实上，有利于经济发展是符合工人阶级利益的，这种发展将使意大利经济在国际市场上获得竞争能力。技术进步和意大利经济的现代化是当务之急，它必须得到民主的、发展的方针的支持，而不要资产阶级少数集团维持的落后状况。欧洲经济共同体不可避免地对资本主义集中的进程作出了贡献，造成了再调整的危机，扫除了对于过多的、高昂的机构开支的忧虑。但是，就我国工人阶级与其他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的工人力量一致反对控制共同体执行机构的垄断力量而言，所有这些使得发展一个‘欧洲的’斗争成为必需。”

这个声明值得引用如此之长，因为它包含了意共从那个时期以来对于欧洲共同体的分析和态度的精髓：实际上，阿门多拉把经济一体化视为不可避免与不可逆转的发展，因此，问题是如何使它变得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如何保证生产的手段由人民群众来控制，以致于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能在西欧发展起来。

这种对于欧洲共同体的赞同——尽管是一个将不得不进行改造以符合工人阶级利益的共同体——表明了与苏联路线

的决裂。而且，在1962年12月举行的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得到了支持，得到了由共产党控制的总工会的支持，更重要的是，陶里亚蒂在他著名的遗嘱——1964年8月的“雅尔塔备忘录”中加以支持。在那个文件中，陶里亚蒂十分强调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各派团结”的主题；在谴责建立在开除、铁板一块的运动基础上的、传统的团结方式的同时，他强调当各个共产党在他们自己国家里走向社会主义时，它们之间需要双边和多边的接触，但是他也强调需要发展诸如西欧和拉丁美洲的地区性的共产主义集团。事实上，陶里亚蒂在此号召建立一个欧洲共产主义集团，很清楚，从他的话的上下文来看，他设想，作为第一步，这个集团正在共同市场国家内部发展起来。

在此后十年，意共对外政策发言人乔治·阿门多拉，姜卡洛·巴叶塔，塞尔焦·塞格雷和乌戈·佩基奥利逐步展开了相当于一个欧洲战略的东西，它首先置于“逐步结束集团状态”的概念的基础之上，并在遥远的将来导致东、西欧之间全部恢复友好关系的某种形式，其次，这个战略更为紧迫的方面是发展西欧共产党之间的紧密的合作，以保证使欧洲共同体逐渐发展为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共同体。

这个战略的第一部分即是“逐步结束集团状态”，这将不可避免地使意共面对大西洋联盟的问题。直到1974年末，该党的正式方针还是基于这个口号之上，即“意大利退出北约，北约撤出意大利”。但是早在1969年，意共总书记路易吉·隆哥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已经指出，大西洋联盟的单方面解散并不是该党的目标，因为这将开创一个不稳定的时期而损害缓和。从1972年起，贝林格一再指出，意共既不反对美国，也不反对苏联，只是要求缓和与逐渐解散集团体

系。最后，在1974年12月的一个重要声明中，贝林格宣布，如果意共掌握政权，它将不要求意大利退出北约：“就意大利来说，我们不作为一个先决条件提出意大利退出大西洋联盟的问题……我们相信意大利政府不应该建议进行一项将会改变大西洋条约和华沙条约之间军事战略平衡的单方面行动。”此后，贝林格、阿门多拉和纳波利塔诺在各种场合重申了这一许诺。然而，关于这这许诺的含义的疑问依然存在，这是可以理解的。可能发生的事是，假如共产党人与天主教民主党人完全结盟，他们将运用他们的全部影响去缩减意大利的国防开支。1977年4月，意共中央委员会一名老资格委员龙巴多·拉迪切拒绝承认华约甚至会进攻北约的可能性，并争论说，因此苏意之间的战争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如果北约攻击华约，意共将会支持苏联。这个关于意共向北约承诺的含义的模棱两可的回答，确切地反映了姜卡洛·巴叶塔在1976年5月同一次记者访问中所采取的态度。可是，贝林格已经暗示，北约的成员将会帮助意共追求它自己对于社会主义的独特看法，而不用冒苏联干涉的风险。

可是，意大利共产党人欧洲战略的第二部分——他们承诺一个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欧洲共同体，并没有受到其含糊其词的障碍。例如，象意共在欧洲经济共同体问题上的专家之一、欧洲议会议员维奥沃·隆那迪这样的发言人争论说，欧洲经济共同体已经受到了迄今为止仅仅发展成为一个“消极的”关税同盟的妨碍。这种发展有利于巨大的跨国公司，并导致了资本在欧洲某些地区的集中，但是现在所需要的是“积极的”一体化，那就是发展地区的、社会的，运输以及能源的政策，除运输而外的所有这一切，对意大利极其重要。然而，假如这样的共同政策得到发展的话——意共日益强调

如果共同体要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它们必须如此——那末，有一套强有力的、对欧洲选民负责的机构和制度，对于共同体来说是完全必要的。因此，意共有力地反复强调需要举行欧洲议会的直接选举。早在1969年，维奥沃·隆那迪号召举行直接选举，较近的是乔治·阿门多拉在《泰晤士报》记者访问中证明了同一点：“尽管甚至还没有一部简明的选举法，我们意大利共产党人还是支持选举置于比例代表制基础之上的欧洲议会的决定，这个比例代表制有碍于获得民主的结果。然而，人民意志的表达可能为欧洲共同体的民主改造提供一个原动力。”意共不再要求增加欧洲议会的权力，相信它们将随着新的形势所提供的动力而来。该党赞同直接选举欧洲议会的主要理由，第一，它将导致部长理事会权力的削弱——意共认为部长理事会是一个不民主的机构，它对于较弱成员（当然包括意大利）的利益很少注意，因而日益被西德所控制——第二，一个代表欧洲所有地区和阶级，当然，特别是代表在现行制度下的机构中缺乏发言权的、获益较少的地区和阶级的议会，将会要求意共所要的“积极的”、“有力的”共同政策。

法共对于大西洋联盟和欧洲一体化的承诺，至少可以说比意共总是更加富于“色彩”。确实，它对于北约的态度是，而且总是具有明显的敌意。虽然，该党宣称它将不试图单方面使法国退出北约，但是它将强烈反对法国重新参加北约的军事机构。此外，在1969年，当达到一点，即联盟的任何成员只要预先一年通知就可以退出时，法共要求“不再重新订约”。可是，自从1972年与社会党人签署了共同纲领以来，法共对此事保持沉默，这也许是有意义的。就欧洲一体化而言，法国共产党看起来似乎在凭一时高兴向意大利人所持的

立场靠拢，在权衡之下，他们的欧洲热少得多。无论如何，近来有改变的迹象，作如下的推测也许不是太异想天开的：法共正在经历意共已经经过的同样的发展。法共已经达到了这一点：它不断地强调“法国色彩的共产主义”概念，（可与意共的口号“意大利社会主义道路”相比较），证据是法共好象日益赞同“独立的欧洲的”或欧洲共产主义的思想，而迄今为止，贝林格和卡里略比马歇更热情地采纳这一思想。

法共曾经彻底反对欧洲煤钢联营、欧洲防务委员会（与戴高乐主义者一起，法共确保了它的失败）和欧洲经济共同体。它从根本上把欧洲煤钢联营和欧洲经济共同体视为大西洋联盟的经济支柱，它也曾经采取一条强烈的民族主义的、反德的路线，批判任何引向一个“超国家主义的”、一体化的欧洲的步骤。整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法共确实是克里姆林宫路线的坚定捍卫者。但是当它与社会党人一起追求它的掌握政权的目标时，它逐渐改变了对欧洲共同体的批判态度。这个转折点发生于1972年，因为虽然在1972年4月的公民投票中法国共产党人维持了他们反对英国进入共同体的传统路线，但在1972年6月的共同纲领中提出人民阵线政府“将参加欧洲经济共同体、它的机构及其共同政策的建设，它以这样的意志去行动：即把共同体从大资本主义企业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使它的机构民主化，支持工人阶级的要求，并使共同体的成就符合他们的利益”。确实，这个承诺充满了含糊的陈词滥调，但无论如何，就法共而言，它将标志着与至今对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十足的批判态度的断然的决裂。一年以后，马歇和贝林格使他们各自的党许定“积极参加”欧洲共同体，并在西欧共产党之间进行定期接触，以拟定共同的欧洲

政策与主动精神。1975年，首批法国共产党人进入欧洲议会。是年末，马歇和贝林格在意大利会见，指出他们的目标是鼓励一切民主和左翼力量在共同体内部一起工作：“这是我们的深刻信念：不论欧洲共同体的各个国家之间有什么差异，而且不论它们的差异有多大，但在这些国家之中的单单一国里，工人运动的方针不可能脱离整个西欧有效地走向社会主义的战略的某些共同特征。”这种语言是含糊的，但是法共日益减弱其反对共同体的态度则是显而易见的。

更近的即是在1976—1977年，法国共产党人对于欧洲共产主义和欧洲一体化两者继续他们“双重标准”的接近。例如在1976年2月，马歇——不象贝林格——拒绝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苏共党代表大会，同月在法共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取消了。这两个步骤更强调了法共“独立的”、欧洲共产主义的一面，但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马歇也强烈地攻击了美帝国主义和欧洲共同体超国家主义的方面。在1976年6月9日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马歇再次说他对于象月底将在东柏林举行的二十九个党参加的欧洲会议这样大规模的共产党会议的价值抱有怀疑。这是一种“欧洲共产主义的”态度，因为，比较独立的共产党知道，欧洲会议大抵作为苏联重申它对于共产主义运动的权威的一种手段。可是，在这同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马歇强调法国需要维护它的独立，并且由于法国政府显示了例如在军事演习方面要与北约更紧密地站在一起的迹象而批评了它。然而，在欧洲会议上，马歇极力捍卫人权，并说法国将“仍然是大西洋联盟的一个成员”，直到“对立集团的解散”成为可能的这个阶段到来。但是，他也回头讲到大西洋联盟是美帝国主义的组织这一陈旧的共产党口号，并宣称西欧资本主义处

于崩溃的边缘。因此，马歇似乎再次显得正在同时主张欧洲共产主义和攻击大西洋联盟与欧洲共同体这两种教义。人们推测，对于这种态度的最好的解释是，马歇既要维持与社会党人的联盟，又企图把戴高乐主义者拉到法共方面来。

这种法国沙文主义和欧洲共产主义奇妙的混合物，在法共对于欧洲议会的态度上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一方面，自1975年以来，它一直向该议会派出代表，并在斯特拉斯堡与意大利共产党人组成了共同的议会党团。另一方面，马歇在1976年2月的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对欧洲经济共同体进行了非常直率的攻击：“法国的主权正在从她身上被一片又一片地撕碎，……今天，我国农民的命运在布鲁塞尔决定，我国货币的命运在华盛顿决定，如果人们不关心的话，明天，我们国家的命运将在卢森堡，说得更确切点，将在波恩被反动力量的参谋长和大西洋欧洲跨国托拉斯所决定。”这种反欧洲共同体的雄辩在1976年6月的那次记者招待会上继续进行，马歇宣称欧洲议会的直接选举将是一项“反法的罪恶”。1977年1月《人道报》强调，法共和它领导的总工会都是反对直接选举的，因为它将加强由“大垄断公司”管理并为之服务的该组织的机构，欧洲的唯一权利和适当目标是，在总的符合工人阶级利益的经济结构里，尊重每个国家的主权。”尽管对欧洲共同体作了如此攻击，但是1977年3月在马德里，马歇与贝格林共同指出两党将继续在西欧共产党共同利益的一切事务中一起亲密地工作。1977年4月，马歇说，假如由直接选举产生的欧洲议会的权力一点也不增加的话，法共终究不会反对它。

结 论

带有准独立形式的共产主义，即欧洲共产主义的发展，是中苏发生争端以来，共产主义运动中可以辩论的、最重要的、独一无二的发展。但是，这个发展对欧洲共同体的未来确切地意味着什么，现在还不清楚，人们说，判断一个人是否是天主教徒的方法，并不只是把他上教堂的次数加起来，而是要研究他在其他场合下行为的准则。所以，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人关于多中心主义、人权和西欧“社会主义道路”的声明，归根到底，只能在假如他们掌握了政权时，才能加以判断。就意共而论，可以说它的行动表明，在欧洲一体化问题上，该党已经“走向教堂”，它对于通过欧洲共同体的机构达到社会主义西欧的目的的承诺，是真挚的。对于独特的“戴高乐主义”的法共，则还存在着一个疑问，它“上教堂”是近得多的事，它在其他场合下的行为带有传统的屈从于莫斯科的奴性和独具一格的雅各宾主义与沙文主义的法兰西混合物的色彩。此外，对于这两个党都还存在着关于它们的组织的进一步疑问：只要它们仍然在其内部事务中实行列宁主义的“民主集中制”，那末，怀疑它们给予整个社会以民主和多中心主义的许诺是合理的。

当然，在它们的欧洲政策上，两党都重视了选民的考虑。意大利共产党人要与坚定支持欧洲一体化的天主教民主党人一起组织政府，法国共产党人目的在于和社会党人一起组织人民阵线政府，社会党人虽然对于大西洋联盟的热情要

少一些，但也是共同体的强有力的支持者。可是，对于选民的考虑，似乎不象唯一决定了意大利和法国共产党人欧洲政策最近的演变。就意大利人来说，他们赞同在欧洲舞台上为社会主义的多中心形式而奋斗，是他们早就建立起来的信奉“意大利社会主义道路”的合乎逻辑的发展；正如他们的许多发言人所已经指出的那样，该党强调地区的多中心主义，是与它强调国家的多中心主义完全相一致的。

目前，在通过共同体的机构为争取社会主义的西欧而奋斗的问题上，看起来法共的兴趣比意共小得多。但是，无可怀疑的是，近年来它已经变成了一个更加“独立的”党，在人权问题上以及从它的党章中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的用语，从而与莫斯科保持了距离。此外，有迹象显示“独立的共产主义”有它自己的力量：西方的党越是强调公民自由权的重要性，它们越是注定要与苏联发生冲突，因为苏联的政府制度归根结底是建立在否定某些人权的基础之上的。西方的党越是强调它们赞同多中心主义和与自由民主的政党结盟，那末，它们一旦掌权，倒退也就越困难。列宁著名的话，“策略，同志们，策略”，不应该忘记。可是，意大利和法国共产党人近来向欧洲共产主义的演变，以及更积极地向欧洲一体化迈进，不仅仅是策略的，而是带有战略性的。

〔本文载于《国际事务》季刊，第53卷
第3期，1977年俞正梁译，徐宗士校〕

欧洲共产主义与东欧国家

T·S·

欧洲共产主义，这一学说的存在，在东方还有争论，现处于困难的情况。它的一些最热烈的拥护者——如西共领导人圣地亚哥·卡里略——他们认为危机动摇了这一含义不清的运动。此外，毫无疑问，法国左翼联盟的失败，意大利从1978年底以来处于绝境之中的“历史性妥协”，以及法国和西班牙（或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在欧洲的问题上的分歧使情况更为困难。由于部分策略和战略的变化所引起的这种新的局势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关注。

近几年来，西方主要共产党内部出现的欧洲共产主义思潮成为今天引起在东欧国家中掀起了一股争议的新浪潮。东柏林、布拉格、华沙和布达佩斯的持异议者，如果不是全部，至少有不少人认为欧洲共产主义是他们的“客观上”的同盟者。他们引用西欧共产党的声明，要求停止追究和难为他们，这就使他们的政府处于尴尬的境地。当然，欧洲共产主义者对这些异端分子的支持是有限度的，因为西方共产党断绝了与莫斯科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联系。

在这方面，1978年发生的与欧洲共产主义有关的所有事件都证实了这样的印象。即使是最“激进”的欧洲共产主义者西班牙人也小心翼翼地避免冒犯苏联的对外政策，但一有机会就说明他们的党是具有“独立性”的。这种标榜“独立”、社会主义的“国家模式”的思想在各党的代表所公布的

文件中不无反映。西共代表大会是在1978年4月举行的，最近一次意共代表大会的文件是在1978年12月发表的，法共代表大会的文件则是在1979年2月公布的。把这些党与整个东方国家的关系，特别是与苏联的关系作一分析研究以后，人们就能更清楚地了解区分这三个主要的“欧洲共产主义”党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分歧已经达到何种程度，它们与这种制度是如何有别了。

1978年4月在马德里召开的西共九大所通过的决议是与圣地亚哥·卡里略以及其他领导人，如负责和“兄弟党”关系的曼努埃尔·阿斯卡拉特所坚持的“路线”相符合的。决议谴责了某些东欧国家内的镇压措施，并且指出：“我们并不是想举行一次对苏联和东欧国家进行批评的代表大会。就像法国人所说的那样，我们另有其他事情要做。”

西班牙共产党的态度经常给苏联和他最亲近的盟国（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东德）欧洲共产主义的敌对者们以某些刺激，而波兰党和匈牙利党——在1977年——则尽量避免对欧洲共产主义作任何谴责，他们说今天各共产党应当完全独立的进行工作。雅诺·卡达尔认为“这个问题关系到思想意识上的分歧，或者在解决某些类似问题（与西欧共产党）方法上的差距，可以用适当的方法来加以澄清”。

同样也应该注意到，在这年秋天，好几个东欧党增加了同西班牙党的接触。匈牙利人的开放政策和自我批评，使得他的对话者感到吃惊。他们声明赞同意识形态上的灵活性，承认每个党都有权保持差别。保加利亚人、东德人和罗马尼亚人也到马德里去访问。罗马尼亚人与西班牙人之间可以说保持着某些特殊关系；在去年，1978年，最高级会晤十分频繁。

某些观察家认为东欧党对西班牙共产党的友善表示与莫

斯科的阴谋相一致的，以防止北京可能对圣地亚哥·卡里略发动诱惑进攻。

中国的举动显然使苏联感到忧虑。华国锋主席八月份的欧洲之行（在此期间中国第一号人物访问了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引起了莫斯科辛酸的评论，而意大利共产党报纸庆祝布加勒斯特与北京和解，特别是南斯拉夫与中国重归于好。

这也许是出于害怕这些西方的欧洲共产主义党（其中还应加上南斯拉夫人和罗马尼亚人）与苏联的距离拉大，所以去年秋天，克里姆林宫似乎准备作出更大的让步，承认了兄弟党之间存在着分歧，以便尽可能地孤立中国。

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恩里科·贝林格在访问了巴黎之后，并与铁托元帅商谈之前，于十月访问了莫斯科，广泛地讨论了中国问题。苏联竭力想劝阻贝林格——并通过他劝阻其他欧洲共产主义领导人——不要去北京，不要使他们的党与中共的关系正常化。此外，根据报界透露，苏联领导人不想说服贝林格停止对苏联的社会性质及其运转情况进行攻击。以免影响“缓和”。苏联人对意共总书记说，如果美国玩中国、欧洲共产主义、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等这些牌，坚持利用共产主义世界的矛盾——来反对苏联的话，那么这就将会导致人们走向一个新的冷战时期。这对大家都是不利的。

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最坏的情况，莫斯科准备降低论战的调门。

在恩里科·贝林格访苏之后，东欧国家的代表团就接踵访问马德里，出现了一些迹象表明在各共产党之间可能会建立一种新的关系。必须承认在各共产党之间存在着不同之处，必须承认这种不同之处是一种事实”，人们可以从这些公开的声明中概括出这样的结论。这些声明不仅涉及到与西

欧共产党之间在欧洲建设问题上出现的分歧。

在短期内为了想预防“中国的诱惑”，苏联似乎确实打算作出某些让步，而欧洲共产主义的主要党以及南斯拉夫人和罗马尼亚人也会在批评和“指责”克里姆林宫的政策时放低调门。

但是，是否所有的苏联领导人都有让步的思想，也就是说承认——在实际上——各党之间存在着不同之处呢？那倒不见得。对于克里姆林宫内部的争论过程我们无从确切知道。然而，有一件事情却是很明显的：与某些人的愿望相反，论战不久就重新出现了。

在庆祝十月革命六十一周年的时候，中央委员会国际部负责人鲍里斯·波诺马廖夫的付手瓦季姆·扎格拉金在《真理报》和《新时代周刊》上发表文章，重温了十月革命的“好教义”。扎格拉金在文章中把苏联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一种模式，并指责西方共产党说：“今天，革命进程的反对者想分裂为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者的队伍，为此他们利用了欧洲共产主义这种思想。这种思想为帝国主义的宣传机构广为传播，它的真正目的是尽力挑起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首先是反对苏联共产党。扎格拉金认为“对待苏联的态度就是国际主义的试金石”；他承认并证实在某些兄弟党内出现了反苏主义。文章谈论“某些朋友对苏联的抨击多于谈论欧洲共产主义的战略结果。”扎格拉金尽力反驳“社会主义不够民主”的论点，并且大谈苏联新宪法的优点。

扎格拉金的文章在《真理报》（东欧好几家报纸都转载了这篇文章）上发表二十四小时之后，意大利共产党的机关报《团结报》就作出了反应。两天以后，一名电视记者得到

允许采访了恩里科·贝林格在电视访问节目上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他认为扎格拉金关于“欧洲共产主义”的言论是“错误的。”总书记重申欧洲共产主义“对于西欧寻求走向社会主义的独特的道路来说，是必要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并且不能亦步亦趋地追随其它国家所采取的模式”。

意大利共产党人为这种含蓄的攻击所激怒——贝林格访问莫斯科不过一个月，访问期间勃列日涅夫还对意大利共产党的立场表示过“极为关心和谅解”——他们明确地坚持重申自己的立场。意共对外政策的负责人，书记处成员吉昂卡洛·帕热塔在11月底发表了一篇文章，强调：“我们应该明确和切实地承认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着各种差异（……）我们应该懂得要求自主是合理的，这种自主是建立在各国解决本国的问题和行使有效主权的能力的基础上的。苏联大概懂得那种“帝制”式的防务已经不再有必要了，在今天，共和制是更现实、甚至更为有效。”

帕热塔在文章中——东欧报纸对此没有作任何评论，南斯拉夫报纸除外——还明确指出：“我们的政策与苏联的政策是不同的，它并不取决于苏联的政策。（……）苏联的宣传在我们看来是一场反华的十字军运动，我们并不赞同。同样中国的对外政策和把苏联视作和平的敌人，我们也不赞同”。

这些话和西班牙领导人的话是一致的，但是与法国领导人的讲话多少有点不同，他们也曾就与东欧国家的关系问题上发表过自己的意见。

一些法共知识分子党员——如让·埃伦斯坦教授等——对莫斯科是持有距离的。至于法共领导，一本由五个知识分子写的，受到政治局热情推崇的，题为《苏联与我们》的小

册子，已经回答了党员提出的所有问题。这本书恰好发表在《人道报》创刊节目前夕，公众反映这本书最终几乎还是不能令人感到满意。一些党员和“克里姆林宫问题专家”认为，这本书的作者们的功劳在于（终于）触及了在此以前一直禁忌的问题，但是没有进一步展开，读者仍然渴望得窥全豹。他们说：“问题虽然列举了一大堆，但是答案呢？没有”。

然而，书中提到：“即使苏联的现实法国人民群众的心目中越来越不成为需求追随的模式，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某些缺陷而指责整个制度”，这一点还是激起了莫斯科的狂怒。十二月，苏共中央委员会的理论刊物《共产党人》激烈地抨击该书，断言该书作者“对苏联和苏联人民的现实生活缺乏了解，写得毫无水平”。在对这五名法共知识分子的指责中，还有抨击法共试图与莫斯科离心离德这样的话。东欧的主要报纸摘要刊登了《共产党人》杂志的这篇反驳文章……但是没有介绍这本受到指责的书的内容。

苏联共产党的理论刊物对由法国共产党政治局“作后台”的这本书的攻击发生在两件重大事件以后：在莫斯科举行的华沙条约组织最高级会议和索菲亚的国际理论会议。

第一件大事是指11月22日—23日在苏联首都召开的最高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罗马尼亚人采取了与其它与会者不同的立场。表现在增加军费、中国问题和近东问题上的分歧。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总统只是在避免了对北京的“反苏主义指导路线”的指责后才在最后文件上签字的；另外，在七十四个国家的代表中，只有六个国家代表在关于近东形势的声明上签了字。

自12月12日在索菲亚开始举行的国际理论会议很可能是对齐奥塞斯库的“回答”，同时也是当着七十三个国家的共

产党和工人党代表的面对中国进行的谴责。

保加利亚第一号人物托多尔·日夫科夫和苏共政治局候补委员、国际问题负责人鲍里斯·波诺马廖夫的发言，明确表明了莫斯科和他最忠诚的盟国以“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中心，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意识形态上的团结的愿望。有几个几乎无条件亲苏的共产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希腊、奥地利、丹麦、美国等国的党）派出了党的主席或总书记出席大会，以这种姿态来表示他们对这次“理论协商”会议的重视。

然而，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却只委派了他们常驻《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杂志（组织者是保加利亚统一党）的代表出席会议，西班牙共产党出席会议的是西共中央党校的校长，他也不是中央委员会委员。

索菲亚理论会议很快就变成了反华的论坛；罗马尼亚、意大利和西班牙代表再次要求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和解而遭到孤立。他们说社会主义建设不存在一个千篇一律的模式，他们主张各党在这方面都有自主权的“欧洲共产主义的概念”，多次反对苏联提出的那种“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榜样。

东欧国家用了很大的篇幅来宣传索菲亚国际理论会议。12月15日《真理报》刊登了这次会议上的一篇报导，一些东欧主要的报纸都转载了这篇报导，婉转地提到了在华沙条约组织最高级会议上出现的分歧。报导说：罗马尼亚代表在索菲亚理论会议上的发言“与会议总的氛围明显不协调。这位代表重申了众所周知的罗马尼亚共产党的立场明显地低估了帝国主义所代表的军事危险。（……）他发表声明，认为对一个国家的立场进行批评是不能容忍的，并且认为整个共产主

义世界的协调一致的活动是‘不合时宜’的”。

几乎在同时，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总统与西班牙共产党负责国际关系的领导人曼努埃尔·阿斯卡拉特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再次申明在对世界局势和共产主义运动问题的分析上，他们的观点是一致的。

在索菲亚理论会议召开前48小时，在罗马尼亚发表了意大利共产党为下届代表大会提出的讨论计划。该计划声称：

“为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而进行的斗争应该表现为全面扩大民主和自由；这就是欧洲共产主义所作的选择”。在谈到社会主义国家时，文章指出：“这一伟大的历史经验暴露出它的局限性，以及这个国家内部的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矛盾和错误，特别是在民主问题上的矛盾和错误，这种局限性、矛盾和错误同样也会存在于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上，使得社会主义理想对整个世界的吸引力受到了限制”。在谈到苏联时，文章的用词更为严峻，因为意大利人认为非斯大林主义化是失败的。

意大利和西班牙共产党人还指责苏联和若干东欧国家侵犯人权。

至于法国共产党——持异议的知识分子除外——党的领导人认为“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总的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1979年2月13日在《人道报》上公布的法共二十三大的文件认为“这些国家所取得的成就证明了这些国家为了解决重大社会问题所选择的新制度的优越性”。然而，这些文件接着说“看到这些成就，考虑到实现社会主义必须有不同的形式，这完全不意味着我们是从人们通常称之为斯大林主义的这个概念中得出这个结论的。

因此，即使在西方主要共产党对东欧共产党世界在看法

上存在着重大分歧，但没有一个党对鲍里斯·波诺马廖夫在《共产党人》杂志1979年2月号上所说的这样的话表示赞同。鲍里斯·波诺马廖夫说，“二十五年以来，社会主义的法律没有受到任何损害”，“社会主义国家打开了通向自由王国的道路”，并且对“有些同志在苏联问题上缺乏诚意”表示遗憾。

对欧洲共产主义这个新的警告立刻就引起了东欧报纸的注意，在以后的几个月中显然也为许多其它报纸所引用，但是不同的立场没有改变。无论在共产党执政的东欧，还是在反对派中起着不同程度作用的西欧，大家都不希望关系破裂。各欧洲共产主义政党虽然在一系列问题上存在着分歧，但是没有一个党对莫斯科在国际政治范围内作出的决定存在真正的分歧。

欧洲共产主义各党如果取得政权的话，那么苏联对他们的态度将有所不同。但是这在目前情况下是不可能的，要解释其原因就超出了整个本篇简单文章的范围了。假如欧洲共产主义者在法国或意大利能取得政权的话，那么这将对东欧国家无疑是一种诱惑。

[本文载于《苏联与东欧》杂志，
1979年6月13日，第4515—4516期。
庄建明译，葛智强校]

莫斯科和“欧洲共产党”

理查德·洛温撒尔

许多年来，苏联领导者日益面临着在工业发达的民主国家的共产党包括意共、法共、西共和日共内一种共同的“修正”趋向。这种趋向，一般称为“欧洲共产主义”。

欧洲共产主义的共同特点之一是拒绝以俄国十月革命以及（更重要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作为具有民主传统的先进国家的榜样，拒绝服从一个国际中心的战略，拒绝必须“打碎”民主国家而代之以“无产阶级专政”（即一党制政权）这样的列宁主义学说的基本信条而赞成多党的民主政体。总之，苏联党发现自己面临一种恰恰在那些在工人阶级中有深厚基础的先进国家的共产党内列宁主义正在“衰亡”的倾向。

无怪许多西欧评论员在分析“欧洲共产党”的倾向和因而产生与苏联正统的决裂时，已经预言即将发生新的重大的共产党的“分裂”——类似于斯大林同南斯拉夫的决裂和中苏大论战。但是，莫斯科在公开驳斥“欧洲共产党”对苏联政策的许多批评以及它们的一些具有很深远意义的理论性声明时，迄今限制在不采取正式“开除”的措施的范围内，甚

原注：洛温撒尔先生是自由柏林大学（西柏林）国际关系的名誉教授。

至按国际合作的需求程度还作出了策略性的让步。而这些“异教”的政党——除了日共是从60年代中期正式完全独立以外——反过来也表示渴望和执政的共产党保持一种基本的“团结”关系，只要这种关系符合前者独立自主的战略和意识形态。

苏联的利益

苏联在工业发达的民主国家中的利益似乎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就是：一、潜在的虽然通常是隐蔽的利益，即由这些国家中的亲苏共产党以革命夺取政权；二、当前的主要的利益是影响这些国家的外交和国防政策以削弱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美日联盟的内聚力和生命力；三、长久的利益就是致力于使工业发达国家中的非执政的共产党能够多少有利于苏联和东欧共产党那样的共产党在国内的合法地位。

就第一方面而论，人们应该注意到由于从四十年代末开始这些国家的长期稳定繁荣，苏联利益要求以革命推翻这些国家的政权制度似乎同实际政策格格不入，许多人怀疑这一方面利益是否继续存在。但是事实上早在1956年，苏联领导人就用引入取得政权的“和平道路”的概念——在尼基塔·赫鲁晓夫给苏共二十大的公开报告中——调整了在这些国家实行革命战略的思想。他们认为，在有利的条件下，共产党可以不走列宁十月革命式道路建立苏维埃和进行武装起义，也不采取铁托式和毛式的长期游击战争，而是有效地运用议会机构配合外部的苏联压力——按照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形式来取得政权。这样的道路，就它会导致共产党对社会的完全控制和根本改造的意义来说，仍然是“革命的”道路。

同时，就它避免了一场内战来说，它是“和平的”。在这个新的形式下，苏联的那种在先进的工业国实行革命变革的兴趣仍隐伏在莫斯科的意图之中，直到1974—75年当葡萄牙的军政府以革命推翻了专制政权以及世界性的经济衰退的双重冲击下，这种意图才重新公开表现出来。

由于葡共先前对于军政府的影响和他们控制了葡萄牙宣传和警察机构中许多重要部门，他们夺取政权的企图起初看来是大有希望的。而且，由于葡萄牙并不是工业发达的国家，它的位置正好在西欧，苏联的意识形态作家立刻开始在苏联官方杂志上举出葡萄牙共产党作为其他西欧共产党的榜样。我们后来看到，直到接近1975年底当葡萄牙共产党夺取政权的前景已经明显消失以后——当这种希望在大多数西欧共产党内引起越来越多的反对以后，那些对西欧革命抱有希望的苏联领袖才不得不放弃这种希望。

在革命战略上的分歧

1974—75年许多苏联革命战略和军事理论的专家，在葡萄牙革命和世界性经济衰退的影响下，开始研究西欧革命发展的前景。第一批信号之一是一篇登载在军事刊物上的论述战争理论的文章，它宣布“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争取解放的国内战争，同“民族解放战争”一样，应该得到一切进步国家和力量的支持”。不久，苏联的理论家，布拉格出版的国际共产党的刊物《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的主编K·I·扎罗多夫在该刊的1975年4月号上，号召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采取“进攻行动夺取政权”，更加积极地利用经济危机提供的机会。7月初，苏联政治局委员M·A·苏斯洛夫

在纪念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1935年的“人民阵线”代表大会）四十周年会上的讲演中，把当时的经济衰退和1929—32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作了比较，并且预言，由于因此造成的西方的瘫痪，“世界革命的进程将更进一步扩大”。8月6日，扎罗多夫为《真理报》写了一篇论述“列宁的革命斗争战略和策略”的社论，利用列宁在1905年提出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专政”的口号为加速建立共产党的少数派统治提供理论根据，

就在同一时期，苏联领袖召集了一次全部欧洲共产党会议并且开始起草了一个联合文件以便参加者一致通过。然而，很快看来对于苏联提出的革命战略的概念方面是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意大利共产党（从事于同执政的天主教民主党建立“历史性妥协”或联盟）和西班牙共产党（当时正在为争取民主的合法地位而斗争）非但不以葡共为榜样，反而公开地批评它们的葡萄牙同志的政策。至于法国共产党人，他们在按照两党的共同纲领热衷于和社会党人进行共同的竞选运动时，不惜冒和他们选举伙伴间的重大不和而为葡萄牙党的行动辩护，但是法国共产党并不准备自己也献身于类似的战略。相反的，到1975年11月，法国共产党人加入到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中反对这个共同的国际“战略文件”的主张，而且，此后不久，法国共产党联合意大利和西班牙共产党保证完全维护在共产党政权下的民主权利和自由（包括反对的权利）而拒绝一党统治的原则。

面对西欧主要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的一致立场，苏联在1975年12月开始从坚持一个共同的战略文件的立场后退，以便使原定的欧洲共产党会议不致夭折。当这个会议最后于1976年6月在东柏林召开时，莫斯科不得不容忍“欧洲共产

党”领袖恩里科·贝林格、乔治·马歇和圣地亚哥·卡里略公开发表他们的讲演，在会议最后文件上明确地写上各国共产党独立和平等的原则，甚至用自愿的国际团结来代替苏联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公式。

1975年底，葡萄牙共产党的革命战略已经明显失败了，西欧革命提早发展的希望也消失了，由于这样的事实，苏联的上述让步无疑是容易作出的。但是，诗联的意识形态发言人仍然在原则上不作让步，他们随后的理论性声明不但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公式（鲍里斯·波诺马廖夫在会上的报告），并且坚持需要革命的“冲击”和“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作为争取社会主义，即使是“和平道路”下的必要条件。

外交政策上的合作

西欧主要的非执政党对外交和防务政策早已建立了“和平运动”和“反帝运动”的传统，这个传统在很大程度上一直保留到今天。例如，所有的“欧洲共产主义”政党都积极参加了最近苏联策划的反对核武器的运动，它们都一贯支持苏联在中东的政策——要是没有对于苏联突然从索马里转向埃塞俄比亚而引起小小的疑虑的话——和非洲的政策。

但是，在这样的外交政策上的合作即所有的“欧洲共产主义”党保持同苏联的根本团结以反对“帝国主义”方面，已经出现逐渐增加的例外情况。其中首先是欧洲共同市场问题。早在1962年，意大利共产党开始接受共同市场，认为即使在目前的资本主义形式下，它也是“进步的”。法国共产党同苏联观点一样，认为共同市场是一项反动的创作，他们

终于象苏联人一样只是为既成的事实承认共同市场。最近，西班牙共产党支持西班牙申请加入欧洲共同体。意共和西共都支持欧洲共同体在1979年6月举行第一次欧洲议会直接选举的决定。

第二类更加重大的分歧是由1968年苏联干涉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和“勃列日涅夫主义”为它的辩护引起的。这个行动分别受到了意共、法共和西共或多或少的以谨慎的措词所作的批评。事实上，意共和法共领导人曾经事先警告过苏联。而西班牙共产党，它的领导人当时住在捷克斯洛伐克，体验了布拉格之春的群众激情，抓住了这个时机第一次显示出独立的观点。随后，法国共产党“为了事业的利益”承认了在古斯塔夫·胡萨克统治下的捷克政权的“合法地位”，但是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却没有承认。后面两个政党继续出版来自布拉格之春的支持者的文章和信件。至于意大利，继续批评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一方面由于华沙条约用侵捷事件的震动，和另一方面由于在法国与意大利出现了加入政府的机遇，这两件事引起了意共和法共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态度在不同程度上的变化。意大利共产党人声明，只要华沙条约存在，他们将不要求意大利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因为他们赞成两个军事集团的同时解散而不愿打乱欧洲的军事平衡。他们公开提倡一个既同苏联又同美国友好相处的欧洲。意共领袖贝林格在1976年一次选举前的声明中甚至承认，他们认为建立他们那种社会主义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范围内比在华沙条约范围内更加容易。法国共产党人反对法国回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但是他们宣称只要欧洲继续划分为不同的军事集团，他们将不要求法国退出联盟。另一方面，他们要求法国的防务政策面向一

切可能的敌人全向防务，就是说至少要像反对苏联集团那样反对美国和西德。西班牙共产党人，在反对西班牙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苏联观点一致，但是他们已经声明在苏联军队留在捷克的情况下他们将不要求美国撤出在西班牙的基地。

可以看到意大利与西班牙共产党和莫斯科在外交政策上的分歧是局部的但是重大的，而法国共产党比较起来是介乎中间的。然而，在苏联对法国的外交方面，法共和苏共之间已出现了不和。在法共看来，这种外交政策似乎有利于法兰西右派政府而不利于处在反对派地位的左派。另一个正式的意见不和，是法国共产党最近同意保持法国的核力量，而苏联公开宣布反对。但是似乎很可能苏联不但早就承认这种力量的既成事实，而且并不认真看待它的存在——最不认真看待共产党主张的法国“全向防务”，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武器将不排除以苏联及其盟国为目标。

尽管这里列举的分歧——捷克事件的争论除外——在苏联的出版物上一般地没有大肆宣扬，苏联的报刊近年来一直忠实地支持意大利共产党加入多数党政府的努力。它也支持法国共产党争取建立“左派联盟”的运动以法共多次反对这个联盟中社会党伙伴的行动，这种行动最终破坏了它的选举机会。（大概，苏联在外交关系中对于“左派联盟”的明显的节制态度以及对共产党攻击社会党的热切支持都是基于害怕社会党控制的左派政府可能比右派政府更加“具有欧洲的特点”，基于那种共产党和戴高乐派联合的“否决权集团”比这种政府更为可取的估计。）

西欧共产党和苏联的正统性

但是，在苏联与非执政共产党的关系方面，重要的一直是苏联共产党指望这些党的效忠。然而，自从非斯大林主义的危机以来，对于莫斯科正统的效忠，在工业发达的民主国家的非执政党内，已经一个个地不那么全心全意了。

1956年帕尔米罗·陶里亚蒂的谈话提出了异端，认为使斯大林的罪行成为可能是由于制度上的缺陷。意大利共产党就这样带头开始了部分揭开苏联的神秘性的过程。尽管在苏联立即反击后这个过程被正式阻止了，但是这个问题却不能再压制了。到1968年，部分受到意大利共产党主张鼓舞的布拉格之春的改革运动，就被看作是一个证据，证明苏联制度不再成为具有民主传统的先进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榜样。苏联镇压捷克斯洛伐克改革的恐怖帮助把这种信念传播给法国和西班牙共产党。

损害苏联作为意识形态榜样的权威的关键步骤却是承认在“资产阶级民主制”下取得的公民自由权利必须成为西方社会主义制度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承认这些公民自由权利和苏联式的一党制度是完全不相容的，承认这些自由权利中包括反对一个全部或部分由共产党执政的政府的权利，甚至在非法剥夺参加自由选举的情况下。可以得到这样的推论：当苏维埃制度从第一个划时代的社会主义革命中产生因而被归入社会主义类型制度时，它是被看作在历史和文化落后的基础上建立的特殊类型的社会主义而不是看作一种普遍适用的模式。虽然列宁自己在共产党政权的初期就曾说过，在共产党在先进的德国取得胜利——当时他认为这个胜利即将发生——以后，俄国将成“在苏维埃观念上的落后国家”，他所提出的这个概念在半个多世纪以后对于他的苏联继承者来说听上去好象是亵渎神明的言词——对于苏联统治的意识

形态的正统性的直接威胁。这种威胁的戏剧性的象征是1978年西班牙共产党在它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正式决定停止把它的党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步骤日本共产党已在早些时候采取，而意大利共产党也在考虑。

当“欧洲共产主义”的一些理论家把这样的发展引出逻辑结论时，他们已经对苏联是否能被称为“社会主义”表示怀疑。人权和公民自由是社会主义的必要部分，否则就不是社会主义。人们能有意识地去保卫“没有人类尊严的社会主义吗？”圣地亚哥·卡里略在他的著作《“欧洲共产主义”和国家》中明确提出了这样的怀疑。最近，吉恩·埃伦斯坦，法共的苏联历史学家，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苏联的反应

在重要的非执政共产党所采取的政策与苏联利益存在着局部地或严重分歧的所有问题上，苏联的反应一直谨慎小心，模棱两可。这种谨慎明显是由于以下两种原因。第一，尽管存在部分的分歧，莫斯科一直把与这些党的正式联系看作仍然从许多方面对苏联外交政策的实际和潜在的支持。第二，苏联认为与主要的共产党的完全破裂，可能比这些非执政党在同执政的共产党仍保持团结关系时宣布它们为重大的异教邪说，对苏联集团内部的正统性造成更大的危害。

因此，“欧洲共产党”提倡的广泛的非革命政策，尽管最初是与苏联的劝告背道而行，却从1976年以来为苏联报刊作为对特定情况的现实主义的调整给以认可和支持。同时，苏联权威的发言人从原则和长期战略的立场作了许多保留。

在外交政策方面，所有苏联的宣传工具强调的是在争取

和平和反对“帝国主义”斗争中的持续的广泛团结，而在欧洲一体化甚至对西欧国家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正式态度问题上的分歧却是轻描淡写。同样地，对于法国共产党抱怨苏联不给以适当的团结配合一事也没有注意。外交政策上一个原则性的分歧是华沙条约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问题。这里“欧洲共产党”的批评涉及到苏联和苏联集团国家的正统问题。因而有时就被打上“支持资产阶级反动派”的标记（这也是通过亲苏的捷克发言人之口发出的指责）。

通常，苏联人尽管显然关心避免和主要的“欧洲共产党”破裂，但是出于同样明显的理由没有忽视对他们政权正统性的直接攻击。然而，在批驳理论上的和实际的批评时，他们倾向于尽可能不归咎于有关的政党，而是归咎于特定的人，因而对他们进行了尖锐的抨击。过去一年内，这种抨击一直指向西班牙共产党两位最卓越的领导人卡里略和曼努埃尔·阿斯卡拉特以及法共历史学家埃伦斯坦。只是在西班牙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公开宣布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时，《真理报》才发表文章严厉批评这个党，但即使这时它也是以摘录原先发表在《捷克论坛》上捷共领导人吉·福狄克的文章的形式出现。

当然，如果某个共产党在批评苏维埃制度方面走得太远，莫斯科保留着最后的武器“开除”——断绝关系，宣布其领导人为这个事业的叛徒以及怂恿从中分裂出亲苏的宗派。迄今为止，这个武器只是用在对付几个较小的政党。莫斯科并不完全欢迎芬兰党内“斯大林主义”派的分立，但是它利用这种事态迫使它们按照苏联能施加更大影响的条件重新联合。希腊共产党还是在处于地下时就分裂的，而现在亲苏派在选举中的力量比独立的前地下组织的力量还要大。瑞

典的直言不讳的“欧洲共产党”最近由于它的亲苏派的正式分裂出去而大大削弱。但是，在佛朗哥时代当西班牙共产党仍处于地下时恩里克·利斯特集团企图分裂党的努力却遭到完全失败。尽管如此，仍不能排除反对卡里略在最近党代会上决定的一种重新出现的企图。

展 望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除了几个理论专家可能例外。苏联领导人对于大多数工业发达的西欧国家共产党明显的缺乏革命热情并不十分担心。莫斯科所深为关心的是一方面要保持主要的非执政党对苏联外交政策的用处，另一方面要限制他们的“修正主义”理论和对苏联集团的具体批评以及他们的活动和苏联政权和它的盟国的国内统治的正统性可能造成的损害。为了这个双重的目的，他们发展了一种和他们传统的教条的独裁主义区别很大的党际外交。他们表示准备不但给予非执政党战略和策略方面几乎完全的独立自主，而且对偏离苏联关于共产主义学说的解释和对苏联及苏联集团行动的批评作出比较缓和的反应，即使在他们认为严重的情况下也限于通过不公开渠道施加压力。因为这种压力是针对非执政党内最高层领导下面那些被认为是确实反苏的个人，他们仍可指望这些领导的大多数——即使不是全部——成员避免分裂的愿望。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过去的大分裂是由于莫斯科和执政共产党——南斯拉夫和中国的分歧引起，这是决非偶然的。实际上，可以认为涉及（早产的）“欧洲共产党”的唯一真正不可调和的分歧是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改革者和华

沙条约其他共产党之间的分歧——一种可以用暴力很快解决的分歧，因为它发生在欧洲的“不适当的”一边，但是并没有在“欧洲共产党”内留下了永久的伤痕。

只要“欧洲共产党”在它们的政府内不起实质性的作用，莫斯科发起分立或制造分裂在西班牙共产党的情况下是完全可想象的，而对法共或意共是很不可能的。因此，从西欧修正主义的发展中出现大分裂只有在假定它们的拥护者达到对政府的实质性影响时才有可能。

〔译自美国《共产主义问题》，1978年7—8月号。〕

蒋恩慈译 王国明校

策略还是战略

汉茨·廷姆曼

当前，西欧共产主义各大党所发生的变化和这些党在国内和国际政治舞台上影响扩大的前景，成了西欧一个重大政治课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在西方，大多数政界人士认为，这种变化是由策略目标决定的，因而其目的可能是威胁西方民主，削弱西方集团的防务，造成有利于莫斯科的政治和军事不平衡。相反，东欧各党的头面人物则害怕欧洲共产主义这种新观念表达了原则上的变化，会建立起一种民主社会主义，对“现存的社会主义”产生影响，并因此威胁到东欧执政党中的优秀分子的合法性赖以存在的原则。于是一场关于欧洲共产主义的讨论围绕着下面这个问题展开了：西方各党所发生的这个变化是一种为了取得政权而精心策划的策略手段，还是一种以建立民主社会主义为目标的长远战略？

这些党的历史表明是为第一种说法而奋斗的，但是它们新近所取的一些立场以及它们在最近所采纳的某些步骤却又表明是为第二种说法而奋斗的。现在还不能给这个问题以肯定的回答。因为这些党在变化的特点和程度上彼此各不相同。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九日至三十日在东柏林召开欧洲共产党会议，尽管明显地表现出苏联共产主义和欧洲共产主义之间的对立越来越尖锐化，也不能最终澄清这个问题。但是能够证实的是：毫无疑问，欧洲共产主义党采取的改革

进程以及他们对苏联共产主义扩大距离的做法大部分是从策略上考虑的，是就自己国家而言的。至少对于二十多年来从没中断过这个新的进程的意大利共产党来说，这种变化已经获得了自己的动力。可以说也具有战略的广度，这一点也是肯定的。

国内力量对比

从总体来讲，我们能够认为欧洲共产主义各党已经在国内扩大了影响，但是，在意大利共产党同法国与西班牙共产党之间却是有区别的：对意大利共产党来讲，他们权力的扩大首先是依靠他们党本身的加强，而法国和西班牙共产党国内力量的增长却必须依靠整个左派的扩大。

因而，在一九七五年六月的大区，省市镇联合选举时，意大利共产党的选票数就由27.9%提高到33.4%增加了5.5%。一九七六年提前的议会选举时也证实了这个结果，这一年意大利共产党比上一年又多得了1%的选票，达到了34.4%，保住了它的地位，这样天民党和共产党——意大利有决定意义的政治两极——之间在社会和政治领域里的力量对比，显然就变得对意大利共产党有利了。当天民党人不得不对它们三十年来从未受到异议的霸权失去幻想的时候，意大利共产党却已经克服了它的“战略劣势”。意大利共产党除了在北部工业无产阶级和中部意大利偏北面的农民合作社中拥有一批传统的支持者以外，在普选时，它又成功地深入城市，在教育和文化领域以及第三门类和科技界知识分子中，甚而小型和中型企业中都拥有一批支持者。大多数的大城市（一九七六年六月以后还包括首都罗马）以及某些最重

要的地区从此都被置于共产党的控制之下。

此外，长期以来意大利共产党就在政府范围内参与其事。甚至在一九七六年六月选举以前，天民党就经常和共产党在幕后讨论一些重要的法律提案，因而在国民议会里通过时，共产党投赞成票的法案占80%，在小组委员会里共产党投赞成票的法律草案占90%，在这段时间内，共产党的影响又有了扩展。

一方面，共产党人开始在议会中担任着重要的职务，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成员安格略奥已成为众议院议长，而议会的一些小组委员会也第一次由共产党人来领导。另一方面，人们称为《反共条款》也被废除了。意大利共产党领导机构认为这是一个真正的突破。在这以前，这个条款一直协调联盟的关系，禁止联盟的伙伴同共产党合作。自冷战开始以来，它就企图一直把共产党人排斥于政治生活之外。这是天民党第一次求援于包括共产党在内所有的“合法党派”，这是由于共产党在信任投票中弃了权，为组成以天民党成员安德雷奥蒂（M·Andreotti）的少数派内阁作出了决定性贡献。

然而，即使意大利共产党已成为一个无派系的大党，即使它在政府中所担任的职务已有所扩大，它同样也遇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因为，意大利共产党一方面不得不越来越多地兼管各种不同的利益，不能象处于反对党地位时那样提出要求，相反，必须和天民党一起作出决定，并且必须和天民党一起承担责任。另外，意大利共产党决不能以一个旨在改造社会的政党的面目出现。如果意大利共产党执行必要的严厉措施，而不能同时着手进行触及社会秩序基础的结构改革，不能在社会结构中引进其他“社会主义因素”（贝林格语），那么它就有在政治和社会方面失去自己基础的危险。

结果，从长远地来看，还有失去政治地位和打击力量的危险。根据这种情况，如果人们再注意到共产党和各个工会之间的关系已变得十分紧张的话（包括CGIL即意大利总工会，相当于我们的CGT法国总工会——它是接近意大利共产党的最大的工会），那么这种看法就更明确了。在大学生中也是这样，他们在一九六八年来的几年里，对意共不断产生一种既一致又持异议的感情，现在，对这个党的失望在增长；事实上，共产党已经失去了对大部分学生运动的控制。

法国共产党的境遇至少在开始时并非如此。当然，这个党极其幸运，它在处于反对党地位三十多年以后，于一九七八年重新在政府里担当若干职务。以一九七六年的市镇选举和一九七七年的省议会选举为基础，在这次选举中，左翼联盟取得了百分之五十三选票，在一九七八年的议会选举时，左翼联盟就能以几席之差成了多数派。然而，就是这个左翼联盟引起了法国共产党内部地位问题的深刻危机：在这段时间里，它的合作者社会党成为最强大的反对力量，并且在各次投票中明显地超过共产党，一九七六年的市镇选举和一九七七年三月的省议会选举都证明了这一点。根据民意测验，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获得选票的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二十二，而社会党却达到了百分之三十。社会党在它的纲领中提出了一个新的意识概念，即自由社会主义的概念，并且在共产党力图插足的地盘里赢得：由第三门类组成的中产阶级，文化教育界以及人数越来越多、在法国被称为“工程师，技术师和干部”的各个社会阶层里党员和选民的支持。社会党靠着和法国工人民主联盟所保持的关系，以及在企业中建立的小组，在社会上和企业里同共产党的竞争愈来愈激烈。

法国共产党还没有找到一个用以对付社会党人，加强它

自己的地位，而同时又不削弱左翼联盟的有效办法。它们的进攻取得最大成绩的大概是在组织方面，因为，即使在一九七六年，法国共产党还是和前一年一样，增加了近五万名党员，这就使得党员人数达到五十五万人。

但是，在政治方面，法国共产党进展不大，而首先是因为它在意识形态上和对社会党的态度上经常作铤而走险的突变，使人不能相信共产党已经有了变化这个假设。因此，一九七五年秋，法国共产党只好放弃了在工人运动面前揭露社会党人为“社会民主改革派”不能实现完成某些有决定意义的改革的企图，因为这种做法已被证明不为选民们所欢迎。一九七六年二月法共二十二大第二次决定，放弃在原则上广泛批评社会党，而只是强调法国共产党对忠于政治民主原则。但是，首先法国共产党打出了民族主义这张牌，目的是把由对吉斯卡尔·德斯坦的对外政策感到失望的戴高乐主义者吸引过来。由社会党在那里起着决定作用的左翼联盟就有可能被法国共产党所鼓吹的“法兰西人民联盟”所代替，由共产党在其间组成反对派的核心并决定其政治路线。

民族主义有可能成为共产党和戴派分裂派联盟的支柱，而且必定能在反对派中成为一个共同的基础，但是无论如何，这决不能成为着手进行左派所预见的政治和经济一系列根本改革的可靠原则。

最后，在西班牙就不同了。共产党人追随着两个目标。首先，从秘密状态中走出来，在一九七七年能够公开地开展活动；八月份，党的领导机关在一次公开大会时就设在罗马，并藉此机会公开了领导成员的名单，九月份，党的领导在马德里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同年末，在西班牙发动了一次吸收新党员的公开运动。

另一方面，他们加强行动，力图建立一个包括宗教界，军队以及现代资本家的代表在内的所有反佛朗哥主义力量的联盟，在克服了首先是非共产党诸力量历史上形成的对共产党的不信任等许多困难以后，共产党控制的“民主委员会”、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和社会党人领导的“民主统一政纲”，在一九七六年三月联合组成了《民主合作》的行动委员会。与此同时，在工会方面，“工人委员会”（亲共），“劳动者总同盟”（亲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和“工人工会联盟（亲社会党）于一九七六年四月联合成立了一个“工会组织合作委员会”。

最后，即使是某些明显的挫折，如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党主席圣地亚哥·卡里略周围的领导小组成员还被关押在狱，都成了对西班牙共产党有利的了。因为，国内的全体民主反对派（其中包括国外许多民主党和大部分国际舆论）使得苏亚雷斯政府在努力战胜极右反对派反抗国家民主化，首先是反对承认西班牙共产党的同时，得以巩固自己的后方。事实上，西班牙共产党是在一九七七年得到正式承认的，并被准许参加竞选，这里面包括他们的首脑圣地亚哥·卡里略和多洛雷斯·伊巴露丽，后者在五月份才从莫斯科移居回国。

政治民主的新定义

欧洲共产主义的口号意味着什么呢？这是否意味着在一九七七年五月马德里最高级会晤之后，像人们经常所猜测的那样，欧洲的三个共产党大党正在着手制定一个共同的战略？欧洲共产主义党人本身，特别是法国共产党对于这个新的口号采取一种暧昧的态度。在意大利共产党负责人贝林格

看来，这个概念表示了“在西欧各国促进并实行一种按照社会主义前景改造社会的新的解决办法”所作出的努力。贝林格认为，应该看到西欧一些共产党已经“在不受任何外部影响进行了一些研究之后，已经达到社会主义要走什么道路以及在它们各国所应建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等一系列问题上得出了同样的结果”。但是，这同样意味着欧洲共产主义不断摆脱苏联共产党的羁绊，越来越多地考虑到他们扎根其中的西欧地区和国家的固有条件和传统来制定自己的政策。因为，如果自从二十年代以来莫斯科的影响确实一直在使各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中起决定性作用，那么，现在一反往常，同莫斯科关系不断松弛就会改变欧洲共产主义各党的意识观念、政治观念、甚至组织机构，这是合乎逻辑的。这也同样意味着这种松弛有可能深刻地改变它们的传统特征，并且使各党各自的意识表现得更为明朗。因此，人们在采用欧洲共产主义这个概念的同时，不得不明确地加以区别。

这个概念首先表明了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共产党之间已经有了某些共同的特征。这首先指的是政治民主的新的重要意义这一点。贝林格、马歇和卡里略在东柏林的发言中都已经提到了，马德里最高级会谈的最后公报也十分明确地提到了。对于政治民主的重新考证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欧洲共产主义党人从此将给予资产阶级民主的基本权力和政治自由以一个重要的地位，甚至当涉及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时候。而且他们并不认为这个概念是一个简单的策略手段，它在为社会主义斗争中创造最起码的斗争条件，就像一九三五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后共产党人所做的那样。

这种精神状态在一九七六年十一月的社会党国际日内瓦大会上也找到了政治上的反映，这次大会第一次严肃讨论了

欧洲共产主义各党发生变化的可能性，并且在辩论中讨论了这个问题。威廉·勃兰特被选为新的主席后，把欧洲共产主义形容为一种“泛泛的，模糊不清的现象”，它不能明确地回答这究竟是取得政权的一种策略呢，还是真正是一种新的方针。他还说，然而不应忘记“某些共产党似乎在政治民主中准备冒险了”。就在去年的这次会议上第一次构划了如果欧洲共产党人继续坚持变革，从长期来看，有没有可能同社会党人不仅在西欧国家范围内，而且在国际范围内实现对话（而且包括有否可能在将在一九七八年进行选举的欧洲议会范围内的合作）。

对外政策方面的分歧

这些持欧洲共产主义观点的各党在一系列主要问题上，（例如对政治民主的重新估价问题）有它的共同之点可谈，但在其他方面这些政党却奉行使它们互相分离的路线（例如欧洲政策和安全政策）。因此，他们的不同点在此和社会党国际内部表现出来的同样明显。这些分歧正是这些党从屈从于莫斯科中不断摆脱出来的又一迹象，证明了这些党在本国范围内根扎得比以往更深了——这种扎根是通过该国的传统政策和该国共产党支持的政策之间更紧密的关系表现出来的。

例如，在欧洲共同体问题上，意大利共产党的观点曾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意大利亲欧洲派态度的影响。总之，在意大利共产党和西班牙共产党内，能够看到一种不断加强的倾向，即在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之间建立起更连贯的关系。意大利共产党和西班牙共产党在积极采取联结西欧各国的一体化

政策，尊重由西欧各国之间缔结的各项安全协定，努力寻求同国内合作者，以及同欧洲共同体的政治合作者建立尽可能广泛的一致。与此相反，法国共产党却总是狭隘地顺从国内影响相对深广、反对一体化的民族主义的潮流。这条路线最终导致法国在国际上陷于孤立，而法国共产党至今还在竭尽全力刺激英国人，欧洲人和西德人（同样也包括莫斯科）：人们能够极易设想，这对一个可能取得政权的左翼联盟政府来讲这种出发点是极不适宜的。

在欧洲共同体问题上，法国共产党屡次提到一九七二年的共同施政纲领，这个纲领规定只支持经济一体化而不支持政治共同体。因此，法国共产党反对预期在一九七八年举行的欧洲议会直接选举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法国共产党认为从长远来看随着欧洲议会建立而来的将是放弃一部分国家主权——出于竞选的策略以及基本的原则，法国共产党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最激烈地拒绝放弃国家主权，所以法共把这种看法当作思维推理的出发点是理所当然的。因此，一九七七年十月，法国共产党第一次表示同意欧洲议会选举可解释成是一种旨在有利于同社会党人和解的一种策略手段。在这个问题上，不应忘记法国共产党曾经提出过一个条件：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不能扩大欧洲议会的权限。这个保留态度使人不会期待法国共产党人会积极支持欧洲共同体更紧密的一体化。

意大利和西班牙共产党则坚持正好相反的观点，它们所持的观点是，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一个国家如果自行孤立，就不能维护自己的主权，只有选择一种超越各个国家权限的手段才能确保主权。因此，一九七六年当民主化过程取得成绩之后，西班牙共产党就多次提出无保留地着手使西班牙和

欧洲共同体合作，加速政治和经济的一体化。意大利共产党则从积极的角度看待在廷德曼斯报告里关于欧洲共同体内部一体化的政策的部分；此外，还向斯特拉斯堡选派了阿蒙德拉、加鲁兹和约蒂担任议员，这些人都是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成员，他们在政治上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还有一名议员斯贝纳里也是列在意共名单上当选的，他是前驻欧洲共同体专员。这样，意大利共产党在欧洲议会选举前一段时间里，就已经明确地表明，越来越重视自己在欧洲政策问题方面的活动。

这三个共产党在安全问题上的分歧并不亚于欧洲政策问题上的分歧。法国共产党显然受到社会党的压力，所以宣称不对法国保持在北大西洋公约政治组织内这个问题，以及两大集团开始并行发展，一直到建立一个解决欧洲安全问题的新体系提出异议。另一方面，准确地说在去年一年内，法国共产党却加紧了反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反对法国在事实上重新加入大西洋联盟的斗争。法国共产党认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衰弱，以及华沙条约组织同时得到加强，是走法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两个基本前提。因此，法国共产党现在以积极的眼光来看待打击力量，（这是它在一九七七年五月决定的），不会引起什么根本变化。因为法国共产党认为拥有核力量不过是捍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适当手段——首先对付在政治、经济各方面都大大地得到了加强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这就是政治局委员让·卡那帕和党的总书记乔治·马歇向中央委员会陈述计划时，进一步作为动议提出来的。

相反地，意大利和西班牙共产党却对军事平衡这个观点相去甚远。在西班牙，共产党人（加上社会党人）虽没有

停止反对西班牙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而且，目前他们提出撤除美国基地的附带要求，但是，这决不意味着他们已经放弃了对北大西洋联盟严守中立纲领的原则。党的总书记卡里略决不让人对他的党的政治远景存在一丝怀疑，他重申：“美国总有一天将要离开西班牙”。然而，他明确地表示这个撤离是不可预料的，而只能是缓和的结果，并且必须注意在严格前提下撤离驻扎在外国领土上的军队，必须本着严格的“互相”精神进行，也就是说，只有在“苏联从捷克斯洛伐克撤军”时，才能考虑撤走美军的问题。

一九七六年，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贝林格曾经将大西洋联盟描绘成，是保护完全自由地建设社会主义所不可缺少的盾牌。这个新的思想似乎没有在党的领导集团中充分讨论过。因为，自贝林格这次讲话以来，再也没有这样明确地谈到过这个问题。然而，这个声明表现出意大利共产党现在仍和过去一样，都不能容忍把大西洋联盟当作一个必要的累赘。其目的在于准备在政府中任职，不使继续执行生命攸关的缓和政策受到妨碍，以保持政治和军事平衡。相反地，意大利共产党积极地看待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由此产生的防务条约。其原因有二：第一个原因（意大利共产党没有明确说），是它害怕意大利承担的防务减削后造成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力量的削弱，势必损害了南斯拉夫对苏联所持的立场。然而，南斯拉夫对各个集团所持的保持和维护自主权的态度在意大利共产党的全部战略中占着重要的作用。因此，除了南斯拉夫以外，正是意大利共产党激烈地反对柏林共产党大会的最后公报中提出的，矛头指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条款，这决非偶然（法国共产党作了极大的努力来使人在最后的文件中接受这项条款，这一点是耐人寻味的）。

另一个原因（这一点意共则不怕公开提出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必要时将可能成为走自己的道路到达社会主义的一面庇护的盾牌。这一点就其实质上来说更富有戏剧性。因为，这意味着意大利共产党深信它的社会主义模式和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之间的对立是原则的分歧。现在它站在自身在国际上所占的地位上，开始对这种信念作出结论了。这些结论不仅超越了意共领导实际上已经放弃了关于两个阵营的传统观点，放弃了由此而产生的无论如何必须支持苏联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政策这个观念。而意大利共产党所取的立场也使人相信华沙条约，是威胁它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一种潜在的危险。因此，贝林格把意大利共产党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所采取的新路线和镇压布拉格的改良共产主义两者密切联系起来，也决非偶然。

由于存在着这些有分歧的立场，因而很难预料意大利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参加政府后会造造成什么后果，对西方集团组织以及欧洲和美国的关系上会带来什么影响（西班牙共产党原来就没有这种参加政府的前景）。在法国，一切还取决于社会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力量之比。预计，选举结束之后，社会党将比共产党强大，因此，如果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左翼联盟政府的话，即使只能在其中起着掣肘作用，它也只能在所有有争议的问题上（也就是说，首先是关于防务政策和欧洲政策），基本上站在社会党的立场上，除此以外，别无它择。因为，法国共产党在起草共同施政纲领过程中就已不得不基本上站在社会党的观点上了。但是，这意味着法国由左派统治的话，至少在短期或中期内，在防务政策和欧洲政策方面不会发生任何决定性的变化。此外，共产党意识到，鉴于经济关系非常复杂混乱，一个左翼联盟的法国必须同西方

维持良好的关系。因此，一九七六年底，共产党谨慎地把触角伸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甚至伸入美国，并通过它的“外交部长”卡那帕于一九七七年二月同美国驻巴黎的大使馆有资格的代表有了接触，这些活动决非偶然。

尽管有其他因素需要考虑，意大利的情况基本上也是这样。共产党甚至重新审核了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立场之后，也丝毫无意表明放弃对美国持批评态度。因此，他们首先努力专门对欧洲共同体和大西洋联盟施加更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以在欧洲共同体国家和原料生产国之间建立直接的关系开始，同时加强对母公司大部分设在美国的跨国公司的控制。此外，还可预料意大利共产党还将竭力希望美国第六舰队的地位和活动范围明确下来，因为第六舰队虽不属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却在意大利拥有许多基地。

另外，意大利共产党却无意来批评西方集团的结构。这是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贝林格在苏共二十五大上和在共产党柏林大会上明确声明的。最后，一九七六年十一月，意大利共产党军事问题专家，党的领导成员贝克赫尔利利用意共六名议员进入西欧联盟议院的机会，曾重新强调他的党希望为“在和平和民主旗帜下建设欧洲”而积极合作，这种合作是在共同体内结成的联盟和由西欧国家缔结的条约范围内进行的。仅仅这一点就表明负责总务的西欧联盟委员会之所以委托意大利共产党员西格尔来起草《贝尔格莱德欧洲合作和安全大会最后报告的执行情况》了。

西格尔认为，目前，各股主要政治力量在意大利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上，“观点极为一致”。

[此文发表在《瑞士月报》，1977年7月第四期。李海林译，葛智强校]

欧洲共产主义：讨论卡里略的 《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

萨姆·阿罗诺维奇

一、导言

圣地亚哥·卡里略在1976年“非法”进入西班牙后掌握时机写了《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这本书，正如他所说，是为了解决“今天共产党人面临的一个最混乱最困难的问题”。它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是一种重要的有创见的贡献，不过它是以简单、直率的方式写成的一本思想解放的重要著作。

这本书之所以重要，一部分是由于这样的事实，即一个重要的共产党的总书记写了一本书，它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始打破旧日的传统，同时又为那种有“欧洲共产主义”之称的策略提供了论据。当然，欧洲共产主义这个名称虽不十分确切。因为它也指向日本共产党那样不在欧洲的共产党，同时又被其他欧洲国家的共产党所拒绝。虽然如此，欧洲共产主义已经有了一种含义，这种含义卡里略描述为“当代进步革命运动的一种倾向，这种倾向力图切合本大陆的实际情况（虽然在根本上对所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适合），力图使具有当代特点的世界革命进程的发展符合欧洲的实际情况。

· 卡里略的书是献给三种人的：一般说来是献给西班牙人民，是献给他自己的党员以及献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这必定是胸有成竹的，因为这本书对这三种人都是有意识的政治干预。

我虽不打算摘要介绍这本书，不过想讨论一下这本书提出的许多问题，我不仅希望人们去阅读这本书，而且也希望继续这种讨论。

二、我们能说明欧洲共产主义的原理吗？

这里采用的名称是指被称为“欧洲共产党人”的那些共产党所具有的某种共同的策略观点。卡里略虽没有列出“内容清单”，但允许我根据他的书以及一些共产党和个别共产党员的其他文献，提出下列各点作为这种观点的合乎情理的概括：

第一、1917年的苏维埃模式不适用于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因为后者有强大而广泛的国家机器，有发展了的文明社会（就是以自愿赞助为基础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团体的体系），还有值得重视的民主传统和实践。

第二、在这种社会里，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要求工人阶级致力于通过它的组织在实际上增进它自身的团结并建立起一系列的联盟，从而使它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等一切领域中处于领导地位，这样它就能成为全体人民的代言人。

第三、社会主义道路是同扩大民主实践的广度和深度的斗争不可分，也是同打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限制和歪曲这些民主实践的各种障碍的斗争不可分。

第四、通过普遍的斗争而向社会主义前进可以是分阶段的，其中包括在国家组织中改变力量平衡（也影响强制机构），同时通过思想斗争，改变人民头脑中有关资本剥削的

合理性的观念。

第五、这种社会主义道路的关键是组成一个基于普遍支持的由选举产生的政府，为了实施一些使资本家的经济和政治权力受到巨大损害的纲领，这种政府会建立一种新型的民主制度，这种制度还不是社会主义的，却代表着向社会主义转化的过渡形式，如果人民大多数都准备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的话。

第六、这种社会主义道路不以建立一党政体为目标，同样，它认为一个政党（如西共）不能独享工人阶级的领导权。

最后，它认为社会主义是和在一切活动领域中扩大民主密切相连的。

卡里略自己把欧洲共产主义概括如下：

“在欧洲共产主义潮流的行列里的党一致需要走上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它实行民主，实行多党制、议会和代表机构。它通过普选定期行使人民的最高权力。工会独立于国家和党派。它给反对派以自由，人权、信仰自由，文化创新、艺术创作、科学发明的自由，它放手发展人民大众参加各级、各部门社会活动的最广泛的形式。”（第111页）

这样一种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一条不经过内战而走向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不是必然性，也不是毫无疑义的）。

三、欧洲共产主义的历史根源是什么？

我认为卡里略论述这个问题的章节是本书最使人感到兴趣的也是最重要的部分之一。他明确地指出，这些“欧洲共产主义的”倾向不是一夜之间出现的，而是起源于五十年代英国共产党制定的“英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起源于苏共二十大（由于赫鲁晓夫揭露了苏联的大量罪行）的影响，

起源于中苏分歧的结果（如对日本共产党的影响），起源于意大利共产党特别是陶里亚蒂认识的发展等等。不过他还追溯到更早的三十年代。他写道：“早在第二次大战以前，在共产党的某些普遍性论点（甚至在成为我们的许多观点和依据的称为斯大林主义的路线内部），与力求联系实际而又与实际相矛盾（有时不明显）的实践活动之间，就存在着一种分歧。（第113页）

于是他建议我们可能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上重新考察人民阵线的历史。他提到共产国际和莫里斯·多列士（法共领导人）之间的分歧，多列士主张法共参加法国人民阵线的政府，而共产国际则反对参加。卡里略说这不是一种次要的分歧，而是涉及人民阵线范围与内容的基本问题。他说：

“从结果来看，假使多列士的立场取胜就推测说事态定会怎样地发生，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可以设想，在多列士获胜的情况下，法国人民阵线是会与事实上的状况有所不同的。它制订更为坚定的反法西斯政策的能力，定会影响欧洲局势，很可能会影响西班牙局势。”（第114页）

卡里略已经开始但还不曾展开的论题在我看来是更为广泛和带根本性的。

苏维埃革命的模式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合适的。由苏共控制的共产国际一再作出错误的估计并破坏性地干预个别共产党的事务，人们猜想，它也干预过英国共产党的事务。兄弟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一再被苏维埃国家的需要所代替。

共产国际1935年第七次会议标志着一个重大的发展，但是正如卡里略所说，即使在那时，共产国际的干预使得一些共产党，例如法共和西共更难实现对他们最有利的策略。

在英国，正是共产国际第七次会议召开的一年，即季米特洛夫发表经典讲话的那年，英共党代会正式通过了一个“争取不列颠苏维埃”的纲领，这个纲领本身和季米特洛夫的探讨本质上是抵触的。

所有这些使我认为把欧洲共产主义看作仅仅是战后世界的产物是错误的。共产国际在战时解散、战争本身的经验以及象法国、意大利这些共产党在战时的作用加速了各国共产党已在实行的独立制订策略的过程。

四、卡里略和他的国家观

需要仔细地 and 批判地考查卡里略的国家观。

他说即使在最民主的资本主义社会，国家总是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力量；他说国家已经成为一个资本家集团即垄断资产阶级反对社会上其他阶级，也反对其他资产阶级的工具。他还断言国家正“越来越不成其为所有人的国家，越来越成为少数几个人的国家。（第25页）他的这些说法和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完全一致。

然而他接着谈到社会和国家的矛盾，他说：“鉴于国家机器目前具有的规模和特点，社会与国家的矛盾可能而且也应该越来越具体地表现为国家机器内部的危机。国家机器的大部分成员来自受损害的阶级，实际处境也类似。这些阶级在形成一支广大的群众力量之时，这些人不会象军队警察那样盘踞在铁蒺藜围墙中的军营里同整个社会隔绝。”（第25—26页）

卡里略非常重视他称之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工具”（这是追随阿尔蒂塞尔的观点）。在他看来，意识形态工具包括宗教、学校、家庭、法律、政治（可能包括政党？——作者）新闻报导（报刊、广播、电视等）以及文化等方面。（第20页）。

他认为正在增长的资本主义危机会影响这种庞大的意识形态工具，而社会主义力量通过勇敢、坚决和机智的斗争可以使意识形态的武器和意识形态工具反过来反对当政的阶级。（第45页）

通过使国家工具民主化来改造国家工具的斗争日益发展会在强制工具中得到反映。他以法国、意大利和荷兰的警察和军队中这种斗争的发展为例。在“国家强制工具”一章中试图就西班牙警察和军队在民主的西班牙应该起什么作用问题对这些武装力量的组成提出论断，为的是说明现在西班牙国内（和其他国家一样）在警察和武装力量之中必定存在的紧张关系。

于是卡里略问道，“出现了非战争因素造成的社会危机后，军人的思想能否发生民主的变化呢？他的回答是：

“总之，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革新力量，除了通过非传统的道路争取或中立军队的大多数——如果不是全体——之外，别无他路。这就要求革新力量对军事机器的看法有一个深刻的改变，对整个问题有一个新的看法，针对军人意识的某些特点造成影响，使之在军队内部也能扩大和深化当前社会危机的客观效果。”

他接着说，“那些原有的反对军队的做法，单纯的政治宣传，对待军队态度不当，显然都不利于工作，使工作无法进行，甚至会帮助当政的寡头集团同军队抱成一团。”（第65页）

卡里略提出了一些有影响的重要论点，他对军队的论述更有意义。但我持有保留意见。第一，卡里略把包括家庭、宗教、文化等在内的“国家的意识形态工具”这个概念接收过来，在我看来，在两个不同方面有所混淆。一方面，他把

国家实际上扩大到包括社会上各种制度从而使国家变成一个包罗万象的实体，这样国家就失去它的特性。另一方面，他不了解他所论述的许多制度，诸如教育制度（以英国为例）、政党制度（如政党在议会中的职能）都是既属于文明社会（属于民办组织的范围），又属于国家机构。

此外，是不是可以把国家单纯看作是一个阶级的工具，或者甚至是阶级的一部分的工具，这个问题是可以争论的。这后一种态度很接近于恢复早年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当作垄断资本家和国家的合成这个原来的定义。如果把国家的阶级性定义得这么狭隘，那么卡里略关于从国家外部或者从国家内部对国家进行民主改造的可能性的描述都是难以接受的。

国家民主改造的概念当然是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概念连在一起的。

五、哪一种策略？过渡问题

从1951年以来我们关于“英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长期讨论中可以看出，正是过渡的策略问题是所有问题中最复杂的问题。卡里略也正是在这个领域的有效探索中遇到困难，这是不足为奇的。他对过渡问题的讨论大部分可在“民主社会主义的模式”一章中找到。

这一章用这样一个名称的事实制造了某种混乱，即卡里略是不是真的预见到在建立国家政权，以直接地、有意识地建设社会主义以前存在某个阶段，这个阶段是他称为“反垄断的社会主义力量”所主张的。不过在这章开始讨论经济规划时，他说他的模式预料“所有制的公有形式和私有形式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的并存……，在这个尚不是社会主义、但也已不是垄断资本统治国家的阶段……”（第77页）接着卡里略写道：

“这种在经济上仍然混合的体制，将表现一种政治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企业主不仅能在经济上组织起来，而且能够组成代表其利益的政党。这将是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多元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克服社会差别将经历一个自然的过程，它不可能是强制措施的结果，它是生产力和社会服务事业发展的结果。这样，通过一种受教育推动的循序渐进的过程，各阶层的居民将组成一个社会集体。”（第80页）

政党的出现反映所有制的状况，不过多元化将包括那些建立在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结合基础上而不一定反映所有制性质的政党。这种非常“简单化”的观点是不可能接受的。这种观点也无视现有政党的发展趋势。

还有，谈到“自然过程”使我充满了某种不安。过渡时期不能不包括显而易见的紧张关系和斗争。在这样的时期，说一致同意能够“自然而自然”地出现是毫无意义的，正如智利的经验所表明的那样。这种表述方法只能使读者更加感到失之空泛和缺乏详细分析。

这种不安愈益增加，因为卡里略稍后说共产党在这个过程中并不想变成国家和社会的统治力量，也不想垄断政权，而是“要夺取这样的政权，在这样的政权中，代表上述力量（即文化力量和劳工力量——本文作者）的不同政治团体，按其实际比重参加为争取进步、社会主义和民主的竞赛并进行合作。”（第101页）

有时，我们把现在讨论的问题称为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显然革命者总是考虑着这一点。例如拉克劳在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学和意识形态》一书中引用葛兰西在1924年就担心意共拒绝国民议会而采用苏维埃这个概念，这种他认为是错误的态度。葛兰西问道：

“国民议会这个口号可能会重新流行起来吗？如果能，我们对它的态度应该怎样？简言之，现在的情形一定要有一个政治上的解决办法。这个解决办法最可行的形式是什么？认为我们从法西斯主义通向无产阶级专政是可能的吗？可能有或者大概有什么中间阶段？我认为在国家正在经历的危机中，处于有利地位的党将最理解这种必要的过渡阶段。”

对卡里略的批评

研究把过渡的性质理论化问题的方法之一是求助于对卡里略的两种批评意见。一是克劳丁在他的《欧洲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中直接提出的；另一种是弗兰克在《新左派评论》1978年3—4月号上评论克劳丁这本书时间接提出的。克劳丁在1964年逃亡以前是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他很同情欧洲共产主义，但是他对卡里略的方法有一些重大的批评。他认为对垄断资本主义进行批评攻击的阶段只能是一个“胜负未定的斗争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垄断资本虽被打得焦头烂额，但还没有被打败。那是一个包含着极其激烈的阶级斗争时期，因为垄断资本的失败标志着一个过程的开始，即资本主义的消灭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开始。”

克劳丁的判断是十分明确的：

去设想任何可以提供一个长时期“稳定的民主”的“先进的民主国家”是不现实的。去寻求一个和纯粹非垄断的资产阶级或者和垄断资本的任何部分的任何政治代表结成任何稳固的联盟也同样是幻想……”

克劳丁深刻批判了处于优势的一种循序渐进的策略“主要集中在政治舞台上，特别在选举中，它把群众活动和社会

斗争的一切形式都从属于寻求和一个部分或几个部分资产阶级的联盟（我们务必不要忘记非垄断的资产阶级占资产阶级的大部分，因而占有对工人阶级剥削的大部分）。”在他看来，今天资本主义在结构上的深刻危机为时不长。克劳丁代表所谓“左”的欧洲共产主义，而卡里略代表“右”的欧洲共产主义。

弗兰克则既批评了卡里略，又批评了克劳丁。

弗兰克和克劳丁一样不同意说垄断是“一种可以从经济制度中挖除的良性肿瘤，从而使患者更富于竞争能力和更加健康。”他同意说循序渐进的态度是容许反革命进行动员和组织的这种论断。然后他要求回答这个问题即如果危机是严重的，“为什么一定要为现实主义的中间策略留有余地，特别是危机本身不容许有更多的时间去发现这种策略并使它准备就绪？”弗兰克认为欧洲共产主义将永远不会提出政权这个关键问题。

四 点 评 论

第一，欧洲共产主义的旗号由于有关国家掩盖重要分歧而陷入险境。意大利党关于“历史性妥协”的幻想重视天主教民主党和它实质上的左翼的特点。但就现存的政治结构而言它和英国几乎不可相比，而西班牙和法国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分歧。这种策略路线如果要把这些不同情况包括进去的话，就必须广泛地加以定义。要不犯新的错误，需要不受建立新模式（即意共模式）的引诱。

第二，正由于不同的条件，先进工人阶级的权力概念必须按各国具体情况加以规定。我认为卡里略的贡献非常有限，但它影响到一些有关建立联盟的建议。

例如，工人阶级的组织，如果一定要得到他们想要获得

的东西，否则就不能达成协议，那么它们就不加入联盟。不过妥协的性质在各国间必定是不同的，而且在各国内部必定会根据经济和政治条件的非常微妙的平衡关系而不时改变。

第三，克劳丁关于反垄断联盟的看法是不必加以压制的。卡里略关于劳工和文化集团以及它们积极目的的观念和《英国走向社会主义》提出的建立广泛民主联盟的方法很接近。卡里略的这种观点也承认阶级分析并不详尽无遗地说明社会主义运动的性质，这些运动必定溶合在一个广泛的民主联盟之中，在这广泛的民主联盟中最基本的是妇女运动和切合民族抱负的运动。但是决不能把这种广泛的民主联盟的发展以及它的目的和着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协议等同起来。

第四，对所谓“循序渐进”的批评。我认为在我们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讨论中，对于资本家抵制和破坏的讨论确实是不充分的。只有从最近几期的《星期日泰晤士报》中谈到关于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对右翼工党政府联合施加压力，才能想象到即使是最温和地沿着“英国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也会引起怎样的反应。

政治条件

然而，我认为对卡里略的批评还没有击中要害。在资本主义世界确实存在着严重的危机，但是由此断言没有时间去发展广泛的民主联盟，而且言外之意是和弗兰克的立场一样，认为共产党应当迅速发动夺取政权的斗争，这都是不合逻辑的。如果政治条件尚未具备，如果这种做法促使反动当局采取最专横的独裁从而使工人运动倒退几十年，那怎么能够使夺取政权的斗争获得胜利？

最近在法国、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的选举中，各社会主义政党几乎惊人的发展（意大利最近的地方选举结果也是如此）表明，那种能够为革命转变创造政治条件的策略不是这种急躁所能取代的。

尽管有连续不断的政治危机，有军事政变的威胁，有美国在不同程度上的干预，意共已表明有能力扩展工人阶级和人民的力量。这使意大利的资本主义更难逆转这个进程，并且影响大企业利用外部压力的能力（虽然这些大企业肯定将这样做）。

然而，这种广义为欧洲共产主义的策略的发展带来一种在作风上和政策上趋炎附势的危险，这就会削弱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特别是和那些在大城市中心被排斥和疏远了的广大群众之间的联系。这种情形可以在意大利看到，特别可以在青年中看到。在法国，社会党和共产党正式的联合是得不到基层群众的充分支持的。

六、社会主义的性质和苏联的特点

卡里略批评列宁由于把民主这个一般概念和国家等同起来从而把民主贬低了。在承认苏联重大成就的同时，他对苏联的批评比戈兰在本刊撰文发起对社会主义民主的讨论时走得更远。

卡里略的观点是“十月革命已经产生了国家，这个国家虽然不是一个资产阶级国家，但是它迄今既不是无产阶级组织成为统治阶级，也不是一个真正工人的民主政体。”

卡里略后来在试图对苏联的政权性质下定义时指出，“问题在于，这个并非资本主义的国家，它和中央集权的君主政体一样，是封建社会与现代的资本主义议会之间的一个过渡阶段，而不是一个介于资本主义国家与真正的社会主义

国家之间的过渡阶段。假如是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就可以用其特性和职能，更为客观科学地对斯大林问题和其他类似的现象作出解释了。”（第164—165页）

蒙蒂·约翰斯通（《欧洲社会主义者》第3期第27页）批评卡里略，并且指出，更为有效的方法是去问一下统治苏联的官僚阶层在本质上和历史上是代表什么阶级，并且回答说它只能是苏联工人阶级。这是一场几乎还没开展就结束的讨论。

卡里略的书虽然没有俄文版能让苏联人民作出评价，但苏联报刊已极大敌意加以评论，这是不足为奇的。克劳丁认为苏联党对卡里略的敌意一部分是由于它害怕如果卡里略的看法在共产党中流传，他们就会不再承认苏共的正统性，并在苏联国内引起强烈的反响。我认为克劳丁的看法是抓住了实质。

卡里略的分析探讨由于法共和意共等即将成为包括他们在内的政府与苏联进行谈判的政党这个事实而变得复杂起来。不管这样的限制能否实现，而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马克思主义分析依然是全世界马克思政党的一项重要任务。

七、结束语

本文所触及的远不是卡里略所提出和讨论的全部问题。有关他对共产党的作用和多元政体的看法我谈得很少。他把西欧共产党在关于共同市场、核防卫等这些问题上缺乏一致的国际政策也公之于众。我希望卡里略的书将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的广泛涉及的评论和政治上的重新评价的一部分来加以阅读和讨论，我也希望民主的讨论和政治的实践结合起来。

〔原载英国《今日马克思主义》1978年7月号。〕

吴耀辉译，蒋恩慈校

是使马克思主义“现代化”？

——评圣地亚哥·卡里略

《欧洲共产主义国家》

欧文·西尔伯

欧洲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具体的政治力量，出现在许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中。它摆出一付挑战的架势。尽管迄今为止，还未曾与马列主义者正式较量过。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一经查阅马列主义的一些有关著作，那已被概述为欧洲共产主义的种种观点，便不值一驳了。

为此，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圣地亚哥·卡里略，在他所著的《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一书中，谨慎地运用了马列主义关于国家的主要论述，着重地论证了为什么这些观点已经不再适用的原因，至少对西班牙来说是如此。并且，由此推断，这些观点在日本以及西欧其他各资本主义国家内也是行不通的。

其次，即使马列主义者真正能从理论上推翻欧洲共产主义的论点，迄今还未能削弱西班牙、意大利、法国以及日本各修正主义党在工人阶级运动中的影响。卡里略的主要理论著作《欧洲共产主义和国家》一书英文版现在一定会大量发行，这是特别适时的。因为如果我们真的想了解一下西班牙

共产党现在开始走的到底是什么道路，那么，对这本书进行一下考察是必不可少的。

国家与革命

卡里略相当坦率地在开头写道：“国家政权问题依然是每次革命所要解决的问题。”这样写是正确的——但并不十分充分。其实，国家政权问题是革命的中心问题，而不用这样的方式提出问题，其本身就反映了对革命经验的重大修正。

接着，卡里略就要求拿出“站得住脚的观点来证明有可能使资本主义国家机器民主化并把它改造成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有效工具，而不必采用暴力从根本上加以摧毁。”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欧洲共产主义的实质，它也是以往所有修正主义者探讨这问题的基础。

卡里略承认，他的看法“不同于列宁在一九一七年以及一九一八年的论点”。卡里略说，这些论点“适用于俄国。理论上也适用于当时的其他各国”。但是卡里略认为，这些论点“今天已经被超越，已经不适用于西欧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不能适用，是因为经济结构起了变化，客观上壮大了进步的社会力量，包括核能力在内的生产力有了发展，社会主义和非殖民化取得了进展，法西斯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了失败。”

另一方面，按照卡里略的观点，现今存在着对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进行“民主改革的客观条件，至少在西欧是如此。即可以用这个国家机器作为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指引工具。卡里略说，现在不仅可能这样做，而且也绝对必要这样做。

卡里略还断言说，唯一可供选择的便是战争。而这场战争是不会限于国内战争的范围，而是超出国内战争以外，或者就是一场全欧大战。

然而，这样一场战争必“将是一场快速的核战争，其结果，将不会剩下什么能够争夺领导权的社会阶段了。”他还说，“它可能同时就是一场世界战争。而这场战争的结果将是斗争着的各阶级同归于尽，因为这场战争实际上会毁灭人类以及人类取得的物质和社会进步。”

在此，卡里略还引用了他在思想意识上的挚友尼基塔·赫鲁晓夫的观点。赫鲁晓夫也认为，原子武器的发展已经使通向社会主义的“和平”道路成了通往世界毁灭的唯一现实的代替物。现在有这么一种观点：无产阶级革命将不可避免地引起美国的核反应。但是即使我们会同意上述这种不甚可靠的观点，问题照样没有解决：无论你使用和平的“合法”手段，还是使用暴力革命的手段，以企图在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搞社会主义，难道就不会遭到帝国主义实力雄厚的军事力量的对付吗？一旦当“民主化”的国家机器开始认真地采取措施以实行社会主义纲领时，难道这一个国家的垄断资本家就不会诉诸此类对策吗？这不恰恰就是在智利发生过的事情吗？

不管怎样，卡里略同他的政党已致力于这条和平、民主、合法的道路。这条道路不是直接地实现社会主义，而是通过国家机构的民主改革，使国家自身在资本主义依然存在的情况下，能顺利地向社会主义前进。

但是，卡里略并非是个政治傻瓜。他懂得：“国家机器就其整体来说，仍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怎样才能使它改变呢？按照卡里略的观点，这个问题的答案主要是在意识形态

领域内。“资本主义国家的权威及其精神和物质力量是以社会的意识形态工具为基础的。我们现在必须采取的办法，本质上就是要争取革命思想在所谓社会意识形态工具中尽量夺取统治地位。无论在教会里、还是在教育界、文化界、政治力量相互关系方面以及新闻界等，都应该这样。”

对这一点决不能误解。这一观点是整个欧洲共产主义的战略核心。卡里略指出，“今天，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革命的战略，必须设法使这些意识形态工具反过来起作用，改造它，利用它（如果不是全部、则是部分地）来反对垄断资本的国家权力。（重点是原文加的）现代的经验表明，这是可能的。这也是通过民主道路改造国家机器的关键所在——除非发生战争或经济、政治灾难，而今天在发达的国家里这是很难想象的。”

卡里略对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活力的信心是很有影响力的。他把各种结构上的弱点归咎于资产阶级社会，因为这是由垄断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造成的。但是，他很难想象这些弱点，会导致政治和经济上的灾难。这种想法竟出自一个曾亲身经历过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的浩劫、经历过西班牙内战、经历过纳粹占领欧洲以及佛朗哥在西班牙的独裁统治年代的人。卡里略是不是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劫数难逃了呢？

教会与马克思主义

卡里略在各种变革中发现了各种有希望的迹象。这些变革发生在天主教会内，发生在教育方面，在家庭里，在宣传工具以及合法社会制度本身。他认为，“教会在传统上是统治阶级的基本意识形态工具。”而且，教会在佛朗哥法西斯独

裁统治期间也起过这种作用。然而，在教会中有某种民主化的倾向。

当然，把教会和国家完全分离开来，乃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没有完成的民主任务。甚至在二十世纪的下半叶，它仍然是推翻封建主义这个没有完成的事业的一部分。并且，这项任务肯定会引起工人阶级的关注。但是，卡里略将会很好地估量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事例的。在那些国家里，政教分离已经是好几世纪的历史事实了。而这种做法对国家机器则没有任何明显的削弱。

不过，卡里略在这里所探求的是另外一些东西，即与天主教会阶层的联盟——至少也是一种缓和。有了这种联盟，如果教会相应地放弃或者减弱它的传统的反共主义，共产党人也会同意不干涉教会内政。卡里略不得不替宗教和教会说好话。他说，必需指出，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工具的教会的危机，并不一定意味着基督教信仰的危机。相反，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引起宗教信仰的某种繁荣。许多基督教徒由于接近了马克思主义，已经恢复了自己的宗教信仰……我们深深地尊重这种情感。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认为，宗教具有毒害人的性质。而受到这种感情鼓舞的人，正在使宗教脱离这种性质，并且使宗教成为争取人类解放的一种鼓舞力。”

这一切令人感到震惊吗？这对于极力想取宠于一个国家的教会阶层的人来讲是不足为怪的。因为教会的竭力反对会阻塞其合法取得政权的道路的。这对乐于迎合那些追求尊严及责任感的偶像的群众中最落后的心理状态的人来说，也是不足为奇的。总之，由卡里略领导的西班牙共产党，是不愿意向现在还操纵在西班牙天主教会手中的意识形态霸权直接开火的。相反，西班牙共产党正在企图建立一个划分得十分清

楚的势力范围。在这种范围中，如果教会承认西班牙共产党在政治领域的合法地位，那末它也同样承认教会的“私有”领域。

卡里略对大专院校的看法，同样是颇有启发的。他认为，大学是国家机器民主化的关键力量。“今天，大学无疑应该在革命政治力量的活动中，占有突出的地位。这不仅因为大学高度集中了可以随时投入行动的青年群众，而且也因为大学为社会的意识形态工具培养着干部；在大学的各年级中传播马列主义的和进步思想，是确保反过来利用（至少部份地）这些工具的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同样，西班牙的家庭模式正在变化，卡里略看到了种种有希望的迹象和机会去打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于家庭的独霸控制。父母亲对子女的威信减弱了。子女已不再象往常那样驯服地顺从家庭的思想传统了。他们正在同这些传统决裂，甚至还在对他们的父辈施加影响。”

更值得注意的是卡里略的另一发现。他发现，“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这样一些国家的司法界内，……部分人（尚属少数，的见解已有所表达，他们严肃地考虑着司法权独立的主张。”他相信，这种现象正“朝着取得更大的民主这个新的历史性的进步。”随着一代又一代的大学生参加司法专业工作，这种现象必将进一步发展。对传统的资产阶级司法的谴责也必将广泛得多。”

必须记住，卡里略在此并非仅仅记录了某些变化。对于这些变化，人们可以称之为发生在资本主义上层建筑中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现代化。他看到的是这些发展作为使整个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民主化的关键力量，来得如此深入，竟然有可能从这些发展中找到一把钥匙，并使它变成成为一种能够

用以建设社会主义的工具。

新的姿态，老的主义

卡里略，在这里提出的历来是修正主义棘手的问题：西共要在资产阶级合法机构内部确实实现所提出的奋斗目标，又要持一个社会主义政党的立场，这怎么能办得到呢？

卡里略认为，解决的办法是在于打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以及国家机器的独霸控制。他相信，这个任务一定能够通过“渗透到国家机器内部并夺取对于工人阶级事业说来是重要的部门”以及他所谓的“文化力量”来完成。他还相信，由于上层建筑已经在发生变化，使得整个这一过程已经自发地发展到某种程度。卡里略并非头脑简单，以至于他会忽视国家强制工具支持着国家的意识形态工具这个事实。

这些强制机器，即警察、法庭、军队，列宁称为“特别的武装集团”。卡里略并不忽视国家强制机器的作用，他明白这个问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对这个问题写了整整一章。

他的回答是，共产党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力量，“就必须对国家强制的或非强制的工具及其成员，采取一种不同于历来采取的态度。”卡里略自己表示，这种新的态度，实际上，相当于向警方及官方部队直接呼吁，目的在于使他们确信，西班牙共产党一定会坚持一种作为整个社会保护人的合适的职能。

卡里略谈到，就以警察而言，他们为了保护社会免遭扰乱分子的破坏，为了维持交通，保护居民是应该存在的。他说，他们不能用来镇压罢工和人民的游行示威。卡里略要求有一个“较为民主的公共秩序……要从维护全体人民而不是

维护少数特权者利益的思想出发。”为了使警察摒弃他们历来作为资产阶级利益保护者的作用，西班牙共产党大力鼓吹警察有权“组织工会，能够维护自身的权利和职业尊严”。确实地，在治安部门内部有一部分团体“专门镇压人民的……但是，如果政策得当，在治安部门内就会有反对这些常给从事这一行的整体抹黑的同盟者”。

关于军队，“要求革新力量对军事机器的看法有一个深刻的改变，对整个问题有一个新的看法，针对军人意识的某些特点造成影响。”卡里略承认，“多次的经验，其中包括一九七三年智利经验和其他许多经验。都证明了军队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可能变成寡头集团的政党，当普选威胁到寡头集团的特权，军队就成了寡头集团放在天平上的一个拥有飞机、坦克、大炮、机关枪和步枪的政党。

但是，事情并非全然如此。他说，“今天，军队干部应象技术人员，科学家、知识分子一样，在国内起一种训练人的作用，教会人们保卫领土免遭外来入侵。……现代军队的军官应该有文化，他们的社会威望应建立在知识水平基础上，而不应建立在标明与他人不同的武器和军服上”。

这样，事情就很明白了。要在西班牙实行社会主义，战略是建筑在普选权的基础上的。通过普选使工人阶级进入政府机构并深入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工具中去。这样做会反过来打破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对社会的独霸控制，并且同时影响到治安部门及武装部队，军队对资产阶级传统的忠诚，能够被“民主的军事政策”所改变。这个政策能够尊重“各行各业”的尊严。显然，卡里略很好地接受了人们的意见，已经强调了关于他所期待发生的社会变革的“逐步”性质，

当然，还存在一些诸如资产阶级对国家的经济命脉的控

牌，还有西班牙对美国以及西欧帝国主义不可分割的联系等等微不足道的问题。关于民主政府抑制垄断资本之特权的问题，卡里略只含糊不清地谈及到一些。此外，没有说什么。

仅有的合法手段

现在存在这样的问题。一场斗争卷入了两种敌对的力量。如果不充分地估计到对方各种可能的选择。那是远远不足于为自己的力量制定战略战术的。尤其是因为你的计划一定而且必须以公开的方式来开展，即使资产阶级对于威胁其阶级地位的行动只能通过它现在所拥有的权力形式作出反应，这个在《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一书中所概述的战略，也是会迂到许多困难的。但是，所有的历史证明，一个统治阶级当其资产及财富老是遭难时，为了免受威胁经常会超越自己的法律限制，这是毫无例外的。并且，它没有必要等到这种威胁酿成之后再采取行动，

只要社会的生产过程还是受到资产阶级阶级关系的支配，资产阶级思想的客观力量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恢复，甚至超出这种有意识的几乎不可避免的反应。由于卡里略为社会变革设计背景时竭尽全力避免发生可能的战争或者灾难性的经济危机，情况就更是这样。

不过，这位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急于表明他对资产阶级法律结构的坚定信念，以至于如果为了实现社会主义要损害已经制定的资产阶级民主秩序的规范，那么，他宁可消除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因此，他建议对资产阶级政权的各个方面进行逐步地点滴地改变，只能用一种完全合法的方式和在断然放弃破坏现存国家机器的前提下完成是完全自然的。

简言之，卡里略深信不粉碎旧国家机器的条件下而赢得政权的可能性。(用“夺取”这个字眼对卡里略无疑太过激了)。他说，至于警察、军队和国家官僚机构对于西班牙共产党的夺取政权，没有什么可害怕的。因为他们本身的权力地位将不受侵犯。

在这样的情况下，卡里略不可能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而且，他完全放弃这种理论。因为无产阶级专政预言必须镇压被推翻的统治阶级的必然的反革命努力，并否认资产阶级及其支持者们的财富，训练有素，经验以及影响，即他们在政治上组织起来的权力。

在卡里略异想天开的欧洲共产主义世界里，无产阶级专政完全是一种不必要的累赘。卡里略充分地意识到，他正在丢弃不仅由列宁，而且首先是由马克思所创立的概念。他的解释与他所有其他修正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一样。时代不同了。如今的情况也不同于沙俄时代了。这种解释使卡里略可以在坚持这种论调的同时有力地割断他与列宁时代的老牌修正主义头子卡尔·考茨基的联系，看来，那位可怜的考茨基的错误就在于他是一个不成熟的修正主义者罢了，

然而，卡里略的论题有个重要的例外。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和革命的暴力，“在一些不发达的国家可能仍是需要的。因为这些国家里所以发生革命，往往是为了对付帝国主义武装侵略或者是为了对付恐怖与暴力的政府……然而，我确信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发达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劳动力量建立和巩固领导权的途径。”

但是，难道这些“发达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统治阶级只是在保护他们的利益不受不发达国家的侵犯时才使用暴力和恐怖吗？如果他们为了保卫他们领土的一部分能这样做

的话，那末，当他们在自己政权的心脏地区受到威胁时，我们能否期望他们少用些武力呢？

只有一条出路可摆脱此种困境。这个问题在卡里略的《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里找不到答案，这是卡里略书中没有写完的章节。卡里略能够准备考虑他的论题理由就是，欧洲共产主义根本不是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这就是这种理论最终能使资产阶级接受下来的原因。卡里略实际上谈的，不是别的，只是对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更加老练的翻版，在那里工人们将为他们的劳动取得更为合理的报酬，并且对资产阶级政权的侵蚀，将是逐步而细微以至于令人难以觉察。

不幸的是，就连这样的选择也仅仅是一种烟云即逝的梦想。它假设资本主义有解决最内在的矛盾的能力，使其保持一种缓和的状态。这个悲剧是一有机会欧洲共产党人就要开动这架失去功能的怪胎机器，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在最关键的紧急时刻，解除了工人阶级的武装。

〔摘译自美《前卫》报1978年5月3、10日。〕

邱晨译，吴耀辉校〕

西班牙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简介

塞瓦斯蒂安·萨皮拉因

西班牙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于4月19日—22日在马德里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一千四百九十四名代表，代表着二十万一千七百四十名党员。出席会议的还有各种主要政治力量的代表、工会代表、著名的知识分子代表、三十六个外国代表团、以及参加过西班牙反法西斯战斗的各国际支队成员。这就使得这次代表大会格外重要。

这次代表大会是具有历史性的，因为从1932年在塞维利亚召开第四次党代会后四十六年来，它是第一次合法的会议；这次党代会的历史性质也因为在大会召开以前，曾对与大会的议题有关的民主和社会主义问题、以及对中央委员会提交党代会的党章，组织了广泛的讨论。

总书记所作的政治报告，全面地综述了从法西斯专政年代直到现在党所经历的长期过程。这个报告标志我们党的历史发展的里程碑，指出了它的一贯过程，充满了不断创造和把原则应用于具体现实的情况的精神，并适当地考虑新的情况和变化。正是用这种方法使我们在政治上、理论上、思想上获得显著发展，并使我们的战略战术得以符合我们共产党

译者注：作者系西共中央委员。

人在国内外进行工作的非常复杂而独特的环境。

我党精心创作了一系列的概念，它们在从专政到民主的过渡时期起着主要作用。这些概念有：全国性妥协的方针，劳工力量和文化力量联盟，自由缔约，民主集中的方针，以及把促进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看作是在自由条件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总书记的报告直截了当地声称：安达卢西亚、埃斯特雷马杜拉、卡斯蒂利亚、以及其他地区的民族尽管内部情况已起了明显变化，仍生活在从前那样的环境中，受到同样是指定的行政长官的统治，处于同样反对劳动人民的社会结构和威胁之中。在安达卢西亚和埃斯特雷马杜拉这些地区，失业和营养不良已经积聚起的愤懑与怨恨可以在任何时刻一触即发。卡里略在报告中自我批评说，[党]合法化已经好几个月了，但还没有使我们的声音传遍全国各地。

他说：“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迄今为止还没有使所有的干部和所有的党员都懂得必须吸引新的支持者。而如果我们渗入最边远的地区，把党的信息带到这些地区去，打开那里人民的眼界，那么这一点是必要的。我们依旧把自己主要局限在我们自己组织中、在党员中开展工作。我们还没有超越我们自己的组织，深入到群众中去，去反对统治阶级的压力，去反对他们的思想影响，去扩大我们在整个社会中的影响。我们往往在家里讲得多，在街上讲得少；对于我们自己讲得多，对人民讲得少。

“可是，不注意到在如此短的一个时期已经发生的许多变革是一种错误，低估这些变革也是一种过失。”（《工人世界》、1978年4月20日）。在一个短时期内，我们赢得了出版自由，结社自由，示威和罢工的权利；我们从监狱里营救出一些同志，赢得了一次赦免，使一些在佛朗哥独裁制度下受

到迫害的人们恢复工作。普选产生的下议院和参议院，现在在前佛朗哥的议会和全国运动委员会（长枪党）的大楼里开会。西班牙的各民族与各地区已优先赋予自治地位，并建立了各自的政府机构，并为进一步发扬民主的愿望提供法律根据。各种政党、各类工会，妇女运动、青年组织现在都公开活动。在民主这个理想激励下制定了一部新宪法。尽管这部宪法不是尽如人意，但它总是为社会改革和经济改革铺平道路。

我们有两种力量的斗争。一方面是前独裁制度的支持者们，他们想控制重新建立的政府机构。他们威胁、侮辱和攻击共产党人、教会工作人员、军官、甚至部长，他们进行危险的恐怖主义的行动和破坏活动，妄图搞垮经济。另一方面是力求加强民主的进步力量。他们把政治变革进行到底的决心越来越大。在工会选举中，尽管所有雇主和政府都设法开动黄色工会，但是工人委员会和总工会、还是夺得了引人注目的胜利，而工人阶级抵制了破坏蒙克赫阿协约的企图——这一切都是进步力量日益增长的标志。但是我们的责任是使人民群众保持警惕，动员他们积极参加实现变革，以团结最广泛的人民群众的方式来进行工作。用巴斯克地区共产党总书记罗伯托·莱特斯苏迪的话来说，我们必须在西班牙各民族的努力下，清除恐怖主义，孤立那些想复辟独裁制度的人们，并制止他们不使其发展成为严重的威胁。总之，这个时期要求有明智的判断，要坚定不移、坚持不懈、坚忍不拔，以便使我们已经赢得的变革不致逆转，并在西班牙历史上开辟新篇章。

相当多的代表同意把西班牙共产党规定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民主的党，是以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

克思和恩格斯制订的社会发展理论及其分析方法为基础的。”大会决议指出：“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就其至今依然有效的部分而言，西共已经吸收了；正如它已经吸收了其他伟大革命家的贡献一样。不过党是从这样的事实出发，即今天已不可能遵循‘列宁主义是我们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这个限定性的公式了。”“我们认为我们是那些在1917年俄国困难条件下、在列宁领导下能够实现世界上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的人们的后继者，而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现代世界革命的进程。这就是我们与社会民主党人的历史性区别。”

代表大会批准第十五项议题作为它的决议案之一，并强调说：“西共拒绝对马克思主义的一切教条主义的概念。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而不是教条的。西共一贯力求提高它考察社会客观变化、考察新的科学成就和革命实践经验的能力。西共力求的批判精神吸收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一些新因素。”

西共将继续批判社会民主党。然而它欢迎某些社会主义党和社会民主党或他们的部分组织所采取的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的步骤。西共强调必须作出努力以求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使国际工人阶级运动重新统一起来。我们党主张马克思主义的力量和社会民主党的力量、一切人民的力量，在为和平、裁军、民族自决和民族独立、为各民族的平等合作、为进步、社会主义和民主、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统一行动。

由于这些观点的逐步发展，因此正如我们的宣言纲要所指出的，西共的工作就是要在西班牙创建一个新的政治实体，这个实体是由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各个党派、各工会组织、各种合作运动、以及其他社会和政治组织所组成。这个新的实体将尊重每一个成员的特性、独立性和人生观，并将统一

他们的力量成为资产阶级政府的现实的代替物，一个能够在民主条件下领导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代替物。”其他的基本因素是民主集中制和国际主义。

大会决议指出：“我们是以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为指导，并在合法的条件下，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运用这个原则，从而促进内部民主的活跃。

正如圣地亚哥·卡里略在他的总结报告中所说：“有人不相信我们能开成一个民主的代表大会。甚至在大会前夕，他们仍然认为：‘共产党将会瓦解’，‘西共和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将会彼此对立’，‘共产党各组织一定会分裂’”。的确，这次代表大会是讨论过各种不同观点，但是我要说，在本质上，这些不同观点，并不象它们看起来那样对抗。

“不能让人对我们党会分裂成列宁主义者和反列宁主义者抱有希望。我们都是共产党人。我们都为共产主义而奋斗。我们都是马克思主义者，都是革命者、都是民主主义者。我们都认为列宁是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家，是我们的导师之一，我们今后将继续向他学习。我们决不会分裂成列宁主义者和反列宁主义者。”

大会决议并不取代1975年党的全会所批准的宣言纲要。该宣言纲要的一些建议，就其被大会决议毫无变更地保留下来的内容而言，具有全部效力。诸如民主集中制的政策，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是通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一个阶段，工会政策，妇女解放，乡村事务，青年、文教政策，文化运动和文明运动，外交政策和国防，移民，中小型企业以及个体劳动者，渔船和商船。所有这些问题，党的政策都在宣言纲要中讲清楚了。

我党国际政策的主要目的在于保证西班牙的主权和独

立，保证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前途而不受外国干涉，保证我们边界的安全。因此西共拥护不结盟政策，赞成各国和平共处，赞成缓和，赞成裁军，赞成解散现有军事集团。这样一种政策能保证人民的自由权、自决权和人权，能促进合作并在友好和互利的基础上建立各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

西共在支持西班牙成为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成员国时，重申它希望和其他西欧左派力量一起，改变现在由大垄断资本控制着的这个共同体的现有性质。我们想看到即使资本主义的欧洲也是一个劳工的欧洲，一个各民族共处的欧洲。我们想看到西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统一起来，有它自己独立的政策、以促进解散军事集团、保证各民族的最大自由，从而使他们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

换句话说，如果西欧政权的政治倾向被改变了，那么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改革就可能接踵而来。而工人阶级、工会和党的力量日益增长、文化力量日益进步、中间阶层和垄断寡头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等这些主观条件的出现会有助于这种改革。我们正在从事的工作是要建立一个可能为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多中心的和民主的道路创造条件的西欧，而在人力耗费、社会耗费和经济耗费方而比其他国家所花的代价要少；只要我们不因那种说帝国主义的腐朽性会使资本主义自行消亡的虚伪概念而麻痹斗志，那么建立这样的西欧是可能的。

致力于改造社会的那些力量所形成的国际潮流是支持西欧的这些变革的。帝国主义制度已“不大容易从它所遭受的打击中恢复元气。除了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外，今天还出现另一些国家，它们已经挣脱了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统治，正在实施广泛的社会改革。这些国家在经历了艰难甚至曲折

以后，主张以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世界帝国主义已不再是唯一的制度，它想重建霸权地位的机会正越来越受到限制。由于非殖民化，以及前殖民地国家和非独立国家为保卫他们的利益、特别为保卫原油和其他原料价格而进行的合作，帝国主义的挫折已经进一步加重了。所有这些因素都说明了现代经济危机的前所未有的性质和持久的原因。这些因素破坏了帝国主义的国际关系，并导致比较民主的国际关系的出现。

如果说，只要帝国主义存在一天，只要军事集团和军备竞赛存在一天，世界大战的危险就不能完全排除这是确实的话；那么，同样确实的是，这样一次世界大战决不会引起像1917年在俄国或1945年在欧洲和亚洲所引起的那样一种革命危机。相反，这样一次世界大战对于全人类将是一次可怕的大倒退，一场大屠杀，在这场大屠杀中的受害者既包括进步力量，也包括保守力量。

但是，即使没有世界大战，两种制度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开始对生态平衡、生物品种产生有害的影响，并且威胁到我们这个星球本身的存在。我们共产党人和一切有理性的人民一起，把和平运动、解散军事集团、裁军以及所有民族和国家间的合作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苏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在赫尔辛基和贝尔格莱德召开的欧洲安全会议，以及如果西班牙仍不参加北约，1980年就将在马德里召开的欧洲安全会议，都将继续进行，直到获得有益的成果。事实上为和平而斗争现在已成为为人类的生存而斗争，为保卫文明而斗争。

西共主张：“采取有效措施以保证各个国家和各个民族的安全、停止对人民生活条件带来严重有害影响的军备竞赛。”这是西共为和平而斗争作出自己的具体贡献。西共无

条件地反对“生产新型的大规模毁灭武器，诸如中子弹。”

目前形势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我党明确地坚决地反对西班牙成为北约成员国。大会决议指出：“参加北约，从逻辑上说，会加强欧洲军事集团，加速军备竞赛及其对世界安全与和平的一切消极影响。此外，西班牙成为北约成员国对于国家的经济会增加沉重的负担，对于国家的军事力量会带来巨大的损失，尽管所有的宣传机构说的正好相反。而且还会有另一个严重后果：西班牙，特别是加那利群岛和巴利阿里群岛，会陷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联盟的战略计划之中”。然而，我们坚定地希望看到西班牙摆脱一切外国军事基地摆脱一切限制我们国家主权的条约和协定。”

同时，西共欢迎和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正常化，认为它是向前迈进的一步。西共也支持在互利基础上发展经济、政治和文化联系。

西共正在协助世界各地加强工人运动和反帝运动。它将继续竭尽所能来缓和和克服会削弱反殖反帝群众斗争的各种分歧和争论。它将为建立一个广泛的世界范围的反帝阵线而努力，在这个反帝阵线中将尊重各个党和各种运动的独立和地位，将力求统一行动，将接受各种反帝力量和反帝集团的多样性。西共和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保持友好关系，并准备在互不干涉、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和所有党派建立友好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正在努力改善和苏共的关系。同时，西共希望和中共有正常关系。

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新党章。新党章作了大量的修改以适应党合法化的新条件，并促进各级党组织内部的民主。

圣地亚哥·卡里略的总结报告充满了对我们事业的必胜信念。

“我们将继续为民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斗争。我们将和一切想要加强和扩大民主的人们一起前进。我们将在自由和民主条件下为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而斗争中竭尽全力寻求新的同盟者。我们要在这个国家建立这样一种社会，而且毫无疑义，我们将会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建立起这样一种社会。

“西班牙的未来是属于我们的。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只属于共产党人。未来属于共产党人，社会党人，民主党人，属于一切想阻止保守力量和反动力量重新抬头的进步力量。

让我们向一个更坚强的民主政体，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勇敢前进！”

〔摘译自《世界马克思主义评论》1978年第9期。〕

吴耀辉译，蒋恩慈校〕

意大利共产党的“历史性妥协”： 取得政权的新途径？

埃里克·肖

“欧洲共产主义”这一被很多人认为是伪装或幻想的一种现象，已引起人们显著的关注。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被人们看作最与这个名称相符的政党——意大利共产党——在选举中的号召力和政治影响稳步增长缘故。

今年春天，意共正式成为“其有共同纲领的多数”的一部分——在议会中支持天主教民主党少数派政府的五种政治力量之一。意共在赢得了34%以上选民的支持，因而使它和执政的天主教民主党的差距缩小到4%以后，已经充分显示出它在西方共产主义运动中最重要的地位。意共的许多方面情况已在西方引起了争论——它的政策、它对民主的态度、以及党内结构等。这里我们将只讨论一个方面——但却也许是最重要的并且无疑是最新的一个方面：它的“历史性妥协”的战略。“历史性妥协”作为取得政权的一种道路，标志着同马列主义学说和传统的共产党活动方式作了戏剧性的决裂。

原注：作者是工党国际部的助理研究员。但本文纯以个人身份撰写。关于这个题目另可参阅唐纳德·萨松：《意大利共产党的欧洲战略》载《政治季刊》，1976年7—9月号，第253—275页。

欧洲共产主义的起源

为了了解意共当前的战略，即所谓的“历史性妥协”，必须扼要地叙述它从1945年以来的演变过程。历史性妥协的概念渊源于共产党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阶段的观念和活动在陶里亚帝的领导下，党早就表明它渴望同意大利社会党和那时新成立的天主教民主党建立联盟。意共也确实提出建议和天主教民主党订立“一个共同行动盟约，以实现经济的、政治的以及社会复兴的共同纲领”。在经济方面，意共提出了一个有节制的、调和的政策，避免任何根本改变财产的关系意图。它运用影响来限制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和要求更民主的管理制度。意共一方面主张一般的天主教徒、共产党员和社会党员在下面结成联盟，另一方面意共领导倾注全力于各政党的上层人物之间的合作。这个方式在七十年代再度被采用。虽然，通过研究五十年代的历史和政治，人们会很好地了解到，意共那时作为一个“反体制”的政党是同当时意大利的社会，政治制度相疏远，并且在完全相对抗的。但是严酷的战后年代中（意共在1947年5月以前一直是参加政府的），它的实际活动却是符合宪法和议会的准则的。

那时有许多因素把意共推往这个方向——苏联和西方划分势力范围的协议（按照这个协议意大利处于西方范围），斯大林决心不容忍在西方发生危及这个协议的任何革命活动，以及西方在意大利驻有军事力量等等。然而奠定意共思想基础的却是渊源于它以前的领袖和理论家葛兰西的一种战略。葛兰西相信，为了树立在意识上和在社会上的统治权——这是在政治上取得最高权力的必要前提——意共必须在社会

生活各方面确立自己的地位。因此，它应该摒弃一切宗派主义和排他性的解决办法，而实行一种和各种社会集团与各种行业结成联盟的公开战略。尤其是要承认天主教会在意大利社会上的决定性地位。党在这种地方试图建立一种和解的而不是对立的关系——尽管这种态度并没有得到梵蒂冈的响应。

1947年，意共被排斥出政府。在严酷和不调和的冷战政治气氛中，社会的和政治的裂痕加深了。意共和天主教民主党的关系，其特征是充满了敌意。但是，与法国共产党不同，意共并没有养成一种堡垒式的心理状态。它不断地重新估价和调整自己的政治战略和策略，尤其是在1956年的动乱事件（指匈牙利事件——译者）以后，这个事件动摇了许许多多忠诚的共产党人对于马列主义教义的绝对正确性和世界共产主义的领导权的信念。这个重新思考的过程在意共领袖恩里科·贝林格对“历史性妥协”的揭示中达到了顶峰——实际上，这是一个为解决意大利的许多问题而和党的世仇天主教民主党进行合作的提议。

共产党的领袖们用以下三点明显的理由证明历史性妥协是正确的：过去不久的和当代的意大利国内外的的发展表明，对意大利民主制度和对劳工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的政治威胁仍然是确实存在和十分危险的，意大利社会的多种多样和复杂的社会意识结构要求在各种社会集团彼此之间进行合作；意大利当前面临的经济危机要求各种社会政治力量广泛联合。

“历史性妥协”的政治因素

早些年代对许多共产党的那些指责——低估极右翼在危

机时刻反击的危险以及不能区分民主派和极右派——是不能用来攻击意共的。意共在法西斯主义统治时期的经历，在党的集体的心灵上留下了痕迹，并且继续指导着党的行动。党在那时遭受的孤立，使党领导者们相信必须尽可能与其他政治力量合作。因而产生了和社会党以至在今天和更右的集团保持友好关系的渴望。党承认法西斯政权在当时得到民众支持这样一个事实。党相信，希望由右派采用极权主义的方法来解决当前难以对付的意大利问题的呼声仍然是强烈的，尤其是在这国家的大量中等阶级（所谓“ceti medi”即中间阶层人士中间）。

在意大利，阿连德政府的垮台对共产党人的思想产生了普遍的冲击，影响之深，怎么说也不为过分。贝林格被智利的悲剧弄得窘困不堪，这是可以理解的。他像许多人一样，认为意大利在它的社会结构、历史和传统方面更接近于智利而不是接近于北欧较稳定的民主制国家。意共所以摒弃法国式的左派联合（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战略的主要原因，也许就是它相信这会使意大利社会两极分化，把天主教民主党逼向右转，助长外国操纵的“不稳定”运动，以及怂恿成立一个极权主义右翼政权。下面的一些事实，为这种分析提供说服力。1969年至1974年间法西斯唆使的暴力行动和破坏（造成相当数量的死亡），表明存在着想要使用恐怖行为的力量。已有更多的事实证明，在军队、特务机关和陆军警察中，具有法西斯主义思想的人数量仍是很多的。（军事部门和保安部门的有几个主要人物或是曾经同右翼的反共和政府阴谋，有过牵连或是已成为法西斯式政党“意大利社会运动组织”的积极分子——甚至是该组织在国会的议员。）而且，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初期的工业动乱和加剧的紧

张政治形势，引起了支持“意大利社会运动组织”的力量的高涨（它在1972年的选举中赢得了近三百万选票，占选票总数的8.7%）。“意大利社会运动组织”在1976年获得的选票回降至6.1%，这完全可能是因为天主教民主党在其右翼的安蒂诺雷·范范尼的授意下，开展了一个渲染恐怖和提倡“法律与秩序”的运动，向那些原来可能投票赞成法西斯的选民发出呼吁的缘故。

由此可见，存在着可供强大的右翼极权主义运动发展的肥沃土壤——这个运动也许受到外界的援助。因此意共认为，要紧的是阻止那些介于两种相反和尖锐对立的力量之间的人们发生两极分化。意共领袖认为，阿连德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没有做更多的工作去谋求天主教民主党的好感，而他们自己则想避免这个错误。这就部分地解释了共产党战略发生重大转变的原因。多年来，党一直主张意大利社会的三股政治、文化力量之间的和解：共产党、天主教和社会党，它的理由是，这种联合曾在抵抗运动中成功地发挥过作用。在五十年代末期和六十年代，党的领袖鼓励在共产党人和天主教徒间的对话。有些人曾希望天主教民主党内部发生左派和右派的分裂。但是后来放弃了这些希望，现在意共领袖已完全否认在天主教民主党内煽动分裂的任何意图。他们固然仍旧在谈天主教传统和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汇合”，实际上他们给予这个名词以狭义的党派政治的含意，并且表示出明显地希望和天主教民主党领袖达成一些协议。

最后的一点是，意共的许多领袖认为，意共和天主教民主党相互合作地进入执政势力范围，是使国内外那些对党怀疑的人们确信党有民主传统的一个途径。“历史性妥协”是意共在为争取国际尊重和民主信用的长期斗争中的又一努力。值

得注意的是，在这方面意共一直致力于和欧洲各国的社会民主党与美洲各国的自由党建立友好关系，尤其是在近几年内。

“历史性妥协”的社会因素

“历史性妥协”在社会方面是作为许多影响的汇合而发展的。首先是意识上的影响——发挥意识方面的作用，使这个战略具有合法性——也就是葛兰西的遗训。葛兰西把社会上两种权威作了明确区别：他把“统治”（domination）规定为使用强制的手段，而认为霸权（hegemony）则是一个复杂深奥的概念，指的是一种世界观，一套关于价值、态度和信仰的概念。他认为，这样的一种文化、道德体系，是通过一些控制思想意识的工具（例如那些有广泛影响的宣传工具）和实现社会化的一般过程（教育、宗教熏陶、家庭）而灌输形成的。这是统治阶级用来维护其权力以及保证人们服从其统治的手段。工人阶级如果打算取代资产阶级而成为新的统治阶级就必须创立一种反霸权。工人阶级——或是更确切地说，它的有组织的政治上的代表共产党——必须使自己的思想意识家喻户晓并且取得自己势力范围以外的人们的支持，扩展其影响到其他的、并非客观上敌对的社会集团中去。

意共领袖把葛兰西的理论应用在两个方面。首先，他们寻求在社会的各部门和各方面树立共产党的地位——包括劳工世界和有闲阶级，涉及经济的、政治的、专门职业的和文化的组织机构。其次，他们着手建立一个“联盟系统”，通过这个系统，意共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表把其他社会阶层——手艺人、小商人和小业主、农民、用谷物交租的佃农和无地的劳动者以及新老中产阶级——接纳和附属到自己的组织中来。这样，工人阶级就可以作为这个联合集团的中心，来组

成一个新的“历史的集团”。由此可见，所谓的意共的社会联盟战略，要比单纯的一系列策略行动意义深远。意共之所以向城市中间阶层呼吁，是出于它的反垄断战略。可以看到，意大利的人数众多的小店主——以西方的标准来看人数多得异乎寻常，同时这件事本身表现了大部分经济的落后性——正在受到工业和销售商业中不断发展的垄断资本的排挤。党提出要发展合作社作为一种长期的解决办法，但是在近期内，它却通过各级立法委员会和在其他地方保护了小店主的利益。意共也进行游说，争取小制造商的支持，表明它是他们反对垄断资本的斗争中的天然同盟者。党希望只要有可能到处都争取别人的支持，但这种愿望使它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一些令人不快的事实。实际上许多小工厂都在组织上同大公司有联系，后者把工作转包给小型企业，那里的工资较低，原因是劳工组织的力量不强，雇主的社会保险税金——在意大利比英国大得多——没有全部缴付以及从南方来的移民更易受到剥削。

意共的联盟战略在大部分地区只取得微小的进展，但在“红色地带”却实现了它要成为“阶级之间的”政党的目标。由于党在广泛的组织方面和社会方面的地位，它已取得了中等阶级人士坚实的支持。人们常常以为，党最大的力量在富裕的西北地区（皮埃蒙特、利古里亚和伦巴第）的发达工业城市里。而事实上，意共成为这些地区的最大政党，只是在1975年和1976年的地区和全国选举中。它的坚强核心是意大利中部的“红色地带”，这个地区虽比南方发达和富裕，却仍然是一个小型工业和农业的地区。事实上，在“红色地带”，已出现一种明显的意识倾向，“走艾米利亚道路”（波洛尼亚，意共的坚强据点和模范城市，是艾米利亚—罗

马涅大区的首府)。地方党的领导人——他们在全国性的领导工作中也行使相当大的权力——是社会联盟战略的热情支持者，并且在制订有利于保护小企业、店主和农民的利益起着政策——其中包括大方地提供贷款和在税收上让步——重要作用。这意味着某种重要的发展：意共在取得它的战略的核心成分即中等阶级集团的支持方面的成功，已经（至少在“红色地带”）影响了党的社会性质和政治性质，从而引起它的全面战略的进一步修改。这显示了，党的领导和高级干部在“红色地带”一直是实行“历史性妥协”的推动力。

经济危机与“历史性妥协”

意大利经济的严重恶化带来了一种局面，意共领袖断言，只有在各界广泛同意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换回这种局面。意共的外交事务主要发言人塞尔焦·塞格雷这样解释意共的路线，“在当前的严重危机时期，只有把各界的努力聚集在一起，才能产生为实行一切必要的短期、中期和长期的改革（以及承受一切必要的牺牲）所要求的高度政治决心和民众一致，把意大利建成一个真正现代化的，可以在其中生活的国家”。共产党人声称，工人阶级和从事生产的，中等阶级在反对官僚政治和国家垄断公司（例如工业复兴公司，国家石油公司等）的寄生性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这些公司成为天主教民主党的和与它同盟的政治家的安身立命之所。它们构成了精心创造的受保护人制度的一部分，这个制度既使天主教民主党和一些非宗教性的政党（社会民主党、自由党以及在某种程度上还有社会党）的政客拥有委任官吏的巨大权力，又使意大利经济和行政机构的每个毛孔全部堵塞。正如一位共产党领导所评述的，国营部门的管理“方式腐败

是为私人集团谋取利益，并且不受议会控制。这里的主要敌人不是资本的那些有生气的部门，而是投机、腐败和寄生”。意共的领袖们认为，为消除后者而斗争，将是工人阶级和“资本的那些有生气的部门”的共同目的。

渐进主义的胜利

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后，社会主义运动分裂成尖锐对立的两个阵营：共产党阵营和社会民主党阵营。他们在两个互相有联系的问题上激烈争执：是不是要通过议会道路走向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应当通过对社会进行突然的革命改造，还是通过逐渐实行一系列改革来达到。

在这两个问题上，意共现在都坚定地采取第一次大战后社会民主党的立场。它坚决摒弃了布尔什维克的模式。贝林格在1975年10月给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中强调指出：“在当前西欧无产阶级政治斗争中以伟大的俄国1917年革命或甚至1905年革命的战略和策略作为指导路线，是完全不现实的”。然而，意共的优先选择议会道路并不是它的政治态度的一个新的特征。在这之前，它就帮助制订过战后年代的意大利宪法，并且是它最坚定的拥护者。只有那些最顽固的反对共产党的人，才会怀疑共产党人对现有意大利代议机构的依附和对宪法法规与程序的忠诚。更加引起人们兴趣的是，意共无条件地提倡渐进的社会主义。一位老资格的共产党领袖在这方面一直是很直率的。意共经济事务发言人焦尔焦·纳波利塔诺评论说，“我们的概念和传统的社会民主党的理论与实践的主要区别，不是我们是否接受渐进主义的概念”。而是在于党“向社会主义前进和建设社会主义中的高瞻远瞩的气概”，以及它赞成在各级扩大群众参加管理工作的权限，用

这样的方法来改变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力量平衡。

然而，纳波利塔诺混淆了卡尔·考茨基等明确表达的1914年以前的“古典的”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无论从意图和效果来看都不再追求根本重建社会的当代社会民主主义的区别。人们几乎不会怀疑——如果这种历史对比是有意义的话——意共领袖会觉得考茨基的观点远比列宁的观点适合他们的口味。人们甚至可以更追溯上去。爱德华·伯恩斯坦，第一个“修正主义者”，也完全可以被称为意共当前向社会主义演变过渡的理论的先驱。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古典的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固然认为可以通过选举方法取得政权。然而，它也假定，当社会主义政党积聚力量时，资产阶级的反抗也会加强，而社会的和政治的对抗会变得越加尖锐。与此相反，“历史性妥协”的战略却摒弃了那种向社会主义过渡时和资本主义社会决裂的观念。而且，它含蓄地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是社会变革的主要推动力的基本原理。换句话说，“历史性妥协”暗示历史转变是渐进的观念和共同一致的政治道路。

在六十年代，意共精心制订了一个“结构改革”战略，这就是把一系列经济、社会和行政方面的激烈改革联成一个相互关联的纲领，以实现对社会进行“质”的改造的道路。在七十年代中困难在于怎样使这样的战略符合和天主教民主党合作的政策。为了使这两者协调一致，共产党的立场在两方面发生了转变。第一，它的改革纲领越来越显出渐进的性质而不是结构的性质。现在党所谈的是社会的“质”的“改变”和引入“社会主义成分”——这些都使人联想起古典的费边主义。第二，为了给这样的政治立场提供意识上的根据，意共现在对社会变革过程采取相当机会主义的观点。按照党的一

位元老阿门多拉的说法，“我们提出改革的建议，不是作为在意识形态方面作出重要选择的结果，而是迫不得已作出的选择：为了避免破产”。人们几乎会说，意共已经重新找到了“潜在的帮手”或“出谋划策的人”。天主教民主党人和资本家将不得已而成为社会主义的代理人。经济上的需要将迫使他们接受国家扩大其介入的范围和默认在经济上采纳更多的国家计划和走社会主义的方向。阿门多拉又说，“我必须强调指出，每前进一步都必须适应需要，以弥补统治阶级执行职能时的失败。因为这时甚至敌视社会主义的人们也不得不承认现实”。这样，调整经济以适应条件变化的需要将迫使统治阶级接受共产党的改革建议。

这种改革社会的概念完全符合意共对于广泛支持政治的赞助态度。它在1976年的竞选政纲中指出，“正在出现一种在意大利从未有过而在其它国家也几乎没有过的事：各种力量在不抛弃各自意识观念的情况下……为了实现在共同的利益基础上实现同一的政治和社会目标而开始进行合作的可能性。”这样的观点可以同党公开宣布的目标协调一致，这个目标就是，只有假定政权的转移是缓慢的和不起尖锐斗争和各种力量两极分化的情况下，才能保证工人阶级得到政治霸权。党坚决主张，实现这样一种事业的必要条件是工人阶级取得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霸权。事实证明，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价值以及马克思主义范畴的思想确实已深入意大利社会有觉悟的见证人心中，达到更高程度，使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意大利文化生活许多领域中占有统治的地位。

人们认为，要取得文化霸权，才能进行一种有利于工人阶级及其政治代表（即意共）的渐进的权力再分配。换句话说，冲突只应在思想观念的范围内进行，而在政治舞台上占

统治地位的则是妥协与和解。但是，人们觉得这条道路之所以受到党的领袖的偏爱，既是由于在理智上对此确信不疑，同时至少在同样程度上也是出于先天的谨慎甚至是悲观主义。深深扎根于老资格共产党人思想中的思想，是对于左翼政府抵御国内外压力的能力缺乏信心。因此意共并不考虑由工人阶级取代资产阶级而成为社会和政治的统治力量。相反的，意共领袖非常满足于工人阶级（指他们的自己工会，以及也许还有社会党和其他同盟者）在越来越广泛的问题上，对决定政策施加影响的能力逐渐增长。正如纳波利塔诺所阐明的，“在统治阶级中进行改革的问题现在已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至少和首先在承认工人阶级在政府中的适当位置这一意义上来说是这样的。”（着重点是作者加的）

天主教民主党与“历史妥协”

意大利的政治具有它自己神秘的逻辑。最近意共把天主教民主党决定接受意共在议会中的支持宣布为自己的巨大胜利。这说明“历史性妥协”似乎是错误而实际上是正确的。事实是，一个政党的主要政纲的能否实现，取决于它的主要对手是否愿意承认这个政纲。天主教民主党的领袖很可能是准备把意共也拖进去，让它对政府的决议分担责任。但是它是否会承认与共产党人分享政权的方式，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事实上，很难设想天主教民主党会让共产党在政府中分享一份位置。意共改革运动的全部矛头所向，是要根除在意大利官僚政治和国家垄断企业中（例如，工业复兴公司等流行的浪费腐败，任人唯亲以及财政方面变化百出的营私舞弊等现象。然而天主教民主党政权的主要支柱是它有能力慷慨解

囊、支付巨款来兴办事业。共产党领袖用天主教民主党具有二重性这一点来证明自己的立场是正确的。用贝林格的话来说，天主教民主党“是一个与既得利益的大经济中心的利益、与寄生集团的利益连结在一起的政党。但是，它也是一个这样的政党，由于它的起源、它的某些传统、它在党内以及在广大中产阶级、农民、妇女和工人选民中的影响，它也必须考虑到民众的要求和愿望。”共产党的目标是削弱前者而加强后者，劝说天主教民主党人纯洁自己的队伍，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大多数客观的观察家却对天主教民主党及其自我改造能力不那么抱乐观的态度。事实上，在意共决心消灭寄生状态和受保护人制度这件事受到像菲亚特汽车厂的阿涅利等这样的工业家的欢迎，和它渴望与意大利的这些弊端的主要受益者——和积极维护者——天主教民主党结成联盟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矛盾。向执政党呼吁“医生，治好您自己的病”当然是好的。但不幸的是，此时医生的病却是他的收入的来源。

对于受保护人制度——它被广泛认为是恢复意大利经济的前提——的攻击，十分明显地会打击到天主教民党政权的主要基础。这样，必然遇到天主教民主党的顽强反抗。而且，由于共产党不断强调天主教民主党的民众性质和它的复兴能力，意共正在提高它在民众中下降的威信。作为对共产党影响扩大以及劳工运动和战斗精神日益加强的反应，天主教民主党内右翼反对与意共建立任何形式协议的倾向已经发展起来。意共的进退两难处境就在于，不管它可能力求表现得怎样“有节制”、“可信赖”，它的力量——以及整个劳工运动——的增长很可能把中等阶级吓到不肯妥协的立场上去。因为即使共产党人答应保护他们的经济利益，他们仍一定认为他们的

社会地位、影响以及走向统治地位的渠道会受到削弱和阻塞。

而且，如果意共无论如何仍然忠于葛兰西的争取建立新“霸权”的号召——一套新的价值和观念，一种重新恢复活动的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关于权利和义务的观点——那么，传统的中间阶层可能觉得他们的世界观受到危害，因此更加顽强地坚持这个观点，更加响应统治阶级关于聚集在“家庭”、“教堂”和“财产”周围的号召。社会集团从来没有像它们面对那一些社会阶层兴起时那样十分警惕，这些阶层似乎要攻击它们的物质利益和是非观念（它们指望梵蒂冈用号召在来世对此事作公平处理的办法来唤起这种警惕）。所有这些，一定会使人怀疑，意共不断在某些公开立场上作出让步、来平息传统的中间阶层和天主教民主党的不满，从而抑制它的天然拥护者的热情，这种做法是否正确。

1976年选举结果的初步分析表明，共产党人在两个集团——新选民和天主教徒工人——中取得最大的成绩。天主教民主党人靠了从一些非宗教性的中间和右翼政党——社会民主党、自由党和新法西斯党（“意大利社会运动组织”）——的选民中（主要是下层中产阶级）得到支持而保持了他们的那一部分选票，所以会如此，全是因为他们把天主教看做是抵制共产主义传播的最牢固的障碍。因此天主教民主党选民的社会成份就比过去更加保守。在一个具有明显离心倾向的、充满派系斗争的政党内，反共已起着保持党的内聚力的作用。总之，既要默认“历史性妥协”，就必然会把天主教民主党的反共姿态权且置之不顾（至少在民众心目中是如此），并很可能使党在选举中遭受严重损失。这些因素无疑会加强那些反对和共产党人和解的天主教民主党人的力量。

〔译自《政治季刊》1978年第4期。蒋恩慈译，许步曾校〕

七十年代的意大利共产主义

卡尔·博格斯

意大利共产党最近的选举胜利，突出地显示了它作为一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最大的和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声望，同时使它开始进入国家权力机关。这一事实也给予大部分美国左派以新的启发与鼓舞。从我们自己的有利地位来看，在群众革命运动仍然只是一种遥远的幻想的地方，意共显示出它乃是政治现实主义和政治成就的一个奇迹：它具有紧密结合的组织与高超的效率，它具有战略方针、拥有真正来自群众的党员和具有选举的基础。而最重要的是，它拥有制度上的权力。意共获得的很大进展，连同葡萄牙和西班牙发生的剧变，以及法国共产党—社会党联盟明年可能执政的预兆，使得人们对源出于南欧资本主义特殊矛盾的“欧洲共产主义”的兴起，产生了信心。意共总书记恩里科·贝林格及其西班牙、法国和南斯拉夫共产党的伙伴，已作为许多人称之为社会主义改造的一种创新模式——其目的是克服列宁主义先锋队学说与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两者的战略缺点——的主要设计师崭露头角。

作为它日益强调选举政治在推动进步斗争的作用方面的一部分，《社会主义革命》杂志带头努力争取以同情的态度

重新探讨意大利共产主义。去年，《社会主义革命》刊登了三篇热情洋溢的关于意共的文章，其中最支持意共而不加批评的是马克思·戈登的杰作《意大利共产党人的理论观点》。虽然这些文章并未忽视意共战略的某些问题和弱点，并强调不可把它作为一种“模式”往别处机械地套用，但它们的总的主题思想是一清二楚的：意共实质上正在向右转。它们赞扬意共背离正统的列宁主义和苏联的霸权主义，赞扬意共在理论上和战略上胜过欧洲各国的社会党，赞扬意共融合“民主的”目标和“社会主义的”目标的能力，赞扬意共根据目前的社会现实，而不是根据过时的口号或不可能实现的目标来确立政治实践的实用主义与灵活性。

这些文章的结论是，意共和其它共产党所发展的结构改良主义战略，不管它有那些含糊性和局限性，总比任何现有的别种战略更为可取，应给予新的注意。因此《社会主义革命》上的文章，以太抽象和与历史无关作为理由，拒绝接受美国左派——不管是新左派还是美共本身——内部。赶时髦的、往往是过分简单化的对意共的批评，就不足为奇了。

诚然，把意共随便称为“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或“改良主义者”，只不过是含糊的说教性攻击取代了根据对意大利（和欧洲）历史的了解而作出的理论与政治分析。这并不是说，这些谴责会过于绝对地或过早地把意共一笔勾销，而是说它们所依据的是一种最终会到处碰壁的过分简单化的假设，认为不是党的领导背叛群众把他们引入歧途，就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进行革命的真正可能性被排除了。在推翻这些假设方面，《社会主义革命》提高了论述水平，并促使大家对许多人认为已解决的问题重新展开辩论。此外，《社会主义革命》还帮助打破这一旧框框，

即，把西欧各国共产党看作只不过是一个僵化的官僚主义整体。认为它毫无希望地死抱着过去，只关心追求狭隘的政权利益而遏制人民群众运动的每一次高潮。事实上，意共近年来已经历了深刻的新生——一部分是由于它对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人民群众运动的适应性响应——而在这一过程中，它抛弃了许多旧教条和旧义务（例如，按照“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而承担的义务）。更有甚者，党的领导明确坚持个人自由、公民权利和多党制民主的原则认为这是构成社会主义改造的目标所必要的；它赞成党的组织作为一个整体，其内部应有坦率的思想分歧和思想交流；它确立了一种植根于意大利人民的传统、文化和制度的政纲；它是支持社会进步、经济效率和政府廉洁的强大力量。

但是仍有一些重要问题，《社会主义革命》上的文章或者没有提出，或者并未充分正视。最近的贝林格主义的战略，在超出三十年代的有限防御性对抗主义方面，即专心一意保存资产阶级结构以对抗法西斯主义挑战而忽略其原来的社会主义目标方面，真正前进了多少？假定意共根据本身条件而提出结构改良主义是有效的，那么，它在促进广泛的反资本主义斗争方面可能达到什么程度？或者，从比较全面的历史观点来看，“意大利道路”能否理解为传统的社会主义，披上了新外衣它决心循着北欧“福利国家的路线来改革意大利资本主义并使之合理化？”“历史性妥协”，如果执行的话，究竟是有助于遏制还是揭露意大利的日益充满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

当 代 的 意 共

在回到社会民主化这一主题之前，我们需要更仔细地考虑一下当代的意共，6月选举的最重要的成果是，它在思想上和制度上都加强了意共在全国的地位。天民党统治意大利政局的漫长年代已告结束，过去十年的中、左两派联合的解决办法不再能起作用。同预料的一样，在右面意共削弱了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基础，在左面，意共轻而易举地遏制了无产阶级民主派的挑战，以这一方式来加强工人阶级对它的支持（目前，约构成它的选举基础的55%）。此外，意共在意大利的每一地区都干得很出色——特别在南方，它的选票从23.8%上升到31.5%，使它第一次接近于天民党的票数。

由于得到了地理上和社会上各不相同的大约一千三百万选民的支持，意共可能即将取代具有最稳固的意大利文化基础的全国性政党——天民党。意共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迅速的非宗教化，这种非宗教化正在暗中破坏作为天民党正统性主要源泉的传统主义。所呈现的“国家、人民”这一特点由于这一代人广泛地向左转而增强，而这种转向受到了“青年的选票”和妇女中增长的左派感情的催化。结果，正如天民党在1974年就离婚问题举行公民投票时遭受惨败所反映的，它操纵旧的文化象征——教会、家庭、反共——的企图变得越来越枉费心机了。

意共在选举中的获胜和在国家政治中的权力影响，可理解为它在地方政府（自四十年代后期以来，那里已实行有限形式的历史性妥协）中已经占有的地位扩展了。通过与社会党，有时与天民党的联盟，意共已在数以千计的县、几乎全国一半省份，以及除巴勒莫以外的每个主要城市中，执行行政管理。在那里，它精干地适应了作为联盟、保护人和利益集团政治工具，人们对它的要求。虽然地方政权并没有

向意共提供充分的财源来制定党纲所设想的社会改革，但是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牢固地位使它能建立其选举力量，并使其组织机构保持原样。“意大利道路”的生命力在这一基层（那里对这一战略的号召力作了非常成功的宣传）经受了最严峻的考验。结果是相当有利于使意共的进展持续下去。也正是在地方政治中，意共的选举动力和使组织恢复活力的能力最为显著。

因此，在耐心地建立其群众基础，发展行政专长和磨炼其政治战术三十年之后，意共做好进入政治真空的一切准备。也许这不过是时间问题。目前的僵局，即，不论是天民党还是意共都不能动员到执政联盟中的多数来支持自己，毫无疑问这只是天民党的衰落和意共的兴起之间的一个政权空白期。

如果存在这些长时期后能够成功的前景，那就必须提出这一核心问题：我们能指望意共在意大利实行那一类改革？帕尔米罗·陶里亚蒂于1944——1947年间首创的“意大利道路”的整个战略，在这里是自然的起点。陶里亚蒂抛弃了二十年代的先锋队主义，三十年代的人民阵线战术和抵抗运动中产生的“极左派观点”，使意共采取一种“新方针”，这种新方针强调若干相互关联的原则：（1）专心一意使现有的国家机器“民主化”，而不是建立工人阶级的组织和人民群众组织来代替它，其根据是设想国家是中性的，既可利用它达到资本主义的目的，也可利用它达到社会主义的目的；（2）强调选举议会政治，而不强调采用群众动员的方式来代替它；（3）集中攻击“右派”和“反动分子”，这是长期从事反法西斯斗争的产物，但这样做往往导致贬低对资本主义统治本身的攻击的重要性；（4）建立一种结成广泛联盟的战略，

但它与传统的“联合阵线”方法或葛兰西的“革命的历史集团”的概念完全不同。这一战略主张把所有的“反垄断”力量（工人、农民、天主教徒，小资产阶级，中间阶层）结成一个广泛的选举集团；和（5）愿意考虑同对抗的资产阶级政党结成暂时的、甚至是长期的执政联盟。

意共在整个战后年代，始终如一地贯彻陶里亚蒂的结构改良主义的主张。因此，它对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持续的和无条件的卫护，不仅仅是战术上的权宜之计，更不是某种

“适应”统治机构的方式；事实上，人们已可合理地预测到意共的战略和实践之间的关系。意共毕竟是支持从法西斯主义的垮台中建立资产阶级民主的一股必不可少的力量。党的战略的这一连续性，与人们通常认为意共在战后年代的某一特定时刻同列宁主义突然决裂的想法，恰恰是相反的（不管所采用的决裂方式是1956年的非斯大林化和“多中心主义”所引起的最初混乱，是1964年的陶里亚蒂的雅尔塔备忘录，还是1975年的法共一意共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联合声明。这些公开的表态，只不过是1944年“萨莱诺转机”以来，事实上已经是政治和战略的现实，进行赞扬并使之合法化而已。

历史 性 妥 协

那么，可能是创新的历史性妥协的概念，如何适合这一图式呢？一方面，可以把它看作是“意大利道路”的合乎逻辑的扩展，即把传统的意共战略应用于目前日益加深的意大利社会危机。另一方面，可以把它看作是陶里亚蒂一直到他1964年去世为止，始终信奉的社会主义改造幻想的缩小规模或所用手段。其动力来自两方面：危机本身，它向意共提供进入政府

的新的机会：阿连德在智利被推翻的“教训”，它向贝林格主义的领导人指出在工人阶级之外、特别在白领阶层、军队和政府雇员各中间阶层之间得到人民支持的必要性。按照“妥协”的思想，由左派多数统治意大利的时机尚未到来；反对资本主义的势力仍然太分散，尽管与大多数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况相比其群众基础较为广泛，但仍然太狭隘了，不能推动有效的改革。唯一有现实意义的解决办法就是所有“民主的”反法西斯力量的“全国团结”联盟——在实践中指的是意共、天民党和社会党——这样就能使左派在国家政治中占有决定性的地位，而为将来的意共统治打好基础。

“妥协”的实际的纲领性的保证，是意共1976年竞选运动的基石，看来这些保证与其说是忠实于党的早期战略，不如说是脱离了社会主义的目标。国家和政府部门的民主化仍然在坚持推行，不过现在可把这一措施理解为一项不那么雄心勃勃的方法，它会打破天民党的庞大庇护网，而用专业化的行政机构取而代之，以铲除战后天民党统治的通病——浪费、腐败、无能等现象。意共理论家对政治居首位的提法作了新的解释，主张政府领域的“制度”危机必须在面临经济危机之前解决，否则，影响非常深远的政策和立法将被堵塞、改向或只能部分执行。作为民主化总的目标的一部分，意共竭力主张应使仍然是意大利最贫困和工业化最不发达的地区即南方和各岛“现代化”。这意味着采用特殊的纲领来调节北方和南方之间的不平衡与改进意大利比较落后的农业技术。意共还提出工业合理化的计划，通过更大地发展科学技术，制订国民经济计划，“改组”和精简管理部门，并消灭同北欧相比尤其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挥霍无能的依靠投资为生的寄生分子。这一纲领还包含能强制工人阶级的重要部门

接受纪律约束的高度制度化的、经济主义的工会运动。

一旦意共参加中央政府，它还会采取行动来加强代议制和地方政治机构（如议会，大区、省和市的行政机关），以反对仍然体现法西斯主义残余的中央官僚政治。意共的“地方分权”计划意味着把权力转移到其本身权力地位最强的那些管辖范围，这并不是巧合。最后，历史性妥协要求广泛的福利计划，税收改革与通过国家立法重新分配收入。意共强调迫切需要充分的住房、教育、养老金和健康保护，这都是那些中左派联合政府曾经许诺但未能满足的那些需要。但是，这些承诺并不排斥意共在政府显然是为了控制通货膨胀而使工人阶级接受“紧缩措施”时予以合作。

意共创立它的“妥协”战略是作为一种救助手段而不是更新手段，是作为使意大利摆脱危机的一种计划。不管这一重建的“意大利道路”的内容如何（因为它是战后基本战略的扩展，而不是战术退却），其风格显然是妥协和节制的，而不是斗争和对抗的；确实，人们不可能识别在“妥协”这一框框内部有什么能起改造作用的动力。这里没有对资产阶级领导权进行思想上或文化上的攻击，没有进行社会改造的努力。人们只发现缓和，或焦尔焦·纳波利塔诺称为“批判性的警惕与建设性的约束”。意共领导不愿危害它的选举地位和行政地位，本能地倾向于与它先前认为是敌对的力量如教会、垄断资本、共同市场、北约组织等进行妥协。帝国主义、阶级斗争、工人管理、革命本身等主题在这一概念中并无地位。专用于社会主义改造、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等方法的语言已是意共战略的一种灾祸；对革命目标的这种约束就非常突出地把这个党同它早期的传统区别开了。也许“欧洲共产主义”的真正含义就在于此。

意共和社会民主化

如果说，意共的政治地位表明了贝林格在玩弄现实政治中的天才，那么，它也提出关于创新的“意大利道路”的未来方针这样一些较大的问题。当然，如果意共获得政治领导权，它就会在意大利建立一个新的政权制度和一套新的优先权制度。不过，针对《社会主义革命》上的文章的主要论点，笔者要指出的是，从长远观点来看，意共将起社会民主化机构的作用，它有助于改革一个半发达、不稳定的制度，使之走向比较合理的、多党政治的、着重社会消费的国家资本主义。

所谓“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除了把它具体化，成为实际的、有效的政治战略和纲领外，不会有什么意义。在生产危机和合法化危机不断增加的时期中，意共采用这一战略的目的，显然是想使充满传统残余的落后的资本主义现代化。作为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意共终究是能在新的基础上——与北欧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的那种基础相似（但也许仍是较不发达）——重新组成意大利资本主义的唯一力量。这超出了传统的对抗主义政治，但与葛兰西、甚至陶里亚蒂明确表达的能起改造作用的幻想还差得很远。使意共比瑞典的社会民主主义更为“进步的”地方并不是它的比较先进的目标或纲领，而是因为意大利资本主义比较不发达，加上教会、传统主义、法西斯时期和“南方问题”继续存在。

象戈登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社论那样，认为意共根本不同于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这是毫无根据的。象所有的共产党一样，意共仍有列宁主义的某些残余——例如，在它的

严密而有高度纪律性的党组织中——从这方面来说，它确实与社会民主主义不同，但如与它在更重要的战略和纲领方面同社会民主主义的相似之处比较，这些不同则是表面的。

“意大利道路”，特别是它目前的形式，同指导第二国际各个政党的战略一样，都不再是牢固地建立在“科学”原则和群众斗争（象戈登所说那样）的基础上。除了国与国之间的某些不同外，意共和社会民主主义两者有相同的主要政治观点和政治保证，相同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概念，如：强调“多阶级”选举联盟是“民主化”和体制改革的基础；力图使农业、工业和国家官僚政治合理化与“现代化”；愿意使劳工遵守纪律，作为进行社会改革和经济改革的代价；放弃发动人民和放弃暴动战术，变而为对资本主义政权机构采取温和、和解的态度；贬低反对帝国主义和进行社会改造等主题的重要性。从已经达到它原来目标的很大部分这一意义来说，当代的社会民主主义与这一模式不相一致的只是这一点，即，它更成熟了。

如果这方面的论点是正确的，如果“妥协”获得成功，意共很可能会演变成为在意大利完成资产阶级发展任务的一个政治机构。作为社会民主化的一种变形，它可能制定一个清除危机并可能打破资本主义秩序的“激进的”解决方案——“反动的”解决方案是萨米尔·阿明的“1984年”概念所设想的强行建立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独裁国家。两条道路都不能克服资本主义的根本性紧张和不稳定，而只不过把矛盾转移到政治领域与文化领域而已。意共所能促进的（不管多么无力）就是在多党制和社会福利主义的范围内，实现以大工业国有化、程度更高的生产性经济、工人阶级的政治一体化、以及阶级斗争体制化（采用维持社会稳定、劳动纪律和

合法化的契约谈判手段等方式)等为基础的国家资本主义。因此,政府领域在生产和合法化方面起统治作用,接管走下坡路的资产阶级的职责,而不是完全取代它,同时国家显示出是政治—行政首创性的主要来源。

这种国家主义是社会民主化的天然产物,其目的是,就在它扫除传统障碍使制度“现代化”的时候,使旧的官僚政治等级制度和社会分工永存。“意大利道路”包括它认为国家是“中性”的概念和它的制度的中心,是与这种发展方式完全适应的。正象《社会主义革命》社论提出的问题一样,这不是资本家“老板”召集意共来营救一艘下沉的船只的问题,而是根据几十年的经济和政治对抗产生的一种结构改造的方法。

对较大的政治制度来说,这可能意味着回到在意大利有长期传统的“变化主义”——敌对力量的杰出联合,它起着遏制社会冲突的作用。如果这样的话,1976年夏季就标志着战后意大利政治的一个关键性转折点,它发出结束两极分化的两党主义和不变主义的信号。今天,当意共向右转时,天民党和资产阶级的重要派系(“现代化”改良主义派)正在逐渐向左转。它们的影响随着传统主义和天主教领导权的衰落而增大。贝林格主义领导意识到这种转变,敏锐地根据这种情况进行其“妥协”设计。

与美国的宣传工具所宣扬的看法相反,意共和天民党领导正在汇合而不是两极分化,而且在很多机构方面和政策方面会谈的架子已经搭成。有利于这一新生的变化主义的主要趋势,就是意共朝合法化的方向加速发展;除了教会统治集团(而其态度近年来也缓和了)以外,既得利益集团越来越不把意共看作是一种颠覆的威胁。饶有兴趣的是,经济危机引

起的不是更多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激进派变得温和（法西斯政党和无产阶级民主派在选举中的惨败也显示出了这一点），以及环绕更合理化的和着重社会福利的资本主义这一目标的各种利益的汇合获得发展。因此，新的变化主义采取为全面社会民主化开辟道路的方式来加强目前的意共战略。其成功与否无疑将取决于天民党内部的改良主义派和群众力量的态度明朗化，或许甚至于脱离天民党，且不说意共领导有否能力保持其组织严密性和使群众始终贯彻今后还会遇到困难的妥协协议了。

在这些条件下，意共获得成功的一个结果可能就是缩小意大利的政治斗争和政治辩论——至少短期内是如此。按照“意大利道路”，选举议会的斗争和工会的斗争构成这一神圣的政治舞台。虽然意共在这一舞台上获得了显著的成就，但其战略的逻辑却是抑制广泛的社会改造、男女平等和工人管理等目标。而即使意共主要由于拥有秘密抵抗组织的传统而在过去比意大利其它政党有更广泛的基层组织，今天它却几乎只是在自由民主主义的制度和规范内起作用；因此，它所提出的代议制民主概念，虽然比较进步，但仍然具有很大局限和形式主义的。党领导对“自发性”和对已建组织以外的任何形式的政治活动都抱不可调和的敌对态度，它宁愿通过竞选运动和以庇护人身份来“动员”群众。近年来，它故意攻击工人管理和直接民主的思想。从社会民主化加速实现这一过程这个意义来讲，它的总的影晌是矛盾的。一方面扩大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潜力和生产潜力，另一方面又遏制人民群众的斗争并使之体制化。这已经是瑞典的模式了。

《社会主义革命》上的文章忽视这一问题，不时地似乎把

“民主”与它假想在目前意大利政治制度中表现的体制相混淆了。“民主化”可理解为现有的机构的更新——使它们更开放和反应更快，少腐败一点，更有效一点。戈登确实提出，意共事实上鼓励人们从事某些议会之外的活动，包括群众游行和在某些地区发展地方委员会；但在实际行动上这些努力确是相当无力，而且往往毫无意义。关于游行，它们主要只用于竞选运动，它们的性质是由党领导严格规定的，简直难以区别意共与那些主张在竞选运动中举行集会和游行的所有其它政党有何不同。

在某些市区确实存在着邻里委员会和工厂委员会，但戈登歪曲了它们的政治作用。1968—1972年间，虽然遭到意共敌视仍然蓬勃发展起来的这些委员会和“基层委员会”，近年来却丧失了它们的自主权，不是被工会和市政机构合并而解散，就是完全消失了。只是在这些情况下，当这些地方性的组织或多或少不起作用以后，意共才决定支持它们；它们决不是自治机构。举例来说，在波洛尼亚，这类委员会主要起行政区或地区组织的作用，它们由党指派的委员组成，他们执行一般日常工作和咨询工作，并帮助党的行政统治集团与基层保持接触。总之，这些委员会对意共的政纲或公开政策的影响不大。

《社会主义革命》关于意共的文章的主要前提是，社会主义改造只可采用两种可供选择的战略之一——经典的列宁主义或结构改良主义——来实现，而前一种方法（涉及“粉碎”资产阶级国家而以“无产阶级专政”取代）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是既陈旧过时又不合乎需要。因此，意共抛弃它的先锋队学说的宗派主义而采用更开放和重实效的选举主义，就受到《社会主义革命》的热情欢迎，可是意共之

与旧的教条和幻想决裂（事实上意共远在考虑推行“历史性妥协”之前就做到了这一点），只不过是向另一方面——第二国际方面——的教条和幻想开门。“意大利道路”仍然同它的政治直接性，和它的“社会主义”幻想保持着联系，而这种幻想只不过是很久以前就已消失的革命传统的残余。实际上，《社会主义革命》上的文章留给我们的印象是，社会民主主义是唯一具有现实意义的、可能实现的目标。

所有这些并不是要否定意共在意大利政治中的进步作用，或否定意共进行重大改革的潜力。要是意共获得政治领导权，它的纲领将比破产的天民党的纲领大大改进，无疑将有益于意大利的劳动群众。意共一定会努力争取更多就业机会，建造更多的医院和学校，发给更高的工资和退休金，制订更好的住房和城市发展规划。对于这一切，笔者并不想贬低其重要性。笔者的观点是，这些目标都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任务，可以在资本主义范围内谋求达到——象它们已在北欧实现了的那样——而不必推翻已经建立的统治方式或社会分工方式。

〔译自《社会主义革命》第34期，1977年7月—8月。〕

沈锦昶译，许步曾校〕

法国共产党：介于斯大林主义 和欧洲共产主义之间

维克托·莱达克

欧洲共产主义这个名词在1975年底进入了政治词汇。在1976年6月的欧洲共产党会议上，意大利共产党的代表阐明：“它是指一种愿望，企图看到西欧国家探索和发现一些新的办法来进行社会改革以走向社会主义。”不久认识到，有一个亚洲的共产党，即日本共产党，与那些被称为“欧洲共产主义者”的西欧共产党抱有共同的政治观点，于是，欧洲共产主义这个名词就不适合了。同样，欧洲共产主义这个名词也不能用来指东欧的共产党，因为可能引起混淆。其实我们不必囿于地理上的考虑，而只要考虑经济和政治的结构。“欧洲共产主义”这个名词适用于那些在发达的、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起作用的共产党。这样，在1976年底，圣地亚哥·卡里略能够把意大利、法国、英国、西班牙、瑞典和日本等国共产党归入欧洲共产主义潮流的范围之中。

原注：作者是《Raison Présent》（当今理智）季刊的编辑，从前曾是民主运动（法共内部的改良派称之为共产主义道路“La Voie Communiste”）的领导人，现在是P.S.U.全国秘书处的成员。

信仰欧洲共产主义的人们叙述，欧洲共产主义乃是双重危机下的产物。一种危机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在以往十年来已经经历并仍在经历的危机；另一种危机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自1956年匈牙利暴动以来，尤其是1962年中苏闹分裂以来的二十多年中，已经经历并仍在经历的危机。在欧洲的一些拉丁民族国家中，经济上的危机关系特别重大，这是因为这个危机是在工人阶级扩大、加强自己的组织和更有能力干预社会事务一个长时期之后发生的。这个危机同第三世界国家在我们体系外围的发展是同时发生的，第三世界国家已经取得独立，在某些情况下，并且具有新的国发达的工业国家讨价还价的力量(石油)，从而助长了通货膨胀的趋向。

南 欧

与南欧，这个危机已经表现在政治方面。在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独裁统治已经通过种种不同的方法被取消了。在意大利，共产党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步和逐步对天主教民主党施加它的“权力统治”的影响。在法国，从1974年以来，左派日益成为主要政治力量，在1978年立法机关的选举中，胜利已经在望。这三个国家的政治情况是不同的，然而也存在着一些类似点。在这些国家中，要提出一个社会主义的解决危机的办法，不是采用传统意义的革命对抗，而是通过取得社会中的多数，实行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改革。最后的一点是，这三个国家中的左派，不论是在意大利占优势的共产党人，或者是在法国和西班牙占优势的社会党人，在对社会从事有可能进行的改革时，都是主要的力量。

欧洲共产主义的支持者之所以坚持说，这场危机是深刻

的和它具有经济和政治的性质，是想要强调他们面临的历史形势目前几次的革命危机相比较，在其独具的特点。他们认为，现在绝大多数人都感觉到有改革社会的愿望，而不再仅仅是工人阶级如此了。由于工人阶级和新的薪水阶级、知识分子之间结成了联盟，以及考虑到关于各国的政治和文化传统，制订一项新的战略是需要的。它在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采取不同的方式，但它肯定地说，不论采取什么方式，走向社会主义都要经过民主途径。正是在这个战略的必要条件中，包含了与其余共产主义世界，与仍然忠实于苏联模式的那些共产党相矛盾的因素。苏联的学说是所有的共产党几十年一直赞同的，它规定革命的规律是普遍适用的。这并不意味着，每一场革命必定要追随十月革命的同一种模式，但是，为了取得政权——不论用什么方法来取得——至少要摧毁资产阶级国家，使工人的政党即共产党上台，取得的政权才能巩固。另外——恐怕这是最重要之点——这个学说认为，任何革命战略首先要履行的职责，是捍卫苏联和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即苏联和它的卫星国）——革命的堡垒。这就以种种方式影响了思想观点和政治观点。

从思想观点来看，捍卫社会主义阵营以反对现实的或潜在的敌人，暗示着非但不批评苏联生活的任何方面，更有甚者，无条件地依附、顺从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在其国内外政策上采取的态度和作出的决定。这是众所周知的共产党领导人对莫斯科“无条件”服从的年代。例如，当时的法国共产党总书记莫里斯·多列士就是乐意地称自己为“法国最好的斯大林主义者”。从政治观点来看，苏联期望这些共产党把它们的目标限于苏联在当时所追求的目标，并根据这个根本的抉择，遵照苏联的一切指示执行。说明这点的最

好例证，是德国与俄国在1939年签署条约后，法国共产党抛弃了它已经参加了几年的、与其他民主国家共同反法西斯的联盟，转而支持一项把盎格鲁撒克逊帝国主义作为主要敌人的一项政策，鼓吹同希特勒德国立即媾和。而当希特勒撕毁条约和攻击苏联的时候，法国共产党又恢复既定的反法西斯、与民主国家结盟的政策。

斯大林主义的遗产

在三个拉丁民族的欧洲国家中，法国共产党是唯一的从它建立以来几乎一直有合法地位的党。意大利共产党的公开活动，由于法西斯主义在1926年的胜利而令人难受地告一结束。十年以后，当佛朗哥政权上台时，西班牙共产党转入地下。法国共产党只有一个比较短暂的时期是非法（在维希政权统治下）。这些不同的历史情况在极大程度上说明了这三个党的进展中的不同节奏。

在象法共这样的一个党内，斯大林主义孕育了几代的战士。这个党，尽管有新的党员，但从领导人一直到普通党员，基本上都是这样一些男女，他们认为苏联是革命的堡垒和社会主义的榜样；这个党，由于它的统一、它的统治集团和它的思想意识未被外部影响所玷污，乃是无产阶级的权威性和革命的有效性的捍卫者。在实际工作中，这个党及其由“终身”党员（职业革命家）和富有战争精神的斗士们组成的坚强核心，经受了一些困难、严峻的考验。这个党常常在全国范围内完全孤立——这或者是由于反对它的人们采取行动的结果，或者是因为它自己采取的政策的结果，而常常是两者联合作用的结果；它又脱离了其他的左派政治力量，脱离了

工人阶级本身的大多数。1927——1934年间，党的规模缩小到只有二万或三万党员，在下院只有十个议员。1939年，法共在赞成德苏缔结条约之后，经受了新的危机，恰好在这之前它被禁止了。在冷战的几年中（1947—1953），党再次孤立和衰落。在戴高乐将军1958年回国时，党再度失势，它的议员人数降到最低。它在1968年5月的巴黎事件之后的立法机关选举中再次被击败。但是，在这几次挫折之间，也有“人民阵线”（1936年）和“解放运动”（1946年）的重振旗鼓，六十年代后期的复原和（与社会党）签订共同纲领的政治成就。整个这段时期，共产党和主要受它影响的法国总工会，把自己牢固地树立在工人阶级中。赞成共产党的选民，在全部选民中稳占百分之二十。

要理解法国共产党在过去十年，特别是过去五年进程中的态度和行动的矛盾性质，我们就必须记住所有这些因素。一方面，从战略上讲，党看来是坚决走上欧洲共产主义的道路。从它同国际共运的关系，特别是同苏联的关系，以及从它对国内的政策来看，都可以证实这一点。对苏联态度转变的最早的标志，出现在1966年。当时，法共的主要报纸《人道报》发表了一篇阿拉贡谴责苏联作家西尼亚夫斯基的批评文章。1968年8月，法共政治局对华沙条约组织侵捷表示“抵制”。采取这一立场，在党内不是没有反响的。在这个当口，已故法共总书记莫里斯·多列士的夫人让内特·维美徐辞去了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职务。从那时以来，法共对苏联审讯持不同政见者，以至对某些外交问题，特别对在法国选举时苏联官员事实上直接支持多数派候选人蓬皮杜和后来的德斯坦，已经加倍怀疑或谴责。法共的一个领导人皮埃尔·朱坎甚至与列昂尼德·普柳奇一起参加了为庆祝苏联著名的持

不同政见者布科夫斯基被解放的一个集会。

1976年6月29日，在柏林举行的欧洲共产党会议上，乔治·马歇清楚地不指名提到莫斯科支持德斯坦的外交政策一事，他说：“我们将不容许以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为名，采取任何行动来威胁我们正在从事的反对资本主义统治、支持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乔治·马歇和跟他相同地位的恩里科·贝林格、圣地亚哥·卡里略一样，重申了各个共产党的平等、独立和主权的原则，不干涉别党内部事务的原则，重申了在争取社会变革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有选择不同途径的自由。和贝林格、卡里略一样，马歇声明，社会主义是与民主和自由不可分割的。这个态度看来好象在法共的想法和苏联的体系之间划了一条清楚的界线，但是，它对整个苏联党的政治观点缺乏深究。在1976年2月4—8日的法共二十二大上，在讲到执政的各个共产党时，马歇说：“它们已经完成了多么伟大的工作！它们已经证明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人剥削人的现象消失了，建立了强大的经济，它在蓬勃发展，没有危机，没有失业，没有急剧的通货膨胀，结果是生活水平很大提高，工人担任重要职务，工作作风民主，普及文化，使整个社会有平等的机会享受——这个伟大的历史进步已经为社会主义的苏联所取得”。

这是法共谈到社会主义发源地时惯用的语言。它适合大多数党员和法共同情者的愿望，他们已经有几十年的时间被灌输着这样的苏联形象。但是，甚至更重要的，这种语言与法共的思想意识相一致，法共的发现，它不可能对苏维埃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表示怀疑。从这一观点出发，在1978年3月竞选运动中，就发生了一件意味深长的事。有一个共产党的宣传机构已经准备了一种以捍卫自由为主题的小册子，书

名叫《Vivre》(《生活》)。在插图中，有一张皮埃尔·朱坎同列昂尼德·普柳奇握手的照片。小册子早已印了几千册，但是法共书记决定毁掉。

这表明了法共对苏联发生的一些问题的立场。人们能够——而且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也必须——反对有人践踏自由，因为这些践踏同志间社会主义的“法国道路”的新观念自相矛盾。但是，人们不能与持不同政见者混在一起，这些人反对苏维埃制度，这些人，例如列昂尼德·普柳奇，不相信苏维埃制度，是社会主义的性质。这就是法共所走的狭隘道路，它害怕，如果对苏联批评太甚而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就会在它的阵营中造成太大的混乱，它也害怕，因此而被迫从根本上改组自己的结构。

战 略

在策略上，法共看来跟欧洲共产主义的观点完全一致。在乔治·马歇在二十二大的讲话中，我们看到了这些基调，这些基调早在一九七五年十一月意共和法共在罗马的联合声明中就已列举过了，即：走向社会主义和创造社会主义社会，应该通过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不断民主化来实现。社会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指生产和交换的主要手段的逐步社会化。中小规模的农民财产，中小规模的工商业企业，在社会主义的创建中将发挥特殊的作用。国家将是不受教会约束的和地方分权的。地区和地方团体将有很大的自主权。多党制；反对党存在和活动的权利；两党制的可能性；以及工会的独立和行动自由，工作中民主作风的发展——所有这些都公认为原则。除此之外，过去通过人民的斗争，特别是

通过比例制的直接普选而得到一切的自由，得到了保障和发展。两个党都设想工人阶级参加政府，同时尊重普选的结果。

乔治·马歇毫不犹豫地抛弃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以证明自己拥护这些原则。直到那时为止，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命题一向是共产党人思考的一个主要题目。可以说，它是检验人们是否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试金石。这就是为什么共产党哲学家路易·阿尔蒂塞尔领导了一个强烈的运动反对乔治·马歇立场的原因。但是，他和那些追随者的努力是徒劳的。二十二大一致批准了总书记的提议。不论怎样，乔治·马歇的报告中有一段重要的话，它说明欧洲共产主义思潮决不是同法共的过去决裂，而只是具体地表现为社会主义的法国变种，不论它的基本原则，还是它的历史形式，都不受到攻击。马歇认为，法国的社会主义将建基于法国现实的一切方面，但他又说，这同社会主义有共同规律的普遍原则这个事实一点也不矛盾。生产手段和交换手段的集体所有制，计划的制订，工人阶级的权力，国家生活各个方面的民主化，受到科学社会主义鼓舞的进步政党主子的影响。——这些都是社会主义的规律。这些规律应用到生活中时，采取了不同的方式。乔治·马歇继续说道：社会主义在苏联、在越南，在匈牙利，在古巴、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在南斯拉夫各有不同的特色。

共同纲领

但是，当法共在1978年3月立法机关选举中经受考验时，欧洲共产主义和传统的共产主义之间的这种妥协，其脆弱性就暴露出来了。签订的共同纲领，和随后与左翼激进派运

动组织的签订协议，以及从1972年至1977年9月左派的采取共同方针，从这些行动中，都能够看到为了适应法国的制度而严格地运用了欧洲共产主义的思想。实际上，要在短时期内，能够通过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民主化而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唯一的可能就是通过一个左翼的多数来接管国民议会。左派的胜利可能意味着逐步地和平地与资本主义制度决裂，在决裂的同时，仍旧尊重普选的结果。

因此，在理论上，法国政局在其内部，具有向欧洲共产主义大大发展以及与其准则相一致的萌芽。看来法共甚至比意共或西共更接近它的目标。法国右翼势力统治政府的局面受到极大的威胁。1976年地方选举和1977年3月城市选举之后，民意测验预测戴高乐派和德斯坦派联合组成的多数派将遭到惨败。但是，民意测验也宣称，并从而证实了以往的民意测验，说社会党人得的选票将大大地高于共产党人得的选票，认为弗朗索瓦·密特朗的党得的选票将达百分之25—28，而共产党至多得百分之20—21。地方、城市和立法机关的选举已经显示了共产党失去了对社会党的领先地位。一切表明，如果事情发生得象预料那样，受益于左派联盟而在竞选中获胜的将是社会党人，而失败的则是共产党人。

在这一点上，法共的战术导致政治观察家们怀疑法共究竟想达到什么目的。法共采取了行动使共同纲领具有现代化的内容，并突然提出一些新的要求，要求实行国有化，征收财富税，保证最低限度工资和防务费用的水平。所有这些都造成一个印象，法共是蓄意同它的社会党同盟者分裂。这个分裂发生在1977年9月。共产党开始猛烈攻击社会党，谴责它“向右转”。这种狂热的行为继续着，共产党人采取了讹诈的方式，扬言说在第二轮选举中，不撤回共产党的候选人。左派

在第一轮选举中成绩不佳之后，于3月13日曾匆匆地达成了
一个协议，但这个协议并没骗得了任何人。3月20日的失败，
看来是左派内部分歧的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在公众的眼光
中，共产党应该对这种分歧负主要的责任。

这样，一个实力雄厚的共产党就错过了参加政府而为走
向欧洲共产主义开辟道路的历史机会。这个党自称正在走向
欧洲共产主义，即使欧洲共产主义还不是这个党的推动力
量。共产党在造成选举失败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使人们明显
地怀疑它对支持选择欧洲共产主义有否诚意。人们也不得不
问，究竟共产党的领导内部是否有一些成员如此强硬，以致
阻止把这种选择以连贯的方式转变为政治行动。由于3月20
日选举的结果而造成的法共党内的分歧，是对它的发展的真
正规模的又一次检验。这场纷乱突出地表现在，一些共产党
知识分子在《世界报》、《晨报》、《新观察家》等这样一些
报纸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里，陈述了他们的情况。让·埃伦斯
坦和路易·阿尔蒂塞尔在《世界报》发表的一些文章，是其
中最有影响的。

共产党历史学家让·埃伦斯坦由于他的《苏联史》一书
和关于“斯大林主义现象”的著作而得到人们的赏识。他已
被看作是共产党的“博士”，尽管他并不是党的正式发言
人，却能够提出一些先进的思想来，检验它们对共产党舆论
的影响。他同党过去的关系，使他特别适合于起这一作用。
众所周知，不同政治局中的某人十分接近。他为《世界报》
写的一些文章，严肃地批评了共产党领导人领导竞选运动的
方式，谴责他们要对9月的分裂乃至最终导致失败负责。埃
伦斯坦认为，共产党犯了一些重大错误，例如，抨击社会
党，把竞选运动建筑在“穷人”的基础上，割断自己同中等

阶级、知识分子以至工人阶级中的大多数人的联系。这个共产党历史学家认为，这是蓄意与二十二大制定的方针决裂，其结果，也与欧洲共产主义决裂。埃伦斯坦甚至更进一步，对于到达共产主义在战略上需要什么条件进行了分析，而这些条件是共产党领导人拒绝予以满足的。在他的意见中，对苏联的批评应该是更加激烈的。单说苏联不是社会主义的榜样，那样是不够的，相反的，应该说苏联完全与此背道而驰。党不应该主张宿命论哲学。它不应该承认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它甚至宁可抛弃“共产主义”的名称。埃伦斯坦强烈地批评法共的竞选，指责它缺乏党的民主，尽管他还没有达到主张党内各派有建立组织之权那样的程度。

面临着党的冲突的加剧（已有一千多名党员为此事签名请愿），法共领导人采取了坚定的方针，他们虽然放弃了开除党员的作法，却发动了一个运动，反对任何承认党内有分歧的建议。工人阶级正在被挑拨来反对知识分子。这些领导人正在使用斯大林主义的传统语言去打击党内的反对派，指责他们受雇于反动派，即受雇于工人阶级的敌人。另外，这些领导人还说他们也受雇于社会党。

多党制度是冲突的核心，法共在与社会党斗争时，显示出它不能接受这样一种局面，如果在这种局面中，它不能发挥支配作用的话。在同党内持不同政见者的斗争中，法共再次显示了，它不能容忍任何人对党的唯一路线有异议。这种政治领导的统一和垄断，正是斯大林式共产主义传统的特征。一旦沿袭了这个传统，法共就很可能错过了充分利用欧洲共产主义所提供的大好机会。

〔本文刊在《政治季刊》1978年4月。〕

唐荣智译，许步曾校

法共和其它西欧党的关系

米歇尔·拉布罗 雅克·鲁尔

1977年3月2日，在马德里机场上，欧洲共产主义在一片欢乐气氛中接受了洗礼。在西班牙共产党恢复合法化三个月之后，西共总书记圣地亚哥·卡里略在他的国家里盛情接待了他的法国和意大利同志，即乔治·马歇和恩里科·贝林格。

二年以后，在第一次举行欧洲选举的一个月中，南欧三党之间的神圣同盟还存在吗？不存在了，或者说几乎不存在了。他们在欧洲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法国共产党是持反对态度的，另外二个党是持赞同态度。意大利和西班牙就左翼联盟问题严厉地批评了法国共产党。法国共产党是三党中主张与苏联保持最微妙关系的一个党。然而，最富有戏剧性的是，当法国人闭关自守和克制自己，甚至在争论中保持沉默的时候，而意大利和西班牙人则对外开放。

5月9日这天，在圣—鲁昂召开的法共23大代表大会上，证实了法国共产党和他的两个邻党之间在这四个问题上存在着原则性的分歧。

为了使6月10日的选举能顺利进行而发动了一场选举运动，而且至少能在这个已经是欧洲共同体成员的法国和意大利人之间对第一个有争执的主要问题：欧洲问题上相互取

得谅解。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彼此是完全对立的。在经过7个月犹豫后，在马赛和都灵召开了两次类似的会议上，并没有消除他们之间的分歧。

今年冬天在隆淮，法国共产党洛林领导了一场反对调整纳计划和否定在布鲁塞尔的欧洲共同体雇员运动。2月7日，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之一，齐奥尔齐·纳波利达儒在布鲁塞尔会晤了这个计划的发起人，法国共产党的黑人领袖埃蒂埃内·达维尼戎。意大利共产党认为，他没有能力对付这场与国家有关的危机，因此，必须就欧洲共同计划进行协商。

2月26日星期一，欧洲议会采纳了由法国社会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意大利共产党提出的达维尼翁计划中的附带措施，法国共产党则投了反对票。

3月30日星期五。《人道报》刊登了一篇马歌指责德国统治的长篇访问记。同天，在意大利共产党第25次代表大会上，贝林格则默认了哈勒姆·施密特的对外政策。对法国人来说，欧洲一体化就等于放弃国家主权。而意大利人则认为，施密特的对外政策是共同体国家取得真正独立的先决条件。并且认为，只有一个统一的欧洲才能与超级大国美国建立新关系。因此，不应该象法国共产党那样，试图限制超国家的主权，而是应该扩大。

相反，法国共产党优先与共同市场中的反对党交换了公报：如微小的英国共产党，极小的西德共产党，卢森堡共产党，直至希腊的巴索克，只有一个社会党反对扩大欧洲共同市场，只有意大利共产党同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增加了接触。意大利共产党的外交事务负责人塞奥吉奥·塞格雷2月19日到达弗朗索瓦·密特朗在巴黎的住处，与社会民主党进行了良好的、令人满意的会晤，同一天，在共产党总部，他

会晤了他的法国对手马克西姆·格雷梅斯，次日，意大利共产党机关报《团结报》以三栏标题刊登了一篇题为“塞格雷与密特朗在巴黎进行了坦率的讨论”，付题为“与格雷梅斯的会晤”，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意大利人和欧洲社会党想在欧洲议会里建立一个共同体，进行工作。由于法国共产党的反对，这一愿望被迫放弃。

马歇的民族主义运动触犯了绝大多数西班牙人。因为法国共产党明确反对他们的国家加入共同市场。在马德里地区的农庄里，有一位叫作西昂普泽洛斯的老党员说：“我们知道沙文先生是法国人，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也是一个共产党人”。西班牙共产党对扩大共同体所作的回答有双重需要，使西班牙人重返西方民主阵营，并使共同市场重新稳步地转向了南方。“西班牙党的第二号人物马尼埃尔·阿斯卡拉特承认，在欧洲一体化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经济利益的矛盾。目前的欧洲是资本主义的欧洲。以后呢？他也不可能妨碍法国共产党在欧洲的地位。那么为什么他要阻止我们加入欧洲共同体呢？”

第二个有分歧的问题：法国共产党提出左翼联盟的行动方式。

在4月19日星期二的科尔多，人群涌入了市政府的内部，共产党新市长朱利·昂吉达接受了省长、大主教代表和中央党的地方领袖的拥抱，在他的左边墙上悬挂着耶稣的受难像，在他的右边墙上悬挂着一个朗哥年轻时的肖像，它表示了民族和解的象征，几乎没有一个反对他的对手。在经过几周的论战以后，昂吉达是西班牙共产党和社会党在经历了好几周的争论之后，在马德里签订市政公约的前夕，就被当选的。而且，这仅仅是一次选举时的协议。西班牙共产党并不同意

《左翼联盟》。更谈不到一个共同纲领了。西共一个领导人说，“这就象征着西班牙人重新分裂，令人回想到过去的国内战争。”同样，现实主义迫使意大利共产党比较喜欢与天主教民主党作历史性的妥协，同样在今天，甚至连反对派也改变了他们的主张。

在他们国家里拒绝实施左翼联盟的政策，不会阻止西班牙和意大利抛弃这种对法共进行谴责的策略。强硬的法国共产党损害了他们想开放自己的国家形象。

罗马和马德里方面已经发表的声明对弗朗索瓦·密特朗的社会党表达的同情激起了忧虑。“马尼埃尔·阿斯卡拉特说：社会党的代表大会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密特朗坚定地捍卫了左翼联盟”。4月8日，罗马的《团结报》在第五栏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密特朗的统一战线得势了，左派的选择是肯定了”。次日，在巴黎，《人道报》在第二栏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社会党的代表大会：仍然倾向右派”。对苏联态度的差别——第三次变动。1977年，在莫斯科庆祝苏联十月革命六十周年的时候表达出来，贝林格的讲话是持批评态度的，卡里略被取消了发言，马歇没有去莫斯科。这件事是有意义的。尤其是说明在三个党的内部生活中，意见有极明显的分歧，并获得不同的结果。

三党党员总数

法 国	意大利	西班牙
已宣布的党员：	已宣布的党员：	已宣布的党员：
700000	1800000	300000
选民：	选民	选民
5787436(20.60%)	12620509(34.4%)	1915000(10.9%)

意大利人精明能干并正视现实。从1956年起，当时意大利共产党的第一号人物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其中还有法国人和西班牙人公开表示否认同赫鲁晓夫的真实关系。从此以后，意大利人与莫斯科的牢固关系出现了一项较自主的政策。虽然保持他们的分歧，贝林格是唯一经常受到勃列日涅夫接见的人。

西班牙人比较粗放。前斯大林主义者卡里略在一本书中批评苏联的制度是“一个官僚主义阶级掌握着一个放肆的政权。”

法国人是缺乏连续性的。他们否定斯大林主义太迟了也太肤浅了。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与苏联发生争论，同样也没有说服法国选民对他们的信任。这由于一时的鲁莽（见布朗科·拉齐奇的文章）。法共第23次代表大会再次表明恢复了正统观念。人们可以在预备文件中读到：“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是完全积极的。”

尤其是在他们的内部生活中，三党的分歧表现得更为明显。

4月21日星期六，在奥尔塔莱萨有四分之一的人在马德里举行了一次群众集会（请你译成集会）——面对着四分之一的群众，共产主义者或非共产主义者——西班牙人删去了支部的一封短文。在这天晚上，争论的重点是市政选举的结果问题。尤其是对巴斯克地区的不好的结果持批评者占多数。一位参加集会的马德里领导人路易斯·拉腊指出：“这象征着我们想在这里发动一场和蔼的、坦率的运动”。

去年，在各分部经过好几个月的激烈争论以后，西班牙共产党代表大会在意见不一致的情况下以968票对284票的表决通过了放弃列宁主义的决议。法共党员学习了乔治·马歇

在电台所作的关于他们的党不再使用无产阶级专政的讲话文件。

罗马，同样在星期六，在西奈西达共产党分部的大厅里召开了一次大会。在靠近电影院摄影棚、在可怕的h.l.m.中的大厅中有工人、有留着“非洲式”长发的青年，有风雅的年轻妇女。对欧洲问题的争论成为会议的主要议事日程。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不理解为什么他们的党是从属于欧洲的。党的领导人之国际问题专家利纳·菲贝比解释了加强欧洲政策的好处。但是，没有获得一致的意见。

意大利党的一些分部同西班牙党的“开放”政策一样，容易使人产生好感，甚至可能使其他组织的政治积极分子参加进去。在代表大会预备阶段，社会党代表出席了3021个共产党分组会议。天主教民主党的代表出席了1194个共产党分组的会议，一位共产党领导人指出：“这种做法实际上阻碍了我们的党员使用这种双关语。”而且，还限制了内部民主。一个老左翼分子，今天意大利共产党的理论家证实，“在党内，大家什么话都可以说，大家什么事都没有做”。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3月3日星期六，在那不勒斯党的地区代表大会上，一个大学生谴责道：“我们使自己拜倒在历史性妥协的圣旨面前”。另外一名工人控诉道：“我们成了天主教民主党的党员了”。贝林格对他们的批评精神表示赞赏。一位罗马的共产党医生”保拉评论道：“自我批评成为我们的思想体系。我们成为鞭笞的党。”

难道没有任何行动吗？3月13日星期二，在米兰意大利共产党地区委员会为了不使与天主教民主党的选举发生矛盾，反对重新提起塞韦索文件，要求他们对自己的地区负责。

基层的言论自由完全是衡意领导的晴雨表。政治路线保持了他独有的特征。自上而下的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然而，威尼斯的天主教民主党发言人吉奥尔齐·多米内斯认为：“思想流派的存在是一种民主演变的明显标志”。

法国共产党的独特立场几乎没有明显的消失：西班牙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成功地把他们的党纳入了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在马德里，有些人成了建设性的反对派；在罗马，另一些人则成为政权的候选人。从那时起，他们就“像其他党那样”以竞选者的身份出现在他们的国家里。

17年来，法国共产党试图走出少数民族居住区。多少还有点运气。这对他们的同盟者社会党内的反对派有很好的好处的。突然，恢复正常协作的进程被中断了，党的纪律加强了。一种新的孤立的出现已经不远了。

[本文刊登在法国《快报》

1979年5月5日—11日，

第1452期，第86—90页。

庄建明译，陈钟浩校]

西共、法共、意共 三党联合声明

1977年3月2日至3日，西共总书记圣地亚哥·卡里略，意共总书记恩里科·贝林格和法共总书记乔治·马歇在马德里进行了会谈。乔治·马歇和恩里科·贝林格应圣·卡里略的邀请，向西班牙共产党和西班牙其它民主党派重申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为争取民主和建设一自由的西班牙在行动上的团结一致。

本着这种精神，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深信西班牙人民将全面恢复民主。在今天来说，民主的基本准则是共产党和所有民主力量的合法化，这对于举行真正的自由选举是必不可少的。两党表示将与在西班牙为争取释放所有政治犯，挫败旨在阻挠西班牙走向民主的法西斯挑衅和罪恶而斗争的人们团结在一起。继葡萄牙和希腊之后，佛朗哥独裁统治的崩溃，是欧洲形势的一个重要和积极的变化。

西班牙民主的进步引起了法国和意大利人民的特别关注。

目前，三国正面临着一场经济、政治、社会和道德各个领域的全面危机。这次危机要求对社会发展需要找出新的解决方法。尽管三国的条件各不相同，意大利共产党、法国共产党和西班牙共产党认为，准备为进步和复兴政策作出贡献

的各派政治和社会力量之间必须实现广泛的协调一致以积极地渡过危机，挫败反动逆流，进步和复兴的政策要求劳动者及其政党在政治生活中处于领导地位，共产党人应当时刻捍卫劳动人民的切身利益，同时还主张进行深刻的民主改革。

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比以往任何时期更强烈要求发展民主，向社会主义迈进。

西班牙、法国、意大利三国共产党准备和各种政治和社会力量一起尊重、保证和发展集体和个人的各种自由：思想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游行示威自由，公民在国内外的出入自由，工会自由，工会的独立和罢工权利，私生活的不可侵犯，尊重普选制和多数派民主轮换执政，宗教信仰自由，教育自由，各种哲学思潮和见解的自由，文学艺术自由，为建立一个新的社会而努力。

这种在民主和自由中实现社会主义的愿望应当体现在三党各自完全自主地制订的政策方针中。

三党还将在各党独立自主、权利平等、互不干涉、尊重在自由选择符合各国情况的、争取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独特道路的基础上，发展国际主义团结和友谊。

在马德里会晤期间，三党还重申了为促进缓和与和平共处，促进真正的裁军，推动各国全面实施赫尔辛基会议最后文件的各项规定，积极举行贝尔格莱德会晤，使欧洲摆脱分裂成互相敌对的军事集团，建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新关系和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等方面作出努力的重要性。

三党设想一个和平、民主和独立，没有军事基地也没有军备竞赛的欧洲和地中海各沿岸国家和平合作的前景。

西班牙共产党人和所有民主力量为之而奋斗的自由西班牙将是欧洲民主、进步与和平的重要因素。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共产党、社会党和基督教力量以及各种民主力量之间虽然观点和传统各不相同，但是进行对话和寻求共同之处的全面谅解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在最近几年中，西班牙的自由事业已成了共同行动的阵地，西班牙业已走上民主复兴的道路，今天三国共产党在西班牙的首都号召所有爱好民主和进步的力量团结起来。

马德里 1977年3月3日

〔本文载于法国《国际研究》，第88—89期。〕

庄建明译，葛智强校

英国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

联合公报

法国共产党总书记乔治·马歇和英国共产党总书记戈登·麦克伦南于1976年5月19日在巴黎举行了会谈。英国共产党政治委员会委员杰克·沃迪斯和法国共产党政治局委员让·卡纳帕，中央委员雅克·德尼和保尔·弗罗蒙泰尔，对外政策部成员科莱特·贝纳斯和热拉尔·斯特雷弗也参加了会谈。

这次讨论指出在由于深刻危机打击资本主义制度，法国和英国的劳动者面临着许多类似的问题。在这两个国家里，统治集团竭力想用把经济危机转嫁到劳动者及其家庭身上的方法来解决经济危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指责人民群众长期斗争所获得的民主权利。

英国和法国共产党一致认为经济危机源在两国中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奉行不顾人民群众利益，追求最大限度利润政策的大垄断寡头应当对此负责。

法国共产党和英国共产党坚信两国的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一定能在每个国家中只要团结一致，坚决斗争就一定挫败垄断寡头和跨国公司的努力，动摇他们的经济和政治权力，开创一条走向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

法国共产党和英国共产党在各自不同的具体条件下开展

工作。因此，两党应当按照本国特点决定自己的政策。同时，由于他们都是在工业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进行着斗争，所以他们所面临着的主要问题又具有共同的性质。戈登·麦克伦南和乔治·马歇的会谈强调了，在解决这些问题时应当协调一致。

各国要走的道路以及建立社会主义的形式应当取决于每个国家的条件和传统，每个国家都应该按照这条道路。但是，两党认为，不管怎样，要实现这种历史性的变革都是以工人阶级和其它劳动者最民主的活动为前提的。

法国共产党和英国共产党认为伟大的社会通向社会主义伟大变革的各阶段都应当是两国大多数人民群众自由决定的结果。

两党决心在各自国家里，以社会主义社会中维护和扩大两国人民过去所获得大众民主自由，包括思想和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示威游行和结社自由、舆论和文艺表达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私生活的不可侵犯性、罢工权利、工会独立于国家和任何政党、政党政治活动自由，包括反对党的活动自由。

两党代表强调指出，尽管两国条件各不相同，都要通过工人阶级的团结，把各阶层和民主党派团结在工人阶级周围，结成最广泛的联盟，与劳动者的主要敌人——垄断资本家和跨国公司作斗争。

争取社会进步，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与争取为和平的斗争是不可分割的，不同的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关系是极其重要的，它可以避免一场可怕的毁灭性战争。面对帝国主义强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的反对国际缓和，英国和法国共产党声明坚决为集体安全、和平共处、裁军、

缩减军备和国际合作而采取行动。两党准备为解散军事集团而努力。

这场斗争同样是与捍卫国家主权的斗争不可分割的。美国垄断资本对法国和英国经济施加越来越重的经济压力，特别是利用跨国公司的活动提供的方便来施加这种压力。两国的独立和行动自由，与跨国公司其中大部分是属于美国的跨国公司，日益加强控制，以及在小小的欧洲、国内推行垄断资本家的一体化的计划都是水火不相容的。任何一个超国家的组织，委员会或者“欧洲”议会都不应对各国人民管理自己事务作出自己的选择进行干涉。

法国和英国共产党断然拒绝帝国主义者把和平共处解释为维持现状，阶级斗争和解放斗争的终结。这种说法。两党强烈抗议美国和西欧领导人对我们大陆上的各国人民行使主权选择自己政府进行干涉。而对法国和英国大资本家的拼弃国家的政策，两党声明坚决捍卫国家主权。

两党谈到了忠于国际主义、各党平等和独立自主，互不干涉和团结一致，决心为了共同的目标、为了工人阶级和两国人民的利益继续合作。

两党重申为了以一个劳动者的欧洲，一个和平、民主、独立和社会进步的欧洲代替垄断资本的欧洲，与欧洲其它共产党、社会党、基督教和所有的进步力量共同行动的愿望。

巴黎 1976年5月19日

〔译自《法国国际研究》杂志第38—39页。〕

庄建明译，葛智强校

意大利共产党和法国 共产党 共同声明

意大利和法国的形势的特征是危机加剧，触及经济，社会，政治，精神和文化各个方面。

危 机

经济方面——这次危机是冲击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影响世界经济关系的危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危机沉重地压在受失业和价格上涨危及的人民群众和劳动者身上，同时也沉重压在遭到严重困难的农民，手工业者和中小企业身上。

公民生活秩序碰到越来越严峻的问题，政治危机和加深的衰退现象，危及社会和精神生活。

这次危机表明资本主义制度不能满足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包括不能满足科学和技术发展的需要，对保障工作权利，提高生活水平，繁荣文化以及人类的各种作用等需要也无能为力。整个社会大倒退的威胁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这两国，完全象在西欧其它国家一样。

帝国主义和大资本的力量企图在这种形势中获利，破坏人民、劳动者在政治，社会经济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但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能够通过斗争挫败这些企图，取得新的胜利，为民主和社会新成就开辟道路。

为此，意大利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它们正在为人民群众和劳动者切身利益而进行斗争——同时也为制订一项能解决他们国家严重的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深刻的民主改革政策而斗争。

在当前的这场危机中，意大利和法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必须发扬民主，并使民主朝社会主义方向发展。

两党在不同的具体条件下开展各自的活动，并都为此执行了一项符合各自国家的需要和特点的政策。因为是同时两个政党在这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进行着斗争，同时还发现：他们面临着的基本问题有它们的共同性，在解决这些问题时，应该协调一致。

社会主义，民主的最高阶段

意大利和法国共产党人把走向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作为各自国家的目标，这个目标应该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不断民主化的过程中加以实现。社会主义将是民主和自由，即“彻底”民主的最高阶段。

从这精神出发，一切自由，不论是资产阶级民主大革命所取得的成果，还是本世纪以工人阶级为首的伟大人民斗争所取得的成果都应得到保障和发展。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在国内外自由迁移，私人生活不受侵犯、宗教、哲学、文化艺术和流派的见解表达等自由也同样应得到保障和发展。法国、意大利共产党主张多党制——包括反对党的存在和进行活动的权利——主张自由组织多数和少数派，主张多数派和少数派可以民主轮换执政，主张国家的世俗性、民主行使国家权力，司法独立。主张工会

独立活动自由。两党特别重视在企业中发展民主以使劳动者能有真正的权力参加管理，享有作出决定的广泛权力。国家应该实行民主分权，让予地区和地方团体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地区和地方团体应在行使权力时享有广泛的自治权。

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求公众对主要的生产手段和交换手段实行公众监督，要求对这些手段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化，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民主计划。中小农民、手工业者以及中小工商企业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特殊的积极作用。

这种改造只能是以工人阶级为中心的大多数人的强有力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和斗争。它要求有充分代表人民权利的民主机构，确保并发展这些机构的权力，要求自由行使直接的普选和比例代表制的普选。两党——它们过去一贯尊重并将继续尊重普选的裁决——就是本着这种精神设想劳动阶级掌握国家的领导权。

意大利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认为这些民主生活的条件具有基本原则的价值。他们的态度并不只是出于策略的考虑，而是源自对各自国家特定历史条件和物质条件的分析，出于对整个国际上已取得的经验的考虑。

广泛的联盟反对垄断资本

两党认为：在国与国的关系上——这种关系应当是在新的国际分工中紧密合作——应当确保每个民族自主地决定自己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权力。因而，两党强调必须同美帝国主义干预各民族事务的奢望进行斗争，反对任何外国干涉。

两党认为，为了保证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反对其主要敌人——垄断资本的胜利，实现各派社会和政治力量之间的谅

解，统一的工人阶级应该表明有能力在其中行使领导作用，这是不可少的。这种广泛的联盟不仅在现阶段而且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是必要的。

共产党和社会党之间牢固、持久合作的发展是这联盟的基础。

今天，广大的天主教徒越来越认识到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现实，人类对于友爱、社会正义、高尚道德精神、个性的充分发展的深切向往之间存在矛盾，这一变化为共产党人和全体工人力量以及信奉基督教的人民力量之间结成联盟，提供了越来越大的可能性。工人力量能够并且应该在新社会的创立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这种危机形势中，面对这危机的形势所带来的巨大任务，两党充分地认识到自己承担着越来越大的责任并认识到它们的作用是别人无法代替的。

为建立一个和平民主和独立的 欧洲而斗争

按照一九七四年一月在布鲁塞尔召开的资本主义欧洲共产党会议决议，两党重申为保卫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社会和经济结构深刻的民主改革，反对法西斯主义和任何危害自由的行为，促进欧洲各派民主进步力量以及社会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共同行动的愿望。对跨国和国内垄断集团以及他们的领导阶层奉行严重违反人民利益的方针，和他们在共同市场的欧洲引起失业和社会不平衡的政策，面对这种情况，两党对左派力量（包括在欧洲议会内的左派力量）和人民群众团结愿望的发展极为重视，其目的是推动欧洲经济共同体的



工作、方针民主化，逐步建设一个和平民主和独立的欧洲。

西班牙处于关键时刻。本着同样精神，两党——对这方面肯定地坚信所有民主人士——谴责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使佛朗哥制度永恒的任何企图。他们重申与为保卫和释放政治犯，为建立一个有充分政治自由的制度而斗争的西班牙工人阶级和一切反法西斯者的战斗团结。此外，他们对年轻的葡萄牙民主所面临的困难表示关切，希望所有工人和民主力量在斗争中重新联合起来，抵制反动派的任何威胁和保障国家的社会和民主进步。

赫尔辛基会议后

赫尔辛基的欧洲国家会议——苏联为这次会议的举行和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是在欧洲建立集体安全体系的国际缓和道路上一个重要阶段。只有和平共处才能取代毁灭性的战争。它是解决国与国的争端，发展国际间全面合作的条件。和平共处并不意味着维持社会和政治现状，而是为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提供了有利的阵地。两党在继续进行这种斗争的同时，为和平和互相逐步的裁减军备、直至全面裁军、逐步摆脱并解散军事集团的新进展面开展活动。两党表示决心为团结一切有关力量来制止军备竞赛面作出贡献。

意共和法共重申各党独立自主、尊重不干涉内政和国际主义，两党准备继续并加强他们之间的兄弟般合作。

罗马 1975年11月15日

〔译自法国《国际研究》杂志第88—89期。〕

沈肖肖译，葛智强校